



目 录

前言	(1)
川东少年	(1)
留法勤工俭学	(5)
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8)
南天播火种	(12)
百色起义	(17)
瑞金县委书记	(24)
“邓、毛、谢、古”	(28)
患难真情	(34)
主编《红星报》	(37)
与“阎老西”斗法	(42)
太行战鼓	(48)
教训凶顽	(52)
邓政委和“大生产运动”	(56)
斩断“抢桃子”的敌手	(61)
仁义之师	(65)
神兵夜渡黄河天险	(70)
千里跃进大别山	(73)
运筹帷幄 决战淮海	(80)
保护好人民的“家产”	(87)
进军大西南	(90)





肃清土匪	(94)
财经战线初显身手	(97)
成渝铁路 圆四川父老一个梦	(101)
红旗插上“世界屋脊”	(104)
重振财政部	(109)
“猫论”	(112)
“邓小平小道”	(116)
毛泽东决定起用邓小平	(123)
毛泽东夸“人才难得”	(127)
初纠“文革”错误	(135)
坚决抵制“两个凡是”	(141)
平反冤假错案	(145)
真理标准的讨论	(148)
自告奋勇抓科教	(152)
支持包产到户	(158)
情系特区	(160)
“一国两制”	(168)
“三步走”战略	(173)
百万大裁军	(178)
“小平您好”	(183)





前 言

一百年前，巴蜀大地上诞生了一位世纪伟人——邓小平。

少年时他负笈远航，到遥远的法兰西为内忧外患的祖国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在风雨如晦的革命低潮中，他在南国偏远的百色高举义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中，他和刘伯承带出了一支战无不胜的铁流大军。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作为身系全党建设重任的总书记日理万机。在“四人帮”得意横行的艰难岁月里，他以“钢铁公司”般的坚毅果断致力于全面整顿。在长期革命生涯中，他书写了“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从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引导中国迅速地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的灾难中解脱出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





期。在他的设计和领导下，逐步形成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稳步地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曾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的邓小平，被拥戴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形成和发展中，在一系列关键问题的重大决策中，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局面的开拓中，在各项重大政策的制定中，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者。

在邓小平百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撷取他不平凡的人生历程中一些片断，来与大家共同缅怀这位世纪伟人。

编著者





川东少年

1904年8月22日，四川省广安县姚坪里（今协兴乡牌坊村）大户邓绍昌家的宅院里，随着一阵清脆、高亢的啼哭，一个男孩来到世间，给这个富足而安谧的人家带来了少有的忙碌，也给已到而立之年的男主人增添了无比的欣慰。邓绍昌心里清楚，从他本人往上，三代都是一脉单传。这个男孩是他的长子，是他安门立户的希冀所在。邓绍昌给长子取名“先圣”，表字“希贤”，乳名“贤娃子”。“圣”、“贤”并用，除了表明这个封建知识分子望子成龙心切而外，也寄寓了他希望“有圣人作”，拯救斯民于水火的拳拳之情。时至今日，“圣”、“贤”之类的称谓早已被人们淡忘了，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中国的老百姓称呼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却是“小平”。

关于邓小平的家族，根据珍藏于邓小平的同祖堂弟邓先远手中的《邓氏分谱叙》记载：“我姓始于周之邓国，盛于汉之高密，一朝三驸马，一门二十九侯，唐宋元明，代有伟人……”矜重之情，跃然纸上。

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字绍昌，自幼生长在境况殷实、崇尚文化的家庭，受过良好教育，清末在成都法政学校学习，思想开通，行侠仗义，参加过当地民间反清组织哥老会，充任其“掌旗大哥”的职务。他对邓小平兄弟俩后来参加革命十分支持。由于他长期漂泊在外，不理家务，家中的一切全由邓小平





的祖母戴氏和母亲淡氏操持。邓小平童年时，家道开始衰落，但不十分明显，到他离家赴法求学以后，因田产收入日渐减少，税收剧增，家中经济更为窘困，不得不时常举债度日。

邓小平的生母淡氏，出生于广安县恒升乡淡家牌坊村一个富庶的家庭。她从小受到传统的“德、才、工、容”的教育及重视伦理、讲信修睦等观念的熏陶，十分贤惠善良。她嫁到邓家后，生儿育女，还要操持里里外外的全部家务，辛苦异常，积劳成疾，染上肺病，经常咯血，于邓小平留法期间溘然长逝，给邓小平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淡氏去世后，邓绍昌续弦，名夏伯根。夏伯根自幼生长在嘉陵江边，父亲是嘉陵江上的船夫，靠帮人运货为生。她仅长邓小平两岁，身体结实，勤劳能干，在家庭破碎、社会动荡的年代里，苦苦为邓家支撑门面。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时，从未出过远门的夏伯根，却独自跋山涉水到重庆找到了邓小平。从此以后，便一直与邓小平一家住在一起。邓小平对这位继母也十分尊敬。

在牌坊村，老人和亲友们多年来流传着许多关于“贤娃子”的故事。

一天，邓绍昌发现家里丢了五块银元。这笔钱在当时可以买到五百斤稻谷，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在这个知书识礼的家庭里，还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邓绍昌十分恼怒，把全家人召集起来查问钱的下落。这时，邓小平勇敢地站出来承认这笔钱是他拿的。在挨了父亲竹板的责打之后，含泪离去。邓绍昌在暴怒平息之后，不禁产生一丝疑问：这娃子平时节俭得很，给他的零用钱都舍不得花，怎么一下子“偷”去这么多钱呢？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放学的路上，一个同学掩面哭泣，邓小平和几个伙伴围上去探问究竟。这位同学说，妹妹正患重病，躺在床上发高烧，家里又请不起医生。说着他哭得更伤心了。伙伴们七嘴八舌，拿不出个好主意。邓小平皱着眉





头，眼珠一转，想出了法子。他跑回家，拿出父亲的五块银元，第二天带给那位同学，嘱咐他赶快给妹妹治病。

邓绍昌探得事情的真相，转怒为喜，暗自称赞儿子做得对。他搂着儿子，轻声地问他，为什么受责罚时一声不吭呢？邓小平答道，不管怎么说，随便拿家里的钱是不对的，理应受罚。问他为什么哭了，回答是因为自己不能挣钱去救济别人而感到羞愧。做父亲的被感动了。邓小平“偷”钱义助同学的故事也在北山小学师生中流传开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扩充，邓小平越来越善于动脑筋，对事物的见解也越来越深刻。在他读县高等小学时，班里有一桩奇事曾轰动全校，同班同学李再标要割肝救母。李再标的父亲长期在外，母亲十分疼爱这个宝贝儿子，他对母亲也十分孝顺。最近他母亲患了重病卧床不起，李再标十分焦急。他决定仿效古书上那些孝子离奇古怪的行孝故事，割下自己的肝脏为母亲治病，以尽孝心。幸亏下手不重，刀只在胸脯上划了一个口子，就被及时制止。邓小平听说后马上前往探望。他问明了事情的原委后，严肃地对李再标说：“你是有科学知识的学生，为啥子还要这样迷信？肝子是药物吗？真能治好你母亲的病不成？再说，你割肝后自己也活不成了，反倒会加重你母亲的病情，说不定要伤心死了。你的这番苦心岂不反而把她害了？”一席话说得李再标羞愧无言，贤娃子的话确实是入情入理啊。邓小平又耐心地劝慰道：“我们都读新学，要相信科学，割肝救母这样的蠢事以后不能干。你还是先请医生医你母亲的病要紧，好好照顾他老人家，这样才是你做儿子的真正孝心。”听了邓小平的话，李再标终于醒悟了，请假回去侍候母亲。从此，邓小平以观念新潮，能言善辩而出了名。

少年时代的邓小平有主见，不信邪，既顽皮又和善，成为伙伴们的中心。





离邓小平家半里路有一个石坝，位于从协兴到县城的大路上，路旁有两块神道碑，是清朝嘉庆年间朝廷为表彰两位广安籍高官的学问文章而赐立的。石碑立于两只石龟背上，高达3米有余，煞是令人敬畏，触摸石碑等于触犯了朝廷和两位大人物，在当地人看来是万万做不得的事情。一天，小平与几个小伙伴在石坝上玩耍。他突然停下，打量了一会儿石龟，对小伙伴说：“我们爬到乌龟背上去耍好不好？”小伙伴都吓住了，纷纷拒绝说：“爬石龟会肚子疼。”“听大人说，得罪了神碑，家里要遭灾的。”邓小平却壮起胆子说：“一个石头打的乌龟会有那么大的本事？我不信。你们不敢爬，我去试试！”说着他来到神道碑下，爬到石龟伸出的脑袋上，坐在上面踢打着两腿，喊道：“快来哟！好耍，好耍！”其他伙伴惊叫着跑过来说：“贤娃子，快下来，你要惹祸的！”“你惹了祸我们也跑不脱！”邓小平不但不下来，反而不慌不忙地爬到石龟背上，“惹祸就惹祸，看他怎么奈何我！”最后一直爬到神道碑上悠闲地坐着。小伙伴们又惊讶又羡慕地注视着“贤娃子”，从心里佩服他了不起。在他的带领下，其他小伙伴的胆子也慢慢大了起来，跟着他一起爬到石龟背上去玩。





留法勤工俭学

1921年春，经过短暂的语言进修之后，十七岁的邓小平来到克鲁梭市的施奈德钢铁总厂做工。

邓小平到施奈德钢铁总厂做工，深深地感受到了劳动生活的艰辛。这个钢铁厂位于法国南部的克鲁梭，是法国最大的军火工厂。在欧洲，除了德国的克虏伯工厂之外，它被列为第二大厂。资本家唯利是图，不管青年学生的体力条件如何，往往把又脏又累的重体力活安排给他们干。从事“拉红铁”工作的学生工，用戴着石棉手套的双手，夹着火红的钢条，进行轧钢，“脸皮都烤焦了似的”，一不小心，就被烫伤。在轧小型钢板的车间，学生们“用大钳子拖送钢板，来回跑，循环快，高温之下，汗流如雨，衣裤湿透，污黑的手，还不住地往脸上揩汗”。邓小平和其他年龄小的同学在从事了这种重体力劳动之后，身体都感到有些支持不住，一天劳动下来，连饭都不想吃。

学生工整日辛勤劳动，但所得的工资非常之少。邓小平所从事的杂工通常每日工资只有十至十五法郎。当时法国正发生经济危机，法郎贬值，物价暴涨，这点微薄的工资，仅够自己艰难度日。邓小平家中经济条件已每况愈下，无力接济。他和学生们吃的，通常是用白开水就黑面包，以及马铃薯、洋葱之类的菜食。学生们初到法国，为了节省开支，就几个人共同买一套炊具，用一个煤油炉子，合作开伙。如果工作时间不一





样，常常是“第一班用完后，第二班继续用”，所以“室内炊烟不断”。买不起桌椅板凳，则“全体立食”。他们大部分住在工厂盖的又脏又湿的简易工棚之内，往往几十上百人挤在一起，卫生条件极差。天气恶劣的时候，买不起雨衣，只能在雨中奔跑上下班，而在露天作业的，往往从头淋到脚，身上没有一处干的。

几个月后，邓小平对眼前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有些失望。吃四川辣子长大、脾气倔强、精力过人的他并不是经受不了劳作的艰难，也不是被难以下咽的饮食吓倒了，他苦恼的是无法实现离乡赴法时的初衷。他和其他同学一样，是要通过勤工达到俭学的目的。但现实是这样的难遂人愿，他整日被束缚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中，学不到有用的技术，接触法国社会的机会也不多，所得的工薪每月三四百法郎，仅够勉强糊口，根本无法攒得积蓄供自己上学。

所以，1922年初邓小平离开了施奈德钢铁厂，开始了长达两年辗转各地的打工生涯。他在蒙达尼的哈金森橡胶厂当过





雇员，在巴黎的比扬古尔区雷诺汽车厂做过工。他干过清洁工、制鞋工、钳工，在火车头上当过司炉，尤其是在雷诺汽车厂做钳工，更使他终身难以忘怀。“文革”期间他被打倒，下放到江西某拖拉机厂劳动锻炼时，他仍能熟练地操起锉刀，干得有板有眼。工人们大概不会想到，邓小平精湛的技艺是早年艰苦的劳动锤炼打下的基础，是与求生存、求自立相联系的。为了挣得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他要竭尽全力去干。有趣的是，邓小平由此对法式羊角面包产生了偏爱。1974年他去纽约参加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归国途中路过巴黎，特地买了二百个羊角面包，带回国内分赠给周恩来和其他一起在法国求学的同志。这大概是他缅怀青年时代特殊经历的一种特殊方式吧。





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2年夏，18岁的邓小平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中国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运动首先是由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等人发起的。赵世炎是1921年中国留法学生三大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在国内时，就曾与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有过多次接触。赴法后，即投身进步学生运动，与国内的中共党组织相呼应。即使在因无法在巴黎容身而不得不到法国北方做苦工时，也一直在青年学生和旅法华工中培养积极分子，为建党建团准备条件。周恩来赴法后，以天津《益世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展开活动。他通过实地考察，向国内发出了大量通讯，报道留法学生现状及西欧各国社会动态，并向中国留学生作共产主义宣传。他宣传说：“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分担起来”，“社会主义之不可悔，实已成了必然的趋势”。他穿梭往返于法国和德国之间，考察工人运动状况，向留法学生作报告，讲述建立旅欧革命组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们的积极活动，使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第一个海外组织呼之欲出。

1922年6月的一天，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聚集了十八位黄皮肤的中国青年，其中有代表旅德青年的周恩来，代表旅法青年的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和代表旅比（比利时）青年的刘伯坚等。他们在森林空场的一个露天咖啡茶座里轻声地交





谈着。没有任何装饰，摆设也十分随意。经营茶座的法国老太太借给他们十八把椅子，使这个聚会更像一个小小的沙龙。

就是这个会议，诞生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从此，中国的旅欧青年有了自己的一面旗帜。邓小平虽然没有作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在工余时间与赵世炎（少共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等频繁往来，深受其影响，很快加入其中。他视二人为兄长，对他们崇高的品格、深刻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钦慕不已。在他们的指导下，邓小平读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共产主义 ABC》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这些书中精辟的哲理、流畅的语言、犀利的文笔，深深地吸引了邓小平，也为他开拓了一个认识社会与认识自身价值的新途径。他兴致勃勃，跟随在大哥哥们身后跑来跑去，经受异邦斗争生活的锤炼。1924 年下半年，邓小平转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

1926 年 1 月 8 日清晨，刺耳的警笛声划过了巴黎卡斯特雅大街，巴黎警方突然派员查抄了位于这条街三号的中国人住的旅店。当他们搜到邓小平住的房间时，获得的“战利品”就是一批没来得及散发的旅欧青年团的机关刊物——《赤光》和一架带着钢板与滚筒的油印机。主人撤离了，宣传品仍散发着墨香。

《赤光》的前身是《少年》，创刊于 1922 年 8 月。自 1924 年 2 月起，《赤光》问世，由周恩来负总责。这份红色封面、十六开本的半月刊以旅欧中国青年为宣传对象，以抨击列强对华扩张、揭露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为主要内容，并同当时旅法青年中的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展开顽强的论战。它的主要撰稿人有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萧朴生等。其中，年仅二十岁的邓小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赤光》编辑部设在巴黎南部意大利广场附近一个僻静、简陋的旅馆里。这里既是旅欧党团组织的办公处，又是编辑部所在地。李富春、邓小平、傅钟、李畅英等人当时不过二十几岁。他们白天在机声嘈杂、粉尘飞扬的工厂中抛洒着汗水，晚间则聚集到一起为自己仅有的舆论阵地呕心沥血。周恩来常住的小房间只有五平方米，前来开会、商量事情的人们只能在床上、桌子上挤出一块立足之地。但条件的艰苦阻止不了这些热血青年对信念的追求。他们在这里，送走黝黯的夜色，迎来黎明第一缕朦胧的晨曦。其中，邓小平年纪最小，工作却非常引人注目。他专门负责版面的编排和刻印，工作起来全神贯注，精益求精。他刻出的字工整秀丽，同时，因其印刷清晰，装订简雅，使油印的《赤光》在质量上和铅印本不相上下。因此，一起工作的同志们亲切地称邓小平为“油印博士”。邓小平自己也撰写评论文章，如《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是抨击英、美、法、日等国对华借款计划的；《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则回击了青年党对共产主义者的污蔑和诽谤，揭露了他们“歌舞于花都”的丑态。这些文章，文笔犀利，针对性、战斗性极强，很难看出是出自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之手。邓小平的工作能力，在当时就受到了周恩来的注意与欣赏。

1925年，是邓小平到法国后的第五个年头。他先是被派到里昂区担任党的特派员，领导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但不久又回到巴黎。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已经搅动了国内各主要的城市。5月30日，在上海发生了英国殖民者屠杀中国学生和市民的“五卅惨案”，引起了国内声势浩大的抗议和罢工。中共旅法支部、共青团旅欧支部及国民党驻法总支部联合发起大规模集会、游行，以示声援，并占领中国驻法公使馆。这一行动导致了旅法中共力量的大暴露，大批党团骨干遭





到法国当局的驱逐。邓小平遂成为中共驻法支部的重要骨干。

在那一段严峻的日子里，邓小平忙于联络群众、稳定队伍、召开集会。从雷诺汽车厂到卡斯特雅大街，从伊西莱穆利诺到伯尔维，经常可以见到他匆匆的身影。这时的邓小平已具备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多方面素质。1926年初，邓小平得知，自己将作为政治嫌疑犯被法国警方逮捕，即与傅钟等人火速撤出巴黎。





南天播火种

1929年夏，25岁的邓小平接受了中共中央交付的一项重要任务：到广西积蓄力量，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他化装成商人模样，迅速离开上海，雇船南下，取道香港、广州，前往南宁。

这年春天，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共产党的变化。割据广西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反蒋旗号，与蒋介石兵戎相见。蒋介石老谋深算，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挑动桂系青年将领李明瑞阵前倒戈。李宗仁、白崇禧猝不及防，狼狽逃往海外。蒋介石为笼络广西人心，标榜“以桂治桂”，任命李明瑞为第四编遣区主任、广西绥靖司令，同时，委任李的表兄、原桂系左派首脑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俞、李二人在大革命时期同情共产党，支持工农运动，加之现在骤然主政，根基不稳，于是暗中同中共方面联系，请求合作。中共中央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先后派遣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陈豪人、龚鹤村、袁任远、李谦等一大批干部，前往广西开展工作，邓小平担任总负责人。这是他第一次独立担负一个地区的领导重任。

7月的南宁，既潮湿又炎热。邓小平化名邓斌，一身阔少打扮，乘船在邕江码头登岸。在我党的地下联络站——光昌汽灯店里，他见到了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

雷经天向邓小平详尽地汇报了两年来广西地区的形势。





“四·一二”政变以后，桂系军阀在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共产党人这点上与蒋介石毫无二致。各地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只有韦拔群在右江地区领导农民武装，烽火不熄。俞、李主政以后，广西的中共组织又恢复了生机。不少党员进入各级机关担任要职。俞作柏的胞弟俞作豫（共产党员、参加过广州起义），现在担任广西警备大队第五大队长。其余的党员中，陈豪人任俞作柏的秘书，龚鹤村为南宁警察局长。

邓小平默默地倾听着。广西革命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了他事先的估计。他决定通过俞作豫的关系，尽快见到俞作柏。

休息了一两天之后，邓小平西装革履，精神抖擞，由俞作豫陪同，来到坐落在南宁沙梨园的俞作柏公馆。

“主席”，俞作豫向俞作柏恭敬地介绍，“这位就是中共方面派来的代表邓斌先生。”

“哦，原来是邓先生，久仰，久仰！”俞作柏一面寒暄，一面上下打量着邓小平。见他年纪不大，身材不高，不免有些疑惑：难道共产党派来帮助我俞某的，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又转念一想：共产党内人才济济，听说此人也留过洋，必有真才实学，不可貌相。“邓先生远道而来，不知将何以教我？”落座之后，俞作柏慢悠悠地问道。

邓小平早已胸有成竹，这时微微一笑，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俞主席早年追随中山先生，治理广西，功德在民，我党十分钦佩。这次李、黄、白下野，您重主桂政，也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只是桂系势力盘踞广西多年，一时难以根除；而您长期在外，势单力孤。李、黄、白现在虽已狼狈逃走，但无时无刻不想反攻倒算。肘腋之患，不可不防。您这次倒桂有功，蒋介石虽委任您为一省之长，可此人天性猜忌，对您未必放心。蒋某久欲吞并各派势力，现在军阀割据，他力量有限，野心一时难以得逞。一旦他平定冯、阎各派，早晚要对广西下





手。到那时，中央军进攻于外，桂系旧部鼓噪于内，您这主席的位子，只怕就不太好坐了！”

“这个——”，邓小平的话，刺中了俞作柏的痛处。几个月来，他也一直为这个问题所困扰，寝食难安：“敢问邓先生眼下有何良策？”

邓小平点燃一支烟，沉思一番，答道：“既蒙俞主席垂询，兄弟就直抒己见。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蒋、桂虽手握重兵，但他们违背中山先生遗愿，屠杀工农，丧尽民心，无异孤家寡人。俞主席当年致力于国民革命，扶助农工，民众至今称颂。如能联络广西百万民众，开放工农运动，进而建立工农武装，定能立于不败之地。”

“还有”，他停顿一下，见俞作柏正在仔细倾听，就更侃侃而谈，“现在广西军队，多为桂系旧部，成分复杂，难以驾驭。主席不妨开办一个教导总队，选拔各师的青年军官来南宁培训，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清除其旧军阀习气，培养他们效忠省府。这样，就能逐渐稳定对部队的控制。”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俞作柏连连点头，示意邓小平接着说下去。

“人才是立国之本。现在对您稳定局面最重要的，不是钱财枪炮，而是人才。向外延揽人才，固然重要；就地选拔人才，更是当务之急。现在广西模范监狱里关押的大批学生，都是热血青年，因为反对桂系军阀专制统治，才被长期囚禁。听说您已有意将他们保释出狱，这些人年纪轻，读书多，有胆识，痛恨桂系军阀，感谢您的平反。如能随才任用，他们岂能不为省府效力？我党对俞主席一向景仰，在广西的组织也一定会坚决拥戴俞主席主政广西，抵御蒋、桂。”

听了邓小平的一席话，俞作柏大为高兴，心想：别看此人年纪轻轻，果然见识不凡。共产党藏龙卧虎，着实不可轻视。





他当即决定委任邓小平为省政府秘书。双方又促膝长谈了半日，邓小平才起身告辞。

对俞作柏的这一着棋走得十分成功，邓小平又在俞作豫陪同下，拜访了李明瑞。李明瑞为人正直，早在北伐战争期间就是一员赫赫有名的虎将。他对共产党一直有好感，因此与邓小平十分投缘，一见如故。他们详细讨论了军队建设问题。李明瑞也十分赞赏邓小平关于成立教导总队的提议。不久，在李明瑞直接布置下，教导总队正式成立，共产党员张云逸为副主任，掌握实权，主任则是一个挂名的旧军官。张云逸在北伐期间曾任第四军师参谋长，在军界很有影响。他的党员身份一直没有暴露，所以俞作柏等人对他也毫无顾忌地大胆使用。为了保守秘密，更好地开展工作，邓小平与张云逸之间，只保持间接联系，并未直接接触。广西党组织的联络站仍然设立在光昌汽灯店，有关情报由两名女交通员送到俞公馆，由俞作豫转呈邓小平，听取指示。不久，俞作柏、李明瑞又委任张云逸兼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的大队长。这个大队是李明瑞回广西后收编各地民团和散兵游勇建立起来的，虽不是桂系势力，但成分复杂，纪律松弛，战斗力很差。张云逸出任大队长后，推荐共产党员李谦担任副大队长。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他们对四大队进行了大换血，从教导总队中抽调了一百多名党员来到四大队，在士兵中进行民主教育，撤换旧军官，大量吸收工人、农民、进步学生参军，以改变部队成分。与此同时，在第五大队任大队长的俞作豫也对所属队伍进行了改造。短短两个月内，教导总队和第四、五大队三支队伍基本为共产党所控制。

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利用自己的秘书身份，出入于广西上层人物当中，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在邓小平影响下，俞作柏、李明瑞下令开放工农群众运动，解散了原为黄绍竑所把持的各级国民党党部，逮捕了一批桂系军阀安插在地方政府





的反动骨干分子，广西的革命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在邓小平安排下，李明瑞会见了右江农民领袖韦拔群，答应拨给右江地区农民运动一批枪支弹药和经费，并让农军到南宁接受短期训练。同时俞作柏也签署命令，将右江地区凡是由土豪劣绅担任的县长统统撤职，另行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开明士绅担任那里的县长，使右江地区的一批地方政权逐步为党组织所掌握。

9月初，邓小平在南宁南门外津头村雷经天的住处秘密主持召开了广西省党的代表会议，各县党员代表三十余人出席，汇报、交流了近期工作，研究了今后的行动方针和任务。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作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等重要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广西农村工作草案大纲》等文件，选举雷经天为广西特委书记。这次大会，标志着广西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当时白色恐怖蔓延的中国，局部出现了类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革命热潮。





百色起义

就在广西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时候，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国民党中央政权内部摩擦加剧，汪精卫派其心腹薛岳来到南宁，拉拢俞作柏、李明瑞与广东军阀张发奎联合反蒋。几个月来，俞、李秘密容纳共产党，开放工农运动，已引起蒋介石的密切注意。他一边派出大批特务到南宁进行活动，刺探风向，一边电召俞作柏等广西军政大员分批“晋京谒见”。俞、李感到自己地位受到威胁，再加上汪精卫、张发奎的鼓动，遂决计起兵反蒋。

邓小平闻讯，感到事态严重。他与特委负责同志商议，一致认为：我党目前在广西的力量虽有很大恢复，但还不够强大。俞、李主政数月，立足未稳，势单力孤，仓促举兵反蒋，必遭失败。这对我党在广西力量的发展，非常不利。如不及时作出对策，几个月来的心血，就有付之东流的危险。

邓小平首先去谒见俞作柏、李明瑞，恳切地劝告说：“二公主政广西数月，成绩卓著，有口皆碑。只是恕兄弟直言，眼下广西兵力、财力有限，桂系军阀异己力量尚未肃清，枪支粮草也筹措得不够。汪精卫、张发奎各怀心事，配合不会得力。现在打出反蒋旗号，与装备精良的蒋军交锋，恐难取胜。还望二公三思！”

俞作柏数日来受到汪精卫、张发奎密使的吹捧，陶醉在反蒋“胜利”的梦幻当中。听了邓小平泼的冷水，不以为然地





说：“邓先生也未免太谨慎了！蒋介石窃政盗国，怨声载道，人人愿得而诛之。我俞某主政广西以来，得到工农拥护，部队士气高昂。以有道伐无道，何患不克！邓先生不必多言！”

李明瑞也说：“蒋介石狼子野心，视我们兄弟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古语云：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现在汪精卫、张发奎图谋反蒋，我们与之呼应，共同起兵，正是倒蒋的大好时机。再说，兵贵神速。现在反蒋意图已经暴露，只有及时举兵，才能争得主动。起兵计划都与汪、张商量好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邓先生一席忠言，也是为广西着想，我们兄弟深表感激！”



邓小平反复争论，见俞、李二人主意已定，难以挽回，只得退而求其次，说：“既然二公已下了决心，那也只好如此。不过，兄弟还有一个愚见。教导总队新建不久，警备四、五大队也正在整顿。这三支队伍，是否留在南宁，保卫后方治安，以不上前线作战为妥。这样，反蒋大计既不受影响，我们又可以保存一部分实力。不知二公以为如何？”





俞作柏、李明瑞想了想，觉得有道理，点头说：“高见！高见！就按邓先生的意思办。”

邓小平见他们同意了后面这一意见，如释重负，起身告辞。这样，虽然俞、李立即反蒋不可挽回，但我党控制的几支队伍毕竟得以保存下来，基本不会影响武装起义的计划。

很快，广西党组织又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讨论武装起义问题。以南宁市公安局长龚鹤村为代表的几名党员认为：南宁是广西首府，全国知名的城市。眼下趁俞、蒋开战之际，应当在南宁发动武装暴动，占领城市，震动全国。邓小平表示反对。他说：“南宁地处广西中心，四通八达，我们即使占领了也守不住。我的意见是：我们应该撤到左右江山区！那里是广西、贵州、云南三省交界之处，又靠近边境，森林茂密，地形复杂，反动派鞭长莫及。更重要的是：韦拔群等同志在那里开展农运多年，群众基础好，我们便于扎根。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我们就能够保存力量，坚持长期斗争！”

邓小平的意见，得到雷经天等大多数特委委员的同意。于是，在左右江地区进行武装起义的方针基本确定下来。特委会决定：派龚饮冰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这一方针，请求批准。

10月初，俞作柏和李明瑞在南宁召开反蒋誓师大会，通电全国，宣布俞作柏为南路讨蒋军总司令，李明瑞为副司令。部队首先进军广东，讨伐拥戴蒋介石的广东军阀陈济棠。结果，形势变化完全不出邓小平所料。俞作柏、李明瑞控制的三个师，基本都是桂系旧部，各怀异志。在蒋介石高官厚禄的拉拢下，师长吕焕炎、杨腾辉，旅长黄权纷纷倒戈。部队还没出广西，三个师全部叛变。流亡在外的李宗仁，也趁乱回到广西，指挥旧部向南宁反攻。俞、李讨蒋前后不过十几天，就惨遭失败。10月14日，俞作柏、李明瑞在俞作豫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护送下，撤往左江地区的首府——龙州。





俞、李出师讨蒋之时，委任张云逸为南宁警备司令，留守后方。张云逸在邓小平指示下，利用手中的权力，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获得大量枪支弹药。同时又预备了一批汽船，停在邕江边，作撤往右江的准备。

10月17日，邓小平下令将军械库中储存的枪支弹药悉数装船，并亲率特委成员和有关工作人员数十人，以及一支警卫部队，随船溯右江西上百色。张云逸则在向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全体官兵进行总动员后，指挥部队开出南宁，由陆路向百色方向转移。

20日，两支队伍分别由水、陆路到达右江中游的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几个月来，由于工作需要，邓小平和张云逸只在暗中联系，一直没有直接见面。他们积极工作，默契配合，内外呼应。在平马，两位战友第一次会面了。

在平马，邓小平还见到了先期到达右江开展工作的雷经天等同志。大家经过讨论，决定部队继续向西进发。22日，邓小平、张云逸率军到达百色。

百色是右江上游的第一重镇。它西枕云贵高原，东接右江谷地，处于广西、云南、贵州三省的交通咽喉。虽然是山区城镇，却十分繁荣。它与左江的龙州遥相呼应，成为新革命根据地的核心。部队到达这里后，按中共广东省委指示，成立了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邓小平担任书记。邓小平不顾旅途疲劳，当即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作出四项决定：

第一，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党的主张，发动群众。

第二，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

第三，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

第四，继续清除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





会议还决定，利用旧有的“督办”官衔，迷惑外界，掩护工作，宣布张云逸为右江督办，俞作豫为左江督办。以督办名义，分别通令左右江各县县长和税务官员上缴税款。这一带比较富庶，特别是烟税收入可观，一次便收得上万银元，为发动起义准备了物质基础。

邓小平、张云逸率部进入右江地区后，农民运动如虎添翼，地主豪绅坐卧不安。桂系军阀进入南宁后，密令以熊镐为大队长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沿江西上，对第四大队加以监视，准备伺机镇压。邓小平、张云逸果断决定：先发制人，消灭这支以土匪为骨干的队伍。10月28日，张云逸在百色公兴当铺设计诱捕了熊镐，随即派第四大队官兵与恩隆、奉议等县农军配合，迅速包围了第三大队驻军营地。经过两天战斗，敌军除少数漏网脱逃，其余全部缴械投降。俘敌一千多，缴枪四百多，解除了肘腋之患，从而为武装起义扫平了道路。

11月初，龚饮冰经广州回到百色，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批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并颁给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的番号。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在12月11日即广州起义两周年之日，在百色宣布起义。同时，决定对桂军高级将领李明瑞进行团结、争取工作，吸收他参加革命。

俞作柏、李明瑞随俞作豫撤往龙州以后不久，我党即派人护送俞作柏经越南海防转移到香港。李明瑞因有军人身份，无法越境，只得滞留龙州。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又考虑到李明瑞在军界的影响，一面发电报对他进行“忠告”，一面派心腹唐海安携带六十万元的巨额支票和十五军军长、广西省主席的委任状，前来游说李明瑞，拉拢他归蒋就职。然而，李明瑞早年深受民主思想的熏陶，具有强烈的爱国心，邓小平在南宁时





也曾对他进行多方面的教育争取工作。因此，他虽然也希望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但不愿同国民党新军阀同流合污，遂严词拒绝了蒋介石的“忠告”和拉拢。

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把李明瑞赶出龙州，排斥到革命阵营之外，还是积极争取、吸收他参加革命呢？邓小平毅然选择了后者。他两次前往龙州，对李明瑞进行教育争取。当时李明瑞准备收集残部，反攻南宁，邓小平同他进行了耐心诚恳的谈话，指出目前攻打南宁，实际上是参加军阀混战，与我党的方针不符。只有参加革命，举起义旗，建立革命根据地，才是唯一的出路，同时又请他担任即将成立的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

李明瑞被说动了，他放弃了攻打南宁的计划，与俞作豫等一起在龙州筹备武装起义，不久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明瑞参加革命，在当时的广西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大壮大了武装起义的声势，加速了武装起义的进程。后来，李明瑞转战到中央苏区，在反“围剿”斗争中屡立战功，受到党中央的表彰。1931年，在王明“左”倾路线影响下，这员勇将却在扩大化的肃反斗争中被错误地杀害了。

在准备武装起义的过程当中，邓小平奔走于百色、龙州之间，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对起义计划进行了周密的安排。12月上旬，邓小平应召赴中央汇报工作。他从龙州动身，先到香港，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议，作了补充报告。随后前往上海。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爆发了。红七军宣告成立，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龚鹤村任参谋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纵队。第二天，召开了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选举雷经天为主席。





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胜利举行。红八军宣告成立，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兼），宛旦平任参谋长，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纵队，共约三千余人。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庆祝大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当晚又组织了提灯晚会，人们通宵狂欢，直到旭日东升。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胜利，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共包括百色、东兰、龙州、宁明等二十个县，人口二百多万，成为全国较大的一块红色根据地。起义产生在桂系军阀的心腹之地，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瑞金县委书记

1931年8月，江西苏区，骄阳似火。

在中共赣东特委，主要领导干部的心情如同这灼人的天气一样焦躁不安，特委书记谢唯俊和刚刚来到苏区的原中共中央秘书长余泽鸿等同志开了一天会，最后作出决定：任命中共特派员邓小平为瑞金县委书记。这样，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邓小平未及再回到红七军，即风尘仆仆地跨过武夷山，从闽西赶往瑞金县城象湖镇。

当时的瑞金，正惨遭肃反扩大化之祸，全县形势非常紧张。

邓小平迅即召开党员和活动分子会议，决定从纠正“肃反”中的错误着手，尽全力挽回影响，打开工作局面。他派金维映带领一批得力干部，组成调查组，深入各区、乡调查了解情况，并号召全县干部、群众有冤鸣冤，有苦诉苦，民可以告官，不要怕打击报复。瑞金百姓从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身上看到了与民做主，有错必纠的精神，看到了共产党的希望，民气为之一振。

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摸底，调查组基本弄清了原县委书记李天富、现任县苏维埃主席谢在权和“红色警卫营”政委刘志平等人乱捕乱杀的大量罪恶事实。邓小平果断下令，拘捕民愤极大的李、谢二人，停止这种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所谓“肃反”，并释放了大批无辜在押的群众和干部。9月底，瑞金





县召开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公审并在城南门外（即现在瑞金一中附近）枪决了李天富、谢在权、刘志平，选举了新的一届县苏维埃和县工会的主要领导。不久，邓小平和各级领导又在县城和壬田、武阳、安治等乡村召开群众大会，为一大批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群众公开平反昭雪。

邓小平趁热打铁，通过苏维埃政权机构，建立健全司法、审判等各级组织，对拘捕、审讯、审判等权限作了严格的规定。老百姓终于有了安全感。

这些大刀阔斧的做法，和当时中共中央纠正“肃反扩大化”的指示精神有相同之处。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和1931年12月来到苏区中央局任书记的周恩来都给予了支持和肯定。

瑞金的老百姓惊奇地发现，新来的县委书记真正做到了与民同甘共苦。他穿的是粗布中山装，一条深灰色的哔叽裤子磨得发光，吃的也与当地人相同，一饭一菜，喜欢蹲在板凳上大嚼大咽。他住的是普通民房，有时甚至在庙宇、祠堂临时凑合。在瑞金十个月，前后迁居五六次。先住聚和店，后住在县城同善社楼下，稍后搬迁至顾栗宫，再后因敌机轰炸，迁至东方庙，最后迁居沙洲坝。他吃红薯从来不剥皮，还风趣地说：“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雨打，丢掉太可惜。”他指着手里的红薯告诫干部们：“从古到今，老百姓最喜欢说的有这么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我在乡里走，也常听到这句话。我们当红军干部的，就是要从种红薯这样的小事上做起，帮助老乡们解决困难，才能说是称职的。”

当时，余泽鸿尚未分配职务，暂时留在瑞金帮助邓小平开展工作。一天，他下乡回来，对邓小平说：“前晌，我在黄埠头村遇上了一个老倌，姓黄，他家六口人，分了三亩半黄土岗地，土质差，又没得水源，忙上一年，还要饿肚子。他怨气很





大，说村干部不管人死活。我觉得这个乡有问题，想下去看一看，抓住典型，搞他一家伙，对其他村也是个带动。”

邓小平点点头。他对这位比他大一岁的四川同乡一直抱有深深的好感。这是一位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人。1929年，邓小平去广西筹划起义时，就是由他接任中央秘书长的。这年4月顾顺章叛变，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他和爱人吴静涛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仓促转来苏区，征尘未洗，即投入查田工作，热情真是太高了。

“是哪，”邓小平接过话题，“瑞金的光景是‘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耕地少，不够分，贫苦人家到了春荒就得上山掘野菜、芋头。目前的情况，分地肥瘦不均是个大问题。抓恢复生产就得从这里着手，我们明天就下去。”

次日，邓小平、余泽鸿带领工作组到黄埠头村蹲点，发现原来主持该村分田的干部欺软怕硬，爱占便宜，与地痞、富农互相勾结，沆瀣一气，占着好田不放手，剩下的孱田划给普通农民，在群众中影响很坏。邓小平挨家挨户走访，逐田查看，并重新组织贫农团对土地实行丈量，把耕地按肥瘦和水源条件分为甲乙丙三类，以原耕地为基础，按人口和劳动力标准重新划分，抽肥补瘦，多少拉平，并留出部分好田作为红军公田，收益归公，用于优待红军、红军家属及救济灾荒。这一措施深得民心。原来分得坏田，收成少，生活困苦的农民来到新分到的土地里，抓起一把黑油油的泥土激动地说：“这回我们算真正翻身了！”

瑞金的土地革命是邓小平从事农村工作的开始。在这里，邓小平深深地了解了农民的生活、农民的追求和他们的喜怒哀乐，理解了民心的安定与政权稳定的关系。“再穷的庄稼汉也得有三件宝，”邓小平对县委干部们说，“一间茅屋，二亩薄地，外加一件破夹袄。没得地可种，就是断了穷人的生路，他





们就要扯旗造反，无论谁也坐不稳江山的”。这些认识对他在建国后担任党的总书记时提倡符合实际的农村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一届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的前夕，是邓小平在瑞金最忙碌的时候。他挑选政治觉悟较高，工作积极的干部到各乡村查处违反政策的事件，在对分田工作的复查中整顿干部队伍。他还在县城举办干部培训班，亲自动员，亲自授课，为苏维埃的政权建设培养人才。

1931年9月28日，这是个不寻常的日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毛泽东、朱德等红军总部领导以及赣南特委书记陈毅、中央代表王稼祥等来到瑞金县城，检查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这是邓小平首次与毛泽东见面。

入夜，赣南山地的暑热渐渐散去。在叶坪村东大樟树下的一幢二层楼房里，邓小平与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向毛泽东、朱德等作工作汇报。邓小平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瑞金的政治局势已趋稳定，经济建设走上了发展的轨道，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毛泽东对邓小平、余泽鸿等同志领导稳定瑞金的政治局势，开展生产建设，以及准备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一系列工作成就表示赞赏。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隆重举行。大会选举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瑞金改名为“瑞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县划为中央直属县，县境叶坪、沙洲坝、乌石垅等地为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的驻地。





“邓、毛、谢、古”

1932年春，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找邓小平谈话，调他到会昌任县委书记。李富春和妻子蔡畅（当时任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兼白区工作部长）与邓小平是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同学，彼此都比较了解，李富春知道邓小平是个善于做开创性工作又能顾全大局的人。

会昌是1931年10月被红军占领的，县城湘江镇外还残存着一股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时常袭扰乡镇，祸害百姓。邓小平一上任，就把剿匪当作第一要务。他精心指挥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斗，歼灭了这股顽匪。他还亲自带兵攻打闽赣边界的乌鸦泊、官丰、膳坑等地，消灭盘踞在高山密林中的反动靖卫团武装和土围子据点，绥靖了地方，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不久，中共赣南特委决定，成立会安寻中心县委，下辖会昌、安远、寻乌三县，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

这一带是江西的南大门，会昌城距“红都”瑞金只有四十多华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当时，赣南还活动着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福建也有军阀钟少奎的部队，他们还占领着寻乌南部的部分地区，因此防卫苏区的任务尤为突出。邓小平上任后，江西省军区指示会、安、寻三县成立第三作战分区。邓小平调原红十一军独立团副团长钟亚庆任指挥员，自己任政委，组建、扩大了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使之成为军分区下属武装，平时生产和训练，遇到敌情则立即开赴前线。





时至今日，三县人民还能记起邓小平当年的政绩：

——农业上，加强了各县、区党委和苏维埃对生产的领导，三县都成立了春耕生产委员会，各村组织了生产突击队、开荒队，还成立了妇女劳动委员会，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农忙时，邓小平还亲自下田，拉犁助耕。1932年会昌的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20%以上。

——工业上，恢复和发展了手工业品和日用品的生产，百姓的吃穿用度日益丰富。

——邓小平提议，所有机关干部每星期六下午参加义务劳动。中心县委机关除了留下伙夫一人外，每星期六下午都由他带队劳动，风雨不误。

——邓小平领导三县人民办了很多夜校、列宁小学、扫盲班、读报小组等。他不但组织教员，还亲自到夜校讲课。

辛勤的工作使三县的局面蒸蒸日上，颇得江西地方领导的称道。

但是，一个突发事件导致了邓小平将近两年的厄运，成为他一生中的“第一次起落”。

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炯明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发动建宁、黎川战役，南线苏区力量薄弱之机，突然向会昌、安远、寻乌三县大举进攻。邓小平掌握的第三军分区的地方武装，包括赤卫军、少先队在内，不足万人。面对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事实，他领导苏区群众坚壁清野，以游击战与敌人周旋。但终因敌众我寡，粤军很快占领了几乎整个寻乌县。这就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在江西苏区，邓小平与毛泽东主要是工作上的接触，一个任县委书记，抓地方上的全面工作；一个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虽挂名临时苏维埃政府主席，但军政权力已被架空。由于二人在红军的作战原则和苏区政策方面的





主张十分接近，邓小平被看作“毛派”。寻乌的失守，给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打击与毛泽东的思想主张接近的一类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于是 1933 年 3 月下旬，临时中央给邓小平扣上了“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准备退却逃跑”、“纯粹防御路线”的帽子，撤销其县委书记职务。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持保护态度，很快把他从会昌调到宁都，任省委宣传部长，并派他代表省委指导中共万泰中心县委的工作。

但是，事情远没有到此为止，打击邓小平只是打击福建、江西两省所谓“毛派”的一个方面。当时，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因其思想倾向与毛泽东接近，于 1933 年 2 月被错误地扣上“罗明路线”的帽子来批判，撤销职务。在江西，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毛泽覃，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与邓小平一起被当作“江西的罗明路线”代表人物而遭受打击。以李富春为书记的江西省委对临时中央的这种作法持有异议，也被博古等人所排挤。

1933 年 3 月下旬，苏区中央局代表撇开江西省委，直接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通过一个《决议》，声称三县在邓小平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皇失措，退却逃跑”，“这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会议决定改组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

4 月 15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洛甫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文章《罗明路线在江西》，把斗争矛头指向邓、毛、谢、古四人和江西省委，并强调要把这一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

4 月 16 日，江西省委在苏区中央局的督促下，被迫召开江西党组织工作总结会议。会议称邓、毛、谢、古是“反党





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对抗“党的进攻路线”，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制造者”。

于是，邓小平再次被撤掉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押送到瑞金红军总政治部隔离审查。

4月的闽赣山区，正逢梅雨季节，邓小平被囚禁在一所低矮潮湿的房子里，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丝，心乱如麻。“左”倾领导人的高压，窗外一阵阵“左”的口号声，卫兵对探视人员的喝斥，搅得他坐立不安，锉动着他的每一根神经。

邓小平是条硬汉子，四川人特有的倔脾气以及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坚定信念支撑着他。他心里清楚：那些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精通马克思主义”的高层领导人，倚仗着在苏联喝过一点洋墨水，从上海来到江西苏区以后，对一切都持怀疑、批评态度，对跟从毛泽东打山区游击战出身的军队领导人更是一百个不满意。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央指示，召开宁都会议，批评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从此，运用毛泽东军事理论指导作战的将领们头顶上如同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可能被抓辫子。自己正是因为运用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才成为“左”倾领导人的眼中钉。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想到这里，邓小平迫切想要了解一下毛泽东此刻的处境。

趁在院子里散步之机，邓小平找到一个原来给红一方面军总部做文书工作的年轻同志，请他探问外面的消息。

几天以后，消息传来：博古、项英实际主持了军委，原来与毛泽东比较接近的人正遭受批判和打击。

邓小平决心申诉——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整个苏区。

他的申诉书从百色、龙州起义写起，回顾了左右江根据地的建立，自己离开红七军以及到中央根据地任县委书记直至发





生“寻乌事件”的整个经历。在事关原则的问题上，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反围剿中，必须实行“诱敌深入”，“坚壁清野”而不能与强大的敌人死打硬拼；在扩大红军的路线上，不能用削弱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红；在财政经济问题上，不能提高指标，不能使群众负担太重，在苏区推销公债和征粮要从实际出发；在土地政策上，要实行按人口分配土地，要给富农和地主以经济出路。他还提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务必认清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冒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路线。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到现实中去寻找答案，而不能纸上谈兵。

这一份“宣言”式的检查，针锋相对，点到了临时中央领导人的痛处，自然是通不过的。他们在《斗争》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并责令邓小平继续检查。

第二份“检查”送上了。临时中央代表人物发现，邓小平仅仅有限地承认了他“低估了力主进攻的军事路线的意义”，此外观点毫无改变，语气反而更加强烈，并拒绝继续作检查。这更使他们暴跳如雷。

5月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批准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继续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又黄又瘦、面容疲惫的邓小平被带进临时“审讯室”，审讯者声色俱厉，以开除党籍相威胁，要邓小平写一份“像样的”申明书。

由于邓小平的抵抗，他生活上就受到刁难，饭菜质量不断下降。





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二十四岁的唐义贞是湖北人，热情爽朗，正主持着红军卫生材料厂。她以一个医生的敏感发现邓小平脚步蹒跚，面带菜色，不由得一愣。她知道邓小平正挨整，但没料想到会如此之惨。她走近前，小声询问他的近况。

“我太饿了，吃不饱饭。”邓小平轻轻地对她说。

唐义贞匆匆赶回家，找出一块银元出门买了两只鸡。鸡炖好了，她又奔到邓小平的拘留室，对看守说清缘由，让他们把邓小平带到自己家中。她端出热气腾腾的鸡，要邓小平千万别客气，“放开肚皮吃，鸡吃光了还有米糕”。第一只鸡吃光了，邓小平却怎么也不忍心吃第二只。唐义贞、陆定一他们这个小家并不富裕啊！当时后方人员每人供给的粮食是有限的，每天吃两餐饭还吃不饱，能吃上鸡已算是一种奢华了。鸡汤里的盐巴恐怕是平日舍不得吃攒下来的……唐义贞见邓小平再不动筷子，沉下脸来，不由分说，把鸡和几个米团子包起来塞给邓小平，又叮嘱了几句，送邓小平匆匆上路。

转眼间，炎热的六月来到了，邓小平的命运有了转机。临时中央的领导人感到在邓小平身上再也无计可施，只得给了他一个“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派他到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患难真情

南村区是抚州地区乐安县的一个区，1932年8月被红军解放，是中央苏区的前沿地带。1933年二三月间，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在这里打过大仗。这里接近蒋介石的南昌行辕，红白交错，情况复杂。邓小平到这里属于“控制使用”。

邓小平到区委机关院内住下后，中共乐安县委书记胡嘉宾和少共县委书记李书斌特地赶来看望。

“首长身体可好？”邓小平虽然被免去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但胡嘉宾等人仍把他当首长看待。

邓小平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啥子首长斫，同志们好，大家都好！”

大家坐下来。李、胡二人以前曾听过邓小平因反对临时中央的“左”倾路线而遭受打击的情况，对他很是敬佩。胡嘉宾遗憾地说：“这里条件很差，请首长……”不等胡嘉宾说完，邓小平不介意地挥挥手：“南村的六月，风和日丽，是个好地方斫。我在这里一切很好！”

沉思了一下，邓小平轻轻地说：“中央和省委都开过会，把我打成了‘罗明路线’的江西代表和执行者”，接下来他微微一笑，“不管他们怎样残酷斗争，采取什么措施，我坚信我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对的就要坚持”。他见胡、李二人专注地听着，像是对他们，又像是对自己说道：“革命





嘛，哪能一帆风顺呢？”两人顿时感受到了邓小平那坦荡的胸怀和对理想的坚定信念。

在南村区，邓小平以巡视员的身份指导区委加强地方武装建设、扩大红军，并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还到各乡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帮助下出主意，开展各项工作。

但是，临时中央对邓小平这个“机会主义”分子始终是不放心的，担心他在前沿地区“出问题”。所以邓小平到南村区不到十天，又急令他返回宁都。

邓小平背着行李，独自一人徒步来到宁都。随即，他被指定到江西省委附近的七里村参加劳动，接受新的“考验”。

一片光秃秃的山冈，草木不生，燕雀不落，荒凉背僻。邓小平头戴斗笠，颈上系着一块白毛巾，脚上蹬着一双草鞋，每天忍饥挨饿，挥锄开荒。

作为省委书记的李富春暗中关心着邓小平，省军区司令员陈毅、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和副主席陈正人也深切同情邓小平的遭遇，为他讲过不少公道话。

一天，邓小平正在挥汗锄地，身后响起了一个清脆的声音：“邓部长……”

邓小平回身一看，见是省妇女部的干事危秀英，便停住手问道：“秀英，你来这里干啥子？”

危秀英起初还不想道明来由，但经不住邓小平的盘问，只得实话实说：“蔡畅大姐很惦记你，叫我来问你有什么事情要办哩？”

邓小平很感动。自己正在落难，蔡大姐夫妇以当政之身不怕受到牵连，派人来嘘寒问暖，真是难得呀。于是，邓小平便一五一十地讲了他从乐安调到这里劳动的经过和目前生活的艰辛。他晓得危秀英是一个正直、可靠的妇女干部，不会把这些事情透露给别人的。





天近晌午，危秀英又返回来，她小声告诉邓小平：蔡大姐请他到家里去吃饭，路上避着人……

邓小平提前收拾了工具，洗了把脸，擦去了身上的汗水，便和危秀英一前一后，沿着乡间小路返回七里村。为了不被别人发现，他把草帽戴得很低，几乎遮住了眼睛。进村后，邓小平按危秀英的指引，从后门进了李富春、蔡畅家。蔡畅见邓小平风尘仆仆地来到，握住这位老战友的手久久不愿放开。她发现，邓小平被晒黑了，也累瘦了，但精神很好，显得更加成熟。蔡畅告诉邓小平：李富春前些天到瑞金向中央汇报工作去了，临走前说会向中央有关同志如实反映你的情况，并重申江西省委对你的正确评价，请你坚持一下，保重身体。

邓小平眼眶有些发潮。他稍稍休息，蔡畅端来了热气腾腾的红烧肉、猪肉炒大蒜辣椒、鱼干炒辣椒等邓小平爱吃的菜，还有一壶水酒。邓小平数月不闻肉味，未尝酒香，胃口好极了，加之大姐家里的温暖气氛，他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主编《红星报》

邓小平在宁都农村下放劳动的事情，很快被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知道了。王稼祥是1931年从上海来瑞金的，担任过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外交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他才华横溢、善做政治工作，被称为“红军政治工作之父”。第四次反“围剿”后，他被敌机炸伤，此时正卧床休养，总政的工作由副主任贺昌一个人承担。当时，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来势凶猛，步步进逼苏区，红军官兵在前线殊死鏖战，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到三军团任政委，亲自指挥作战，后方机关几乎走空了。王稼祥为此焦灼不安，他与贺昌和总政组织部长罗荣桓商量以后，决定向临时中央请示，让邓小平代理秘书长。

临时中央的回复下来了：“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中央的进攻路线，拒绝检查，又不接受批评。这件事暂时不行，还要考验一段时间再说。”王稼祥大失所望：“埋没人才呀！”他气得用手捂着伤口，来回踱步。

过一段时间，王稼祥见临时中央再不提此事，也捺不住性子了。他吩咐警卫员挂通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的电话，重提让邓小平来总政代理秘书长。“我等着他工作”，王稼祥大声说道，“我负伤休养，杨尚昆去前方了，总政已经空了，你如不同意邓小平来，那你就来兼任总政主任，我不干了”。博古和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学时便是同窗好友，非常尊重王稼祥。他和





组织局长李维汉研究后，答应了王稼祥的请求。

邓小平在七里村接到了调往总政治部的命令，立即打点行装到江西省委转干部关系。

知道邓小平要调回总政的消息，省委书记李富春、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省军区司令员陈毅和省委妇女部长蔡畅设宴为邓小平饯行。除曾山以外，另三位省委负责人都是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学和兄长、大姐，在这种气氛下相聚，心中的压抑和对未来的憧憬相伴而生。豪爽的陈毅极力调解气氛，曾山亲自下灶房烧菜。李、陈、邓、蔡四个人围着方桌边吃边谈，心情逐渐愉快起来。他们从巴黎的塞纳河谈到莫斯科的红场，从上海的白色恐怖谈到广西的起义烽火，从瑞金临危就任谈到会、安、寻大好形势。四人的兴致越谈越浓，一顿饭从暮霭初起吃到月上树梢。

就这样，邓小平又回到了瑞金，在王稼祥的领导下任总政秘书长。两三个月后，他又被分配到总政宣传部，负责主编《红星报》。

《红星报》实际上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直接由总政治部主管。当时在沙洲坝还有中华苏维埃政府办的《红色中华报》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办的理论刊物《斗争》，二者与《红星报》一起被称为“两报一刊”。

邓小平对办报是有丰富经验的。除在法国编印《赤光》之外，他在发动百色起义时曾创办《右江日报》。红七军进入江西苏区时，又曾在兴国编过一个短时期的红七军机关报《火炉报》。这次他不顾受到打击和工作调动带来的身心疲惫，迅速投入了工作，在只有一个帮手的情况下，把这份报纸办得有声有色。他是一个多面手，既要改写稿件，又要编排版面，还要负责书写美术标题与校对，工作量极大。《红星报》先后共有十多个专栏和副刊，如《列宁室》是普及革命理论知识





的，《红板》是介绍红军英雄模范人物事迹的，《铁锤》是点名批评违犯党纪军纪、破坏军民关系现象的，《法厅》是宣传纪律和规章、报道军法处罚案件的，《卫生室》是普及防病治病和火线救伤知识的。《红星报》的文艺副刊有《山歌》、《红军歌曲》、《猜谜语》等，生动活泼，深受红军将士和苏区人民的喜爱。1933年10月，第9期的《山歌》专栏发表了后方群众写给前方红军的山歌：

一双草鞋一片心，难为后方姐妹们。
穿上草鞋跑得快，红军哥，赶快冲上南昌城。

1934年“三八”妇女节，《红星报》又刊登了从前线寄来的《送郎当红军》长篇叙事山歌，歌中写道：

把一切献给战争，
你我和所有的青年夫妇都要硬起心肠。
李贞，你把包袱交给我不要再送了吧！
你在家努力春耕，政府一定优待帮忙。
得闲多做布鞋几双，
寄给我在前方跑路打胜仗。
听啊，东战线的炮火连天响，
紧急动员千百万工农赴战场。

.....

这些山歌质朴清新，既充满了乐观主义情调和阳刚之美，又糅合着浪漫的爱情色彩。谱起曲子，广为流传，前方唱，后方唱，优美动听，非常感人。

战争年代的报刊，一个特殊的使命就是普及军事知识，提





高指战员杀敌作战的本领。《红星报》的《军事常识》、《军事测验》和《俱乐部》栏目，结合战争的实例，通俗易懂地向指战员们介绍了各方面的知识，如什么是围困战、堡垒战、游击战、地雷战、运动战等等，怎样利用地形冲锋、刺杀、搏斗、夜袭、撤退、防毒、侦察，以及怎样用步枪打飞机等等。这些内容汇合成一个军事百科，很受前线官兵的欢迎。

邓小平为了提高红军将士的军事素质，动了很多脑筋。1933年9月出版的第11期《红星报》上刊登了一道试题：“有一侦察员搜索到河边，看到河的上游有许多木片漂流下来。这时侦察员应该怎样判断敌情？”让读者自己去分析，写出自己的判断意见寄到编辑部来。过了一段时间，邓小平在《红星报》上刊登答案，指出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敌人可能在上游架桥；二是上游可能是森林地带。答对的给奖，以资鼓励。

一天，邓小平吃过晚饭，前往沙洲坝去找毛泽东。当初他在瑞金任县委书记，甚至调任会安寻中心县委书记以后，常来这里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聆听教诲。现在毛泽东虽已被免去军职，但邓小平对他的军事才干十分仰慕。他要向毛泽东约一篇写有关红军攻城的稿件在《红星报》上发表。

毛泽东正坐在苏维埃政府办公厅院内的大樟树底下埋头读书，见邓小平来访，他客气地起身让座，询问了邓小平的近况，邓小平一一作答后，向毛泽东讲明来意。

看到邓小平执著、恳切的态度，毛泽东笑了。他说：井冈山的几次主要战斗，已用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中央作了汇报，这就是《井冈山的斗争》，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经验，你们早已熟悉了。不过吉安一仗的战例倒可以说说。邓小平见毛泽东答应了，心里十分高兴，说：1930年打吉安属于攻城成功的战役，对今天的攻城战斗有很大借鉴意





义。

毛泽东摇着芭蕉扇，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打吉安，打了八次了，现在是第九次……”

不久《红星报》的《红军故事》专栏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署名子任的长文《吉安的占领》。红一、三、五、七军团的将士们读后，纷纷议论说文章体现了毛泽东指挥攻城的韬略，即“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从不硬拼，选择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敌人”。在“左”倾冒险主义占据中央主导地位的时候，邓小平放手在《红星报》宣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其胆识和魄力是惊人的。





与“阎老西”斗法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改编命令，邓小平和广大红军指战员一道，依依不舍地取下八角红星帽，戴上缀有青天白日徽章的军帽。一些红军战士难过得大哭起来，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还是忍痛换装，接受改编。从8月底开始，八路军各部先后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9月中旬，邓小平和八路军总部人员一起，乘船东渡黄河，开赴前线。

日军侵占了平津后，又兵分两路攻掠华北。一路沿平汉线南下，直扑保定、石家庄，另一路沿平绥铁路西上，攻破南口、张家口，进逼晋北重镇大同。攻入山西的这一路日军攻城掠地，来势汹汹。有“山西王”之称的土皇帝阎锡山，眼看手下的晋军抵挡不住敌军的强大攻势，只得乞援于共产党和八路军。同时，阎锡山自有他的如意算盘，他私下里对那些犹疑不定的手下说：“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





的办法，此外即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这样，阎锡山一段时间里戴上了“红帽子”。他指挥晋军对日寇层层堵击，严令各地军政长官要“守土抗战”，同意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即牺盟会）和“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会），发动群众抗日，还在牺盟会挂上会长的头衔，在各地组织和编练新军。

1937年9月，周恩来来到太原，与阎锡山接洽红军在山西抗日的具体事项。他考察了山西的形势后，向中共中央建议，要派得力干部作为八路军代表领导战动会的工作，把战动会搞成半群众团体、半政权组织的形式。他以对人的深刻了解，推荐邓小平来担此重任。邓小平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阎锡山把地盘看得比性命还要值钱，对于成立这么个组织当然心存疑虑。他虽然也希望山西老百姓起来打日本，可要是沦陷地区冒出个战动会，这个地方日后是姓阎还是姓共，他说不准。周恩来摸透了阎锡山的心思，决定让薄一波去当一回说客。薄一波是山西人，论起来还是阎锡山的学生，说得上话。薄一波找到阎锡山，给他作了一个分析：沦陷区已经落在日本人手里，现在让给共产党、八路军，还可以落得个天大的人情；要是不交给他们，他们一定要坚持进入，你不是也没有办法吗？不如送个人情给他们！阎锡山出于无奈，只好答应。

战动会打上阎锡山的旗帜，取得合法地位，为共产党和八路军解决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以前发动群众、建立政权都是搞“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如今国共合作，这一套不能明着搞了，正好可以从组织合法的战动会入手。

9月21日，周恩来把刚刚到达太原的邓小平找去，面授机宜，邓小平领命而去。

邓小平一回到八路军总部，马上行动起来。他部署各个部





队迅速派出民运工作团，借阎锡山的名义，到山西各战地建立战动会，发动群众。他以注重实效、不搞花架子的精神，要求工作人员主要抓紧区、村两级的动委会，做好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工作。

这时候晋东北大部分区县已经沦于敌手，各个工作团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迅速展开工作，不到两个星期，就在几个县区建立了战动会，分别拉起五六十人到一二百人不等的游击队、义勇队，使日军尝到了游击战的苦头。阎锡山不禁暗自心惊：“八路军做事太快了！”

阎锡山及其手下将官，打仗不得要领，只知道一味地正面堵截，被动防御，结果是人死了不少，地方也丢了不少，向南节节败退。但是，他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仍以晋西南不是战地为借口，不让八路军主力进驻。为了做到未雨绸缪，八路军总部决定由邓小平带领一支五六百人的小分队脱离主力，以八路军总部名义单独前往晋西南，预作布置。10月中旬，邓小平领兵南下。

邓小平来到晋西南的汾阳不久，从忻口前线败退下来的国民党队伍，忙乱地沿太原—汾阳公路蜂拥而来。溃兵与日军对阵虽说一败涂地，在百姓面前倒不失“英勇”，沿途村落被搅得鸡飞狗跳。为防止溃兵入城骚扰汾阳百姓，邓小平召集战动会的负责人在汾阳饭店开会。他说：“太原只怕会很快失陷，溃乱的大批部队一两天里就会到汾阳了，战动会要大锣大鼓发动群众游行示威，大造抗日声势，欢迎从抗日前线退下来的军队。要家家熬稀饭、蒸馒头，城外、城门口搞接待站，让他们有吃有喝，还要劝他们最好是不要进城，不然城内的秩序不好维持。”一个战动会干部担心地说，汾阳现在还不是战地动员的地区。邓小平却不以为然。他挥了挥手：“这不是很快就要成为‘战地’了嘛。”





一天多后，行色疲惫的败兵们，在汾阳城下看到一幅意外的景象：汾阳城的人没有像沿途各地的人一样慌忙逃难，城外和临大道的村头、路口，到处设了茶水站、救护站、转运站，老百姓热情招呼、安抚士兵，运送伤病员，使队伍尽快通过。城里城外遍贴抗日标语，一群群学生娃子在演抗日剧、游行呼口号，八路军官兵和民工一道有条不紊地转移粮食、棉花等兵站物资，没有一丝慌乱迹象。一路恐慌、紧张的败兵不禁啧啧称奇，精神也为之一振。

晋军和中央军的几万败兵像潮水般掠过汾阳后，只有邓小平率领的这支佩戴蓝底白字臂章的八路军和佩戴绯红色“战地动员”臂章的战动会干部，昂扬挺进在太原西南方向的大道上。

不久，太原失陷，邓小平率领部队转移到孝义县的下堡。

在下堡，邓小平抓紧时机为八路军扩军，建立抗日游击武装，做群众工作。这时候，山西沦陷区的各个县长带着大批武装仓皇南逃，准备投奔已逃到晋西南重镇大麦郊的阎锡山。

太原失守前夕，攻占太原附近榆次县城的日军派一股部队袭占祁县、平遥。阎锡山的平遥县长程某如惊弓之鸟，早已打点好行装，一闻得日军过来了，顾不得什么“守土抗战”，马上带领手下人马和当作县财政命根子的大烟，一溜烟地逃过汾河，来到孝义县兑九峪，准备去大麦郊。平遥的牺盟会特派员是共产党员李文炯，一到兑九峪就找随邓小平南来的韦国清请示办法。邓小平得到消息，马上风风火火赶到兑九峪。

李文炯把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同时请示说：“现在我们想回平遥去‘守土抗战’，不过几十条枪都掌握在县长手里，他要是不同意，事情就不好办。”邓小平听了马上说：你拿着阎锡山这个令箭，好好劝县长回去，组织游击队，他当司令，你当副司令，八路军会帮助你们。他要是听你的，我来





说服他。

平遥县长根本不听李文炯的劝说，反倒像猎狗嗅到了危险气息一样，连声催促赶快修理大车，准备溜走。邓小平得知后，派了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把县长和李文炯“请”来，晓以大义，动员他们回平遥，并告诫县长：阎锡山有言在先，不尽“守土抗战”之责，后果是很严重的。李文炯表示，愿意带人枪回去打游击。平遥县长见他们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逼自己表态，只得嘤嘤嚅嚅地说，不把物资送到省府，日后无法交代。邓小平厉声喝斥：敌军打来，如果丢下老百姓逃跑，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每支枪，每粒子弹，每文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用到抗战上，老百姓有权利说话，望贵县长三思！

平遥县长回去后心里打鼓，但让他重回战地，他死也不敢。李文炯见县长还要跑，决心让士兵们说话，搞一次“逼宫”。他来到驻地，找牺盟会自卫队训练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面授机宜，然后找到县长，表示弟兄们都不愿继续逃跑，要回去守土保家，请县长去说话。县长怒气冲冲地来到会场。可是他一说要去大麦郊，底下就有人站起来大声反对，高喊：“回平遥！回平遥！”有人还气势汹汹地挥舞枪支，要县长和李文炯立刻表态。李文炯就势答应跟他们回去。县长一看众怒难犯，只好把物资枪械留下，只身怒气冲冲去大麦郊，找阎锡山告状去了。李文炯马上带领队伍随邓小平去下堡八路军驻地整训。

这时候下堡也是热闹非凡。不但祁县、汾阳、文水、交城各县的县长带人马蜂拥而至，孝义县长刘怀伟听到日军占领平遥的消息，也慌了手脚，带着人枪逃离孝义县城来到此地，还把背不动的枪支、手榴弹都扔到井里。为了防止这些人继续逃跑，邓小平下令部队在下堡实行戒严，然后让平遥和孝义的游





击队下了这些县长和手下们的武器，扣留了他们带的物资。刘怀伟趁人不注意，偷偷给阎锡山打电话，状告战动会和牺盟会人员“叛变”，在八路的怂恿下犯上作乱，擅自劫夺枪械物资。阎锡山听了平遥、孝义两个县长的报告，火冒三丈，马上召集部队准备报复。

邓小平得到这个消息，一面做好迎战的准备，一面亲自以孝义牺盟会的名义起草一份致阎锡山的电报，向他揭露平遥、孝义县长不遵军令，擅离职守，弃地逃跑的劣迹，并表示，日寇入境，我们“有必死之决心，无逃跑之余地”。阎锡山看了电报，无法作声。牺盟会总会人员趁机向“会长”进言，说牺盟会特派员留下武器、守土抗战是对的，和八路军没有干系，不要把事情闹大，伤了和气。阎锡山虽然恼恨八路军和游击队夺他的枪和物资，但抓不住把柄；另一面他也恼恨县长们太不给自己争面子，只好忍下一口气，让牺盟会交还他的宝贝大烟土，其他事就不去追究了。

邓小平摸清了阎锡山的态度，松了一口气。他派出干部，把两县游击队组建成八路军晋西游击支队，活动了不到两个月就扩大了好几百人，交给八路军主力。密探立刻把这些情况捅到阎锡山面前。阎锡山自以为抓住了把柄，要对牺盟会和八路军兴师问罪。邓小平闻讯，就通知把这支部队改称牺盟会晋西游击支队，堵上了阎锡山的嘴，使他无可奈何。

有了武装和战动会组织，晋西南的工作就有了稳固的立足点，抗日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为八路军输送了大批兵员和物资。邓小平指导建立起来的游击支队，在抗日中屡建奇功，声名远扬。

1938年1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一二九师政委，离开晋西南上了太行山。





太行战鼓

邓小平赴任一二九师政委，正是日军妄图侵吞华北，把中国军队赶过黄河而加紧发动攻势的时候。蒋介石为了支撑华北局面，防止敌人突入中原，威胁西北、西南，下了一道死命令，禁止一兵一卒退过黄河。当时，在山西坚持抗战的除了八路军，还有阎锡山的晋军和蒋系中央军。八路军习惯了无后方作战，本来也没想过要退到黄河以南。晋军和中央军却被老蒋这道命令吓得六神无主，他们不懂游击战，也没有敌后作战经验，面对日军凶悍的攻势手足无措。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指挥部队打几个漂亮的敌后战斗，帮助友军适应敌后战争。

不过，仗也不是那么好打的。日军在山西吃了八路军几次大规模伏击战的亏，也学乖了。出来的时候是大队人马协同，平日里就龟缩在坚固设防的城镇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八路军没有重武器，攻坚很困难。怎样才能把敌人调出来，在野战中吃掉它？刘伯承、邓小平一合计，想到了一块儿：围城打援，即派部队佯攻位于邯郸到长治公路上的黎城，吸引潞城敌人出援，在中途伏击援敌。为了给国民党军一个学习敌后作战机会，打个胜仗鼓舞他们的士气，刘邓提议同他们联合作战。想不到这些友军装着虎狼的牙齿，肚子里却是一个兔子胆，不敢碰日本人，还用种种借口拖延参战。刘邓只好决定单独干。

在师部的军事会议上，刘伯承把作战意图一说，大伙的精神都很振奋，但也有人担心地问：“我军袭击黎城，潞城敌人





会不会上钩派兵增援？”

邓小平很有信心地说：“敌人肯定是要出来增援的。黎城是它的重要补给站，我们打黎城，等于在敌人脖子上扎刀子，敌人不会坐视不顾的。”

刘伯承接着说：“兵法云，‘攻敌所必救，歼其救者。’我们现在打在他的要害部位，不愁他不上当。当然，潞城敌人有三千，要是都送出来给我们吃，我们没有这么好胃口。我考虑派少部兵力在潞城外面骚扰敌人，敌人顾虑我们乘虚攻城，一定不敢倾巢出援，仗就好打了。”



根据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布置，七六九团去佯攻黎城，七七一、七七二团和补充团在公路旁设伏，还派一支小部队在潞城周围骚扰。伏击点选在黎潞公路上的神头岭。神头岭表面上看来光秃秃的，只有一些废弃的工事，离最近的山梁也有百多米，好像不便于打埋伏。刘伯承、邓小平和陈赓旅长商量后，决定利用这种地形，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1938年3月15日夜，战斗打响了。担任佯攻的七六九团





假戏真做，对黎城发动猛烈攻击，又故意不派人去割通向潞城的电话线。黎城守敌耳听得枪声爆豆般响，黑夜里摸不清八路虚实，慌忙向潞城求救。潞城守敌一听黎城遭袭，深怕兵站有失，慌忙纠集兵力准备出援。忽然潞城四周也枪声大作，几处火起，敌人怕黑夜出援吃八路的亏，只得要黎城方面死守待援。

第二天大清早，听了城外一夜枪声的潞城日军指挥官，留下一千五百人守城，防止八路乘虚攻城，派出两个步兵中队和两个辎重中队一千五百人，浩浩荡荡杀奔黎城而来。

三月的早晨，天气还很冷，神头岭的山冈上，大雪初晴，寒风呼啸着翻越山梁。增援的鬼子兵穿着厚军装一阵急行军，气喘吁吁地爬上神头岭，却发现前面公路上被人挖了五六条丈余深的陷坑，截断了去路。鬼子大队人马被迫停下来，百多辆大车拥挤在一块。鬼子队长对这种“土八路的小小手段”不屑一顾，他抓起望远镜狐疑地朝远处的山梁望了望，恰恰忽略了脚下已司空见惯的旧工事。他自然是什么也没有看见，又叫机枪手向四周胡乱扫射了一通，也没见什么动静，于是把手一挥，下令原地休息。

这时，刚刚还是静悄悄的两侧坡地上，突然迸发出尖利的号音。霎时间，枪声、迫击炮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许多鬼子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送了性命，活下来的惊惶四顾，乱成一团。鬼子队长慌忙下令组织顽抗，可是公路上光秃秃没一点隐蔽的地方，而八路军却如神兵天降，转眼杀入敌阵，把鬼子分割成几段，一阵白刃战，就杀得鬼子死伤一片。腿快的急忙向黎城逃窜，被佯攻黎城回师的七六九团杀个正着，只有少数残敌侥幸逃回潞城，报丧去了。鬼子队长见大势已去，绝望地在战场上剖腹自杀。





钟头就被全歼，还丢下大批骡马辎重，日军对这一惨败痛心之极。对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的这次战斗，日军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是“支那第一流的游击战术”。

输红了眼的日军急于报复，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又指挥部队寻找战机，在黎城、涉县间巧妙设伏，取得了响堂铺战斗的胜利。骄横的日军旧恨未报又添新仇，又气又急，马上纠集十多个联队三万多人的兵力，分九路围攻晋东南，寻找一二九师主力决战。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一道指挥部队避实就虚，飘忽不定，把敌人拖得晕头转向，然后寻找战机，在武乡长乐村截击敌人苦米地旅团，歼敌二千二百多人，只是因为担任打援任务的国民党部队一枪不放地让过敌人援军，才使敌人免遭全军覆没的命运，并给一二九师造成八百多人的伤亡。苦米地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得过日本大本营勋章、自称是“墨索里尼”的侵略强盗，也因作战失败受到上司的处罚。

日本侵略者对指挥一二九师屡战屡胜的刘伯承、邓小平恨之入骨，把刘伯承、邓小平的相片发到部队，悬赏捕捉。有一段时间邓小平去太岳领导工作，日军得到了消息，又在发给部队的邓小平相片上加上了“在太岳”三个字。

对参加神头岭歼灭战的陈赓率领的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敌人更是恨得牙根疼，曾经多次举着“专打三八六旅”的大牌子到各地窜犯，寻机报复。不过鬼子始终没能抓到刘伯承、邓小平，也没能寻到三八六旅的主力，反而在他们手下吃了更多的败仗。

一二九师的战旗，高高飘扬在太行山上。





教训凶顽

就在八路军在前方浴血奋战的时候，一团阴云正从大后方的重庆升起，向他们头上飘来。1939年1月，蒋介石逃到四川后，刚有了一点喘息的机会，就迫不及待地指使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向合作抗日的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后背挥起战刀。

在太行山，国民党新上任的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和手下坚决反共的张荫梧等人相配合，对八路军大打出手：

1939年2月12日，八路军东进纵队二团事务员王升南等八名战士，在战斗中与部队失掉联系，归队的时候进入国民党军防区，顽军把他们抓起来，抢夺了武器、财物，鸣枪威吓，又凶残地把他们推入河中。幸好河水浅，这几个战士才没被淹死，侥幸生还。

二三月间，国民党军赵云祥部多次袭击八路军，残忍地活埋了八路军官兵四十四人。

5月5日，八路军一二九师某部回民连与日寇遭遇，在转移途中，竟然又被国民党保安部队偷袭，干部战士六十多人被强行解除武装。

5月15日，国民党石友三部队抢走八路军迫击炮两门、步枪六百多支和许多炮弹、炸弹、军衣。

8月，张荫梧、庞炳勋部公然大规模攻打八路军部队，叫





嚷要向八路军“收复失地”。

大大小小的“摩擦”事件，举不胜举。八路军为顾全大局，处处忍让，鹿钟麟、张荫梧却得寸进尺，气焰越来越嚣张，摩擦越搞越起劲。

顽军的行为早已超出了八路军忍受的极限。8月，邓小平针对张荫梧等人越演越烈的“摩擦”丑剧，愤愤地说：“这些摩擦专家们欺人太甚了，应该教训教训他们！没有斗争，抗日统一战线就巩固不了。如果我们的部队都叫人家搞垮了，哪里还有什么统一战线可言，就只剩他国民党一家‘统一’了！”

当时，搞“摩擦”最积极的是张荫梧、王子耀，石友三刚从山东调来河北，孙殿英是骑墙摇摆，不时对八路军搞点小动作，还不算积极。在布置反“摩擦”的时候，邓小平也根据形势作了周密部署：“我们还是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对这几个人，也要区别对待。对石友三、孙殿英，目前以争取为主。对搞我们最积极的张荫梧、王子耀，这次要毫不客气地打击一下。建议朱总、彭副总两司令给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去电，陈述张荫梧罪行，要求撤他的职！”

对顽军的摩擦，八路军官兵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一听要对顽军动手，个个摩拳擦掌。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部署下，反击作战才打了不到半个月，张荫梧和王子耀就被打得全军覆没。石友三和孙殿英果如邓小平所料，隔岸观火，坐视张荫梧和王子耀被消灭。

蒋介石眼见爪牙被痛歼，心头升起一股无名邪火。可是面对邓小平、刘伯承部通过八路军总部送去的张荫梧罪行的铁证，也只得打落牙齿肚里吞，把张荫梧停职查办了。不过，换上了自认为反共更有办法的朱怀冰。

朱怀冰反共果然是“很有一套”，一上任就搞了一次“政权民选”，指使一些党棍、流氓，大闹大嚷，想搞掉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民主政权，让八路军失掉民众基础。朱怀冰还美其名曰是和八路军比“进步”。结果，这种“民选”闹剧一无所获。

朱怀冰见文的一手不行，立刻撕下面具，赤膊上阵。他一手拿着蒋介石“军令、政令统一”的“尚方宝剑”，一手拿着枪杆子狂舞，向八路军“收复失地”！1940年2月初，朱怀冰终于大打出手，向八路军总部和八路军一二九师部队打响了罪恶的第一枪。

毛泽东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朱怀冰打响第一枪，八路军就敢打第二枪、第三枪。八路军总部调兵遣将，准备反击。2月底，邓小平受命指挥这次反顽作战，这就是史家所称的“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

大战之前，邓小平根据以往作战的经验和对手之间面和心不和的情况，很快作了部署：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根据目前顽军的态势，我们应该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冰部，监视鹿钟麟和孙殿英部，尽可能争取他们中立。

3月5日凌晨二时，“磁武涉林战役”全面开始。八路军攻势极盛，势如破竹。

朱怀冰搞“摩擦”虽说是专家，真正刀对刀、枪对枪地干起来，却是个草包。经八路军一昼夜攻击，朱怀冰数万人的部队就溃不成军。他万万没想到八路军这么快就攻到他的指挥部来，一时措手不及，慌忙率部逃跑，被八路军一阵猛追猛打，狼狈不堪。最后，战区长官卫立煌不得不亲自出面调停，八路军按“有理、有利、有节”的精神，同意谈判，停止追击。朱怀冰残部才得以遁去，大批辎重作了一二九师的补给。

而奉令协助朱怀冰攻打八路军的几路杂牌军，果然又如邓





小平的预料，纷纷骑墙观虎斗。刘伯承、邓小平经过孙殿英防区时，孙殿英还请他们“撮”了一顿。当然，刘伯承和邓小平也没忘这“一饭之恩”，1947年孙殿英做了俘虏，刘伯承和邓小平也请了他一顿，还命令护送人员好好照顾他——这是后话。





邓政委和“大生产运动”

1942年至1943年，是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年代。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侵略军日益感觉到活跃在自己后方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对交通线和后方基地的严重威胁，他们逐渐把侵华的主力调到后方对付八路军、游击队，大搞“治安肃正”作战，其手段之野蛮残忍，为世界战争史上前所未见。烧光、杀光、抢光；移民并村，制造无人区；挖封锁线、隔离壕……各抗日根据地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而蒋介石即使在大敌当前的民族危亡时刻，也没有忘记腾出一只手来对付八路军、共产党。他的军队制造一次次流血的“摩擦”，封锁陕甘宁边区，禁止武器和各种军需物资流入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1940年9月，正当华北八路军如火如荼地在敌人交通线上展开规模宏大的“百团大战”时，蒋介石却乘机全面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八路军的每一支枪，每一颗子弹，每一粒药丸，每一斤粮，都必须用战士的血和汗来换取。

面对严重的困难，毛泽东用他特有的幽默说：“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告诉全体将士们：“我们的家今天要自己来当了。”

共产党、八路军自己动手——这就是史称的“大生产运





动”。

1943年，整个太行区和冀南区，以及太岳区的大部和冀鲁豫区的一部，遭受了几十年未见的特大旱灾，有些地方耕地旱得根本不能下种。久旱不雨，下雨就是豪雨，又使遭旱灾的土地接着再遭水灾。水灾刚过，又紧接着闹了虫灾。无数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日月无光，风云失色。最大的蝗群，有方圆几十里的一大片，一落地，连沟渠都填满了，没多大功夫就能把几十、几百亩地的庄稼毁得一干二净。有的地方还遭雹灾，鸡蛋大的雹子不但砸坏庄稼，连人畜都不能幸免。祸不单行，可怕的霍乱病又袭击了根据地，仅冀南一个区，死亡人数就达二十多万，这对于人口稀少的根据地，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天文数字。

绝不能让天灾肆虐！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领导军民，向空前的天灾开战。

当蝗虫铺天盖地袭来的时候，好多老百姓都吓呆了，由于愚昧、迷信，人们认为蝗虫是“神虫下凡”，打不得，越打就越多。结果农民纷纷禳祭祈祷，烧香求神，就是不去打蝗虫。刘伯承、邓小平领导部队、北方局、边区政府及时向人民宣传“打破迷信，人力胜天”的口号，组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灭蝗运动，并且命令部队也出动和群众一起灭蝗。根据地买不到灭蝗的药材，群众就想了很多有效的土办法：一是组成剿蝗队，手拿器具对蝗虫狂扑猛打；一是黑夜里点火诱杀蝗虫，蝗虫扑火就自己掉到火旁边的大水盆里。有的趁早上起露水，蝗虫翅膀湿了飞不动时“手到擒来”，还有人堆上草，蝗虫成堆飞进去避寒时一把火烧死。最有效的是趁虫卵没变成蝗虫时挖出来消灭。这一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军装的和穿军装的，成千上万的人奔波在田野里，与蝗虫展开了抢粮夺食的斗争。人终于战胜了“神虫”，从老天爷劫后的土地里收到了





三成以上的粮食。

那一阵子，蝗虫竟然成了风行一时的食品，一斤蝗虫可以卖到五六块钱。人们把蝗虫炒着吃，或是磨成面掺到玉米面或糠里做烙饼和蒸窝头吃，或是煮熟后晒干当干粮存起来。吃不着粮食就拿蝗虫来填肚子，也算是化害为利吧。

为了帮师部驻地群众对付旱魔，邓小平和刘伯承连续熬了几个通宵，制定了修建引水渠，引清漳河水上山浇地的方案。邓小平又亲自主持各种会议，研究建渠的事情，决定拨款用“以工代赈”方式招募灾民开山修渠。为解决技术问题，邓小平派人从河南请了二三十个石匠帮助修渠，派人到敌占区买了一台测量仪器，让政治部两个同志专门负责测量。邓小平和刘伯承还亲自到工地同民工一起抬石头、垒石堰，经常亲临现场指挥，解决各种难题。

艰苦奋斗一年多，这条渠道终于建成。渠道首起下温村，尾至茨村，途经八个村庄，长二十七华里，使沿渠三千五百多亩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地，为当地人民和军队抗灾度荒，改善生活，支援前线发挥了巨大作用。当地农村剧团编了一首歌来感谢亲人：“水流南山头，吃饭不发愁。没有八路军，这水怎能流？”

1943年8月初，盼望已久的雨水终于从天而降，根据地军民欢呼雀跃，有人竟一头冲进雨幕中，尽情地让雨水冲了个透心凉。邓小平想到的是，要抓紧时间，抢耕抢种。他命令部队组织助耕队帮助人民耕种，自己也亲自组织一个助耕队参加。耕地的骡马不够，刘伯承和邓小平下令，部队暂不担任军务的军马全部调回来耕地！

为了尽量减轻人民负担，贯彻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在灾情稍有缓解的时候，刘伯承、邓小平布置发动部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邓小平亲自动手，参加生产。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支起纺车，工作之余就摇车纺纱，在阵阵嗡嗡声中，抽出缕缕白纱，他还手拿纱锭和参谋人员观摩比较。驻地的清漳河边有一块苇子地，邓小平亲自带人，挖地三尺，除掉苇根，开成耕地。

机关驻地周围有一大片菜地，是邓小平和刘伯承带领干部家属开荒开出来的。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也种上了一块菜地，种了好多菜。邓小平最爱种的是辣椒。为了种好辣椒，他着实下了不少工夫。他还让后勤部从外地引种西红柿，他亲自动手栽种、剪枝打杈。夏天，枝上竟然结上了红嘟嘟的果实。驻地群众都来看了新鲜，啧啧称赏这“洋柿子”。在邓小平的帮助下，太行山麓，群众种出了一片片的“洋柿子”。

有意思的是，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实行供给制、一讲个人收入就被斥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毅然提出“奖勤罚懒”的建议，并制订奖勤罚懒的制度，调动干部战士的生产积极性。对生产模范、劳动英雄，要给予一二百元奖金（公布时又提到二三百元），比起当时战士每月一元五角的津贴，这可是真正的“重奖”了。对懒惰、不积极参加生产的，要说服教育，再不改就要处分。

邓小平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张际春、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北方局组织部长刘锡五、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周桓几个人，征得当地村政权同意，租用了二亩公产水地，立下“军令状”，保证来年按规定交租、出负担。他们还“聘请”当地一个老农民担任“技术顾问”，指导他们上粪、犁地和下种等农活。几个人天一亮就下地，忙着担粪、平地，没用多久就完成了秋耕秋种的任务。以后，又抽空到这块“承包地”里锄草、做农活。刘伯承夫人汪荣华、邓小平夫人卓琳等女同志也随同太行区机关组织的开荒队到黎城武子沟开荒种地。女同志不能干重活，就烧水做饭。地里大家轮流去，主要





是种萝卜、种菜等。

在邓小平等领导人亲自参加生产的带动下，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1944 年就完全度过了饥荒，取得了多年来第一个丰收。连满心指望困死、饿死八路军的日本鬼子，最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共的生存力极为坚韧。”





斩断“抢桃子”的敌手

抗战胜利后，龟缩大后方的国民党军，马上出动同人民争夺胜利的“桃子”。在国民党向人民抢夺胜利果实的各路军队中，动手最快的是阎锡山。日本一投降，他就指挥晋军突入八路军的游击区，从八路军眼皮底下夺去了上党地区。

上党地区是指山西省东南部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这一带山脉连绵，峭崖嶙峋，自古以来因其地势高矗，与天为党而得名。这个地区东面是太行山，西面是太岳山，北面也是丘陵和山地，南面是中条山，形成一个脚盆状的小平原。“盆”内有长治市和潞城、襄垣、长子、屯留、壶关等县，“盆”外有平汉路、陇海、同蒲、正太等铁路干线环绕，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个地区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开辟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到抗战结束前，上党盆地完全处在八路军的控制之下。阎锡山堂而皇之地“收复”了去，等于在八路军控制区打进一个楔子，八路军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这边阎锡山夺了上党，那边蒋介石三请毛泽东“谈判国内和平”，8月28日毛泽东飞到了重庆。果真这么“和平”下来，阎锡山当然就捞了一个大便宜。

只不过，毛泽东去重庆前已经告诉了他的战将：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谈判还是要去谈的，仗可不能不打。你们打得越狠，我在重庆越安全，谈判的地位就越有利！

刘伯承和邓小平有了这个底，当然要狠狠地打一家伙。





9月3日，刘邓在襄垣城的文庙里开了上党战役动员会，邓小平严肃地说：对蒋阎军的进攻，我们只能坚决回击。日本侵略者来了，阎锡山丢掉国土和人民，逃过黄河，驻在陕西宜川的秋林镇，又跟山西日本人勾勾搭搭，密使往来，以保存实力。如今日本鬼子投降了，他来抢占胜利果实，来消灭我们。他是师出无名，只能遭到人民的反对，正义和真理在我们这边，老百姓支持我们，我们必定会胜利！全体指战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消灭敌人！

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八路军太行、太岳和冀南主力三万余人迅速向上党集结。

根据部队集结情况，邓小平提出，把战役发起的时间推迟两天，得到了刘伯承和李达的同意。

9月10日凌晨，上党战役打响了。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指挥部赶到前线指挥，各部队见司令员和政委亲临前线，人人奋勇争先，长治外围据点被迅速扫清。八路军兵临长治城下。

阎锡山一看长治被围，慌忙拼凑了二万八千多人马，从太原出发，星夜南下，驰援长治。敌情突变，刘伯承和邓小平以变应变，改变了攻取长治的计划，决定“围城打援”，用不占优势的兵力和火力，在野战中歼灭援军，再取长治。

入夜，长治大雨。围攻长治的部队，用少部兵力对长治继续佯攻，主力迅速撤离阵地，头顶大雨，踏着泥淖，连夜赶往打援的预设阵地。打援部队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苦战，于10月7日把两万多援敌全部歼灭。而躲在长治城里的敌军，在佯攻部队的牵制下，不敢离城半步。太原城里的阎锡山也不断发电报给他们打气壮胆，说什么“上党必争，长治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灭”。如今灭了的不是“叛军”而是援军，长治守敌这才如梦方醒，慌忙趁着大雨浓雾，丢下“必守”的长治，向西逃去。刘伯承和邓小平马上指挥大军追击，把敌人全歼在





长治城西的将军岭，长治守将史泽波也成了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阶下囚。

在遥远的重庆，蒋介石眼见战场上捞不着好处，只得在“双十协定”上签了字。10月17日，回到延安的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用他那诙谐的语言评论了上党战役：“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上党战役硝烟未散，“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为了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成果，打击来犯的国民党军队，刘伯承和邓小平又指挥大军东移，组织平汉战役。

平汉铁路是联系华北和中南的南北大动脉，如果国民党能迅速打通平汉路，那他们向华北和东北运兵的速度必定会大大加快，而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在华北和东北的争夺中就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在这条路上，胡宗南的腿快，沿正太路夺去了石家庄，刘邓部队也不示弱，在激战上党的时候，也不忘记派出太行部队，连续攻下邢台、邯郸、临洛关，控制了北起高邑，南到磁县的三百里铁路，彻底切断了华北与中原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联系，关上了华北的大门。为了打通平汉路，蒋介石一面在和平谈判中挥舞起“恢复全国交通”的旗号，一面调集十万大军，从南向北沿平汉路向邯郸攻来。

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制定作战纲领，决定只放四万敌军进预设战场，把其他敌军阻击在外，然后发起攻势消灭进入包围圈的敌人。刘伯承和邓小平还下命令，把预设战场上的铁路、





碉堡全部平毁，以防敌人筑成坚固工事。

敌人急于打通平汉路，果然硬着头皮往刘伯承和邓小平安排好的口袋里钻，马法五的四十军、高树勋的新八军和鲁崇义的三十军共四万多人，被刘邓牵到了滏阳河流域的多沙地带，其余的军队被阻击在漳河以南。待马法五等人明白过来，悔之晚矣。敌人陷入河网和沙丘地带，汽车、坦克成了摆设，跑不起来，遍地的沙丘连防御工事也无法构筑，而四周却一下子围上了六万多刘邓大军。高树勋率领新八军又宣布战场起义！高树勋起义是刘伯承和邓小平分化瓦解敌军的一个杰作。

高树勋的新八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一直受到蒋介石嫡系的排挤、歧视。10月30日，高树勋火线起义，马法五和鲁崇义大惊失色，慌忙突围逃命，途中被解放军歼灭。马法五被活捉。蒋介石打通平汉路希望落空。

作为解放战争的序幕战，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打断了蒋军伸出来抢摘桃子的手，保卫了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刘伯承和邓小平功不可没。





仁义之师

打仗打不过解放军，蒋介石只好又祭起了停战的法器。1946年1月停战令生效，华北战场上的枪声暂时停下来了。邓小平抓住时机，主持了整顿部队纪律的工作。

邓小平作为部队政委，一直十分注意保持人民军队的特点，治军极严。然而，部队自从下了太行山，就面临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很多战士来自山区和乡村，第一次走进花花绿绿的大城市，不禁眼花缭乱。下山以来部队迅速扩充，新兵增多，还有很多解放战士编入部队，教育亟待跟上。连续的紧张战斗使这些工作一时无暇顾及，部队违反群众纪律的事增多了。有一件事使邓小平十分震惊。

1946年的春天，晋冀鲁豫军区警卫团一个战士由于想家开了小差，他是排长带着参军的，出了这事，排长觉得脸上无光，一气之下，带一班人回去，跑到战士家把人捆了就走。村里民兵队长是这个战士的亲戚，听说这件事后觉得排长欺人太甚，马上带了民兵全副武装追上来，骂道：“你当了几天兵有什么了不起，就敢无法无天进村捆人？”排长本来就以为是民兵队长使坏，挖自己的墙脚，把人弄走了。这下子更火了，点着民兵队长的鼻子骂：“你小子才无法无天，挖墙脚，包庇逃兵！”民兵队长一听火冒三丈，掏枪就逼住排长，叫民兵把排长给捆了，双方各据一边，持枪对峙。幸亏村支书及时赶到，好话说了满满一箩筐，双方才没动手。排长回去越想越憋气，又带





着一排人摸黑到村里把民兵队长给捆了起来。事情闹大了，群众议论纷纷。后来刘伯承亲自做工作，事情才了结。

邓小平看到了这件事背后的危机，他大会讲，小会也讲，强调军民关系，强调良好的军纪。他告诫全军：“一定要警惕到，群众不是命运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纪律不好，如果国民党军队纪律好，为什么老百姓不可以跟别人走呢？”

刘邓治军，十分注意群众纪律，他们自己也是身体力行。为了对付国民党空军，部队大多是夜行军，到宿营地时常常是天还没亮，在地里忙活了一整天的老百姓都还在梦乡中。邓小平和刘伯承宁肯坐在村子的麦场上等到天亮，也不让打扰群众。有紧急任务时，邓小平就让人找一个看场人搭起的茅棚，要随从人员点上带罩油灯，开始看地图、起草文件和命令。

一天，刘伯承和邓小平看见军区直属队停了二十五辆大车，排了一长串，不禁都皱起了眉头。刘伯承把直属队负责人叫来，问道：“怎么要了这么多民用车辆？”负责人马上掰手指头数了一长串要运送的物资。邓小平二话没说，掀起一辆车上盖的篷布，见只装了半车东西，他的脸沉了下来，命令把所有篷布都打开，都是这种情况。刘邓的脸色都不太好看了，邓小平狠狠批评了这个负责人，严肃地说：“不爱护民力物力，这是犯罪呀。”负责人的头耷拉下来了，马上把多要的大车还给了群众。

陇海战役，晋冀鲁豫部队取得歼敌一万六千余人的大胜利。这时有人向邓小平反映，说七纵纪律不好，把老百姓的家当都砸坏了，屋子搞得乱七八糟。邓小平马上趟着泥水赶到前线，召开七纵团以上干部会。他先赞扬七纵打仗勇敢，接着就批评他们违反群众纪律。他用那浓重的四川口音严肃地问：你们打仗牺牲了这么多人，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解放人民群众嘛！为什么现在反倒要损害群众利益？你们要搞好赔偿。违





反了群众纪律，就得不到老百姓拥护支持，没有老百姓拥护支持，就不会有战争的胜利！七纵司令员杨勇和政委张霖之当场承认错误。事后张霖之伸伸舌头说，我们打了大胜仗，却挨了大批评哩，以后要注意了。

为了要全军重视这一个问题，邓小平在部队战斗间隙召集各个纵队司令员到司令部开会。一些纵队司令员心想，一出陇海，仗打得辛苦，战果也不小，开会又赶上中秋节，莫不是邓政委犒劳吃月饼？一到司令部，看见刘、邓都是虎着脸，心里一下子都“毛”了。邓小平也不跟司令员们握手，而是高声宣布：“今天要开一个不握手的会议，不要刚打了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欢，心满意足，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要多想一下自己还有哪方面不足？群众纪律怎么样？军民团结、部队团结搞得怎么样？还有哪些问题？你们自己都讲一讲。”杨勇和其他一些部队纪律出问题的纵队司令员只好挨个儿把自己批评了一顿，表示回去要好好整顿。等他们讲完了，邓小平站起来宣布：“会就开到这里，散会！”各纵首长虽然没吃上月饼，有的吃了批评，但大家对这个简短的“不握手会议”印象极深。

整顿以后，部队的纪律观念增强了，产生了很多军民一家、可歌可泣的故事。

鲁西有兄弟俩，是种西瓜的好把式。这一年，哥俩的瓜地上满眼是滚瓜溜圆的大西瓜，谁看了都忍不住要夸一声：“好瓜！”却不料有一天来了“国军”，经过老大的瓜地，不由分说连吃带砸，竟没留下一个带瓢的好瓜。老大气得连哭带骂：“遭瘟的大头兵，走路不跌死，也要打仗吃枪子打死！”过了不久，田头村边又过兵了，经过老二的瓜地，老二想起老大的遭遇，心里火直往上蹿。他拿起一把锋利的西瓜刀来到田垄上，愤愤地想：谁头个下来糟践我的瓜，我就先宰了他。





炎炎烈日烤得地头发烫，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队伍源源不断地行进着，走得大汗淋漓的兵看着瓜地都说：好大的瓜呀，来一个一定又清凉又解渴！还有的说：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真想开一个，哪怕闻一闻也好啊！

老二躲在瓜棚里听着，可是大半晌过去了，没有一个兵下地来摘瓜，连瓜蔓儿也没人碰一碰。老二感动极了，他急忙跑进瓜地摘了七八个大西瓜在路边切开，递给这些不寻常的兵：“老总吃块瓜吧，天气热，消消渴！”兵们却避让着说：“老乡，你这真是好瓜，留着卖钱吧！我们吃不起的。”老二急忙说：“我这瓜不要钱，是送给你们这些好队伍吃的。”这些老总解释说：“白吃老百姓的东西是违反群众纪律的，这瓜我们不能吃。”老二捧着瓜呆呆地看着行进的队伍，简直不敢相信天下有这么好的队伍！他逢人就说，逢人就夸，逢人就打听，后来有人告诉他，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是咱们庄稼汉自己的队伍！

有一户人家正在办喜事，突然听说有部队来了，根据过去“遭殃军”过兵的痛苦经验，村里人都逃走了，喜宴上的人走了个精光。新郎也带着新娘逃跑了，但舍不得满屋簇新的家当，临走还是忍不住把门带上了，心里也不抱希望。其实，来的不是人们闻之色变的遭殃军，而是刘邓领导的解放军。战士们虽然疲惫已极，但见老百姓不在家，都自觉地在屋外宿营。部队过后，村里人都回家了，新郎看见自己的屋门依然关着，簇新的大红喜联下有两行醒目的字：老乡不在家，开门就犯法！

刘邓部队是仁义之师的美名在新区迅速传开了。

刘邓部队爱护人民，人民也全力支援子弟兵。1947年2月，刘邓大军二出陇海线，蒋介石提前在黄河花园口堤段堵口，把黄河引归故道，企图把刘邓大军隔在黄河以南予以聚





歼。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趁大水还没有到，在黄河上架桥北渡，邓小平亲自到河边选定了建桥点。可是这一带是冲积扇地区，筑桥材料奇缺，要赶在大水到来前架起能让大部队和重武器通过的桥极为困难。解放区的群众想出了一个办法，用高粱秆扎成捆做建桥材料，用木桩固定，每层高粱秆上铺层泥土。为了赶时间，群众不分男女老少，白天黑夜奋战在工地。老天爷也来帮忙，这天夜里刮起了北风，下起了大雪，把这个“桥”冻得十分坚硬，只用了三天，一座用高粱秆加木料建成的一千多米长、三米多宽、高出水面一米的“玻璃”黄河桥就建成了。刘邓大军开着缴获的美式军用十轮大卡，拖着缴获的榴弹炮，浩浩荡荡地开到了黄河北岸。

蒋介石在南京闻讯，目瞪口呆，大叫：“天亡我也！”





神兵夜渡黄河天险

打了一年的全面内战，蒋介石损兵折将，只得到一百多座空城，他不得不改变战略，变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采取钳形攻势：一头在山东，一头在陕北，而中央战场的黄河防线，好像是联结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把子。中共中央针锋相对，指示刘伯承和邓小平：率军在中央突破，打过黄河去，向敌人发起战略进攻！

在中原战场，蒋介石的算盘打在“水”上，他本想趁黄河故道下游堤防未修复，借“引黄归故”之名以水代兵，水淹解放区。只是计谋被刘、邓识破，才没得逞。但滔滔的黄河毕竟把刘伯承、邓小平的十万大军阻隔在北岸了，蒋介石不禁欣喜若狂，得意地宣称：“黄河足抵四十万大军！”他一面加紧重点进攻，一面指使顾祝同调兵遣将，妄图把刘邓大军逼回太行山，吃小米、山药蛋去！

“小米、山药蛋可都是好东西！”邓小平在给部队团以上干部讲话时说，“什么沁州黄狼尾巴（小米的品种）都是好东西。小米、山药蛋养育了我们八年，打跑了日本鬼子。现在这些好东西，我们该留给太行山老区人民享用了。中央让我们反攻，我们要准备吃大米饭去！”

为了迷惑敌人，刘伯承、邓小平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方针。6月中旬，他们把十二万盘马弯弓的大军，不动声色地埋伏起来，碰到手痒痒的部下来请战，总是下令：不要出击，好





好休息，不要暴露目标。同时，命令太行、冀南军区部队伪装成主力，与敌人打得热火朝天，把敌人视线吸引到豫北。豫皖苏部队也向开封以南佯攻。蒋介石和顾祝同以为计谋得手，高兴得很。国民党郑州前线司令部发表电评宣称：共军刘邓部南进不成，已被迫“西窜”，想夺路逃回太行山！守在黄河南岸的国民党军两个师，本来还挖了滩头阵地，听指挥部说共军不渡河了，放心地收了家伙，根本没进入阵地。而恰在此时，刘邓大军已作好渡河准备。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十二万人悄悄来到黄河边，登上早已隐蔽好的渡船，向对岸疾驶而去。一轮皓月当空，微风吹拂着两岸的青纱帐，鲁西南的夏夜格外宁静，黄河上千帆竞渡，格外壮观。

守候在对岸的敌军哨兵终于发觉了，惊慌地喊叫起来。我军马上由偷渡改为强渡，隐蔽在青纱帐里的大炮猛烈轰击，敌军阵地变成一片火海。

刘伯承和邓小平安详地站在船头上，河水轻拍着船舷。这时，天空传来轰鸣声，几架国民党军侦察机飞过头顶，似乎察觉了什么异常，丢下了几颗照明弹。邓小平笑着对刘伯承说：“敌人怕我们渡河寂寞，还来点亮了‘天灯’！等他们想清楚了，我们也早就过河了！”渡河先头部队只用十多分钟就登上了对岸。

在南京的总统官邸，蒋介石正设宴招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国防部作战厅长拿着空军侦察情报匆匆闯了进来，递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看过，顿时面孔煞白。司徒雷登好奇地看着他。好一会儿，蒋介石才缓过神来，把纸条递给司徒雷登看。这个向来温文儒雅的“中国通”看了以后，大声惊叫：“这是一个惊人的消息！东方的马其诺防线被攻破了！”他愤愤地转向蒋介石：“美国政府每个月用三千万元军费、一千五





百万元的政费支持国民政府和它的军队。可是总统阁下，这支军队使用世界头等的美械装备，却眼看着足当四十万大军的黄河防线被突破！我们当如何解释？！”

蒋介石竭力掩饰着内心的惶恐和尴尬，说：“大使先生，请不要过虑。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把刘邓军赶下黄河去！”

司徒雷登不相信地说：“但愿如此！”

蒋介石这次是真急了，他把原准备东调山东的王敬久部队也调到鲁西南，集中七个旅的兵力，想逼刘邓大军背水一战。邓小平看清了敌人的用心说：“敌人想逼我们背水一战，置我们于死地，我们可不去死地。我们为着人民利益，要生存下去，让敌人去跳黄河！”刘邓大军主动出击，发起鲁西南战役，连续消灭了几个旅的敌人，然后围攻扼守羊山集的敌六十六师。蒋介石急得大骂王敬久，又给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发电报，把“上帝”都请出来了：“希弟信赖上帝庇佑，争取最后五分钟胜利。”

然而，蒋介石的“上帝”若不是忘了他，就是光顾了作为无神论者的刘伯承和邓小平。三天以后，号称“内战先锋”的宋瑞珂，在解放军猛攻下，打着白手帕、反戴军帽投降了。国民党军二十天里丢掉四个师、九个半旅，坐镇开封的蒋介石一口恶气全倾泻在前线总指挥王敬久身上，骂声不绝，最后，厉声宣布：“你被撤职了，我要送你上军事法庭！”





千里跃进大别山

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后，在鲁西南地区歼灭大量敌军，但是敌人还在不断涌来，想把刘邓大军赶过河去。恶劣的天气也帮助了敌人。7月下旬以来，阴雨绵绵，黄河水位暴涨，千里黄河大堤险况频仍。

邓小平和刘伯承忧心如焚，紧张地考虑着挺进大别山，完成中央战略部署的时机。留下打几仗，多歼灭敌人，南下的压力可以减轻，还可以和友邻部队相配合。另外，部队连续作战，一直没能得到休整，留下来寻机休整可以解除疲劳。可是，万一黄河决堤耽误渡河，后果不堪设想。他们还不得不防备：南京城里的蒋介石，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时机，万一他故伎重演，派飞机炸毁河堤，军队和百姓将遭灭顶之灾。

权衡再三，刘伯承和邓小平终于下了决心：立刻就走！

1947年8月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十多万大军，在黄昏的掩护下，拔营南征。

蒋介石已连续几天派飞机侦察黄河水位上涨情况和刘邓大军动向，只等时机一到，炸毁黄河大堤，来演一出现代的“水淹七军”！这一天，国民党空军侦察机又像往常一样飞临黄河上空，惊奇地发现：黄河的激流还在汹涌，河边的刘邓大军却一夜间无影无踪。蒋介石闻讯，大发雷霆。早已准备好的重型轰炸机也派不上用场了。

刘邓大军日夜不停地前进，跨过陇海线，走过遍地泥泞、





千里无人烟的黄泛区，渡过大沙河，到达河南中部的汝河。

蒋介石原以为，刘邓大军南下，是因为北渡黄河不成，向南夺路逃生，所以给前线下的命令是追。刘邓大军通过黄泛区和沙河以后，他才如梦初醒，察觉到刘邓大军不是什么向南流窜，而是贯彻既定战略，向中原挺进，把战火烧到自己“国都”旁的战略地区——大别山。他急忙调集几万人马，严守汝河南岸，准备前后夹击刘邓大军。

汝河之战，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途中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是能否完成战略反攻任务的关键。这时前有阻敌，后有追兵，中间隔着一条汝河，形势十分严峻。刘伯承和邓小平下令：敌前强渡！用刺刀和手榴弹在敌人阵地上杀出一条血路！邓小平充分意识到这个决定将冒多大的风险。他命令：各部门立即把机密文件全部烧毁，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战斗激烈进行，敌人拼死顽抗。刘伯承和邓小平冒着枪林弹雨，亲自赶到前卫团去指挥战斗和鼓舞士气。刘伯承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冲过去！现在任何犹豫，都将是对人民革命事业犯罪！”邓小平也严肃地说：“困难，现在确是困难！没有困难，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部队经过浴血苦战，终于在敌阵地撕开一个口子，杀出一条血路，继续南进。

8月26日，刘邓大军来到最后一道险关——淮河。敌人还在后面紧追不舍，不巧的是，淮河也进入了汛期，前面指挥员报告刘邓：无法徒涉渡河，只有靠十来只小船摆渡。情况紧急，邓小平果断地建议：由他指挥部队阻击敌人，刘伯承先行过河，指挥已过河的部队前进。

邓小平把危险和困难留给了自己。

刘伯承赶到淮河边，登上一只渡船，手里还拿了一根很长的竹竿——他要亲自测量河水的深度！走了一段，他大声对北岸的指挥员喊：“我试了好多地方，河水都不太深啊！”过了





河，他马上要派人在水不太深的地方架桥。突然，他惊异地发现上游竟然有人牵马徒涉过了淮河。他马上写信给对岸的指挥员，命令他转告李达参谋长：部队寻路徒涉淮河！

大军立刻分路徒涉，终于安然渡过淮河。

等国民党军气喘吁吁赶到河边，刘邓大军已全部过河。敌人指挥官听说刘邓大军是徒涉过河的，也命令部队徒涉。不料先头部队刚下河，就被河水冲走了几个——事情竟这么巧，刘邓大军刚一渡完，淮河洪峰就下来了，河水暴涨。敌人在淮河北岸，半个多月也没能过河。



过了淮河，逐渐走上了坡道。路边，开满了各式各样的野花。山坡的一面是茂密的松树，一面是层层梯田。紧张的战事也得到短暂的缓解。

1947年8月31日，刘邓大军到达河南光山县，邓小平满怀激情地告诉部队：“同志们，我们已经来到了大别山，完成了战略反攻第一步！”

大别山，雄立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是俯瞰中原、威逼





江淮的战略要地，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南京、武汉。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解放军几次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又几次被迫撤离。当年红军走后，国民党曾在这一带残酷镇压，石要过火，人要过刀，给大别山人民带来了浩劫。刘、邓来到大别山，感触极深。他们一到大别山，安排给他们休息的，是一间黑洞洞的窄小屋子，里面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婆正在熬稀饭，她端了一碗给刘司令员，说：“喝口稀的吧！看，眼窝都塌下去了。唉！这么大年纪还当兵！”刘司令员十分感动，接过稀饭说：“老大娘，我们是当年的红军呀，我们回来了！”老太太听了激动地直抹眼泪，叹着气说：“这次回来，就不要走了啊！”

邓小平的感触是很深的。南下前，毛泽东已经估计到，蒋介石一定会调集大军争夺这块战略要地，我军的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被迫退回；二是付出代价站不住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出代价站稳脚。前两种情况，都将给大别山人民、给整个战局带来严重影响，一定要力争第三种可能，在大别山站住脚！

坚守大别山，面临着许多困难：敌人的围攻、北方战士水土不服……然而，最严重的却是寒冷。

挺进大别山后，刘邓大军在远离根据地，没有后方支援的不利条件下，同优势的敌人在大山里兜圈子，转眼就迎来南下后的第一个冬天。部队刚来的时候，正是酷暑盛夏，几个月一过就到了深秋时间，大别山的寒冬快来临了，十几万将士的身上仍然穿着浸透了南征汗渍的单衣。寒冷，严重地威胁着人们，战士们夜间执勤时有时便不得不披着棉被，脚下放一堆芦花取暖。

远征将士的冷暖，牵动着转战陕北的毛泽东的心，他给刘伯承、邓小平发来一份又一份急电，询问部队冬衣有没有着





落，如果解决不了，就从华北专门派部队送棉衣到大别山来！

刘伯承和邓小平也在日夜为冬装犯愁，但是对派部队送十万套棉衣南下，冷静权衡后还是谢绝了：南下有千里路途，重重险阻，重重封锁，困难太大了。

怎么办？刘伯承和邓小平下令：自己动手！一时间，十万双拿枪的手拈起了针和线，自己动手缝棉衣。刘伯承、邓小平也亲自缝起了棉衣。邓小平穿上“自制”的新棉衣，高兴地说：“你们看，这穿在身上，不是很好嘛？地道的中国手工艺品！”大家都被这一席话逗笑了。

寒冬来临了，凛冽的寒风裹着漫天大雪，凶狠地扑向大别山，但它已经帮不了敌人多大的忙，刘邓大军全都穿上了自制的棉衣，转战在大别山上。

毕竟没有制衣技术，自制的棉衣也还是不那么“完美”的，时间一长，这种棉衣也出了些洋相：有的棉衣里面的棉花聚成一堆，风从棉花薄的地方直往里灌；还有的棉花聚在衣脚，上面成了两层布的夹衣，挡不住风寒。邓小平的棉衣，衣面被刮破了，棉絮翻出来脱了不少，他也不以为意，埋头工作着。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想叫后勤给做一件新棉衣，又不敢这么做，大家都知道邓政委一向严于律己，从不允许给他搞特殊。

邓小平在大别山上，也心系着转战陕北的党中央的安全。这一天，总部电台突然与陕北失去联络，无论怎么呼叫，党中央的电台也没有回音。邓小平和总部人员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在这压抑的气氛中过了三天。第三天，与中央的通讯终于接通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安然无恙，大家不禁一阵欢呼。这时，鄂豫区党委书记段君毅来总部驻地向邓小平汇报工作，平日从不请人喝酒的邓小平一反往常，兴奋地说：“来，今天请你们喝一杯酒！党中央、毛主席历尽艰难，安然无恙，还不值得我们干





杯祝贺吗？”他那素来沉静、坚毅的脸上这天兴奋得满是红光。

1948年的春节快到了，大别山人民虽然身罹战火，对过年还是很看重的。寒风呼啸的大别山，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部队的干部战士也趁这段时间稍事休息。这天，指挥部的几个干部买了两口猪，准备做顿饺子改善生活。有的人到河里捞鱼捉虾，有人去打柴，有人去采黑木耳。大家发现驻地附近有口山塘，水不深，里面有鱼。于是一阵欢呼，一群人兴冲冲来到塘边，挽起裤腿，捋起袖子，下到冰凉的水里抓起鱼来。只苦于没有工具，手又冷，鱼又滑，闹腾了半天也没抓上几条来。有人出了个主意说：“这样抓，冻死了也抓不到几条。干脆，把塘里的水放干了，在口子上支个筛子拦住，叫鱼一条也跑不掉。”说干就干，一会儿，水放干了，一条条圆滚滚的鱼儿在泥浆里扑腾，大伙别提有多高兴了。

正在大伙逮鱼起劲的功夫，邓小平从山坡小路上沉稳地走了过来，一看这边欢呼乱叫的场面，再看看泥泞中乱蹦的鱼，就全明白了。看着这些在大别山的艰苦战斗中熬得又黑又瘦的战士们，他真不忍心去扫他们的兴。他停了一会儿才开了口：“好哇！我们在大别山转悠快半年了，一直没机会改善生活，这下子该打顿牙祭了。”大伙儿见政委过来了，忙敬礼，举着“战利品”请他“检阅”。邓小平笑着说：“看见你们这么高兴，我也高兴。一个革命战士，不管条件多么艰苦，都要保持高昂的士气！不过——”邓小平话锋一转，“我们不能贪图自己高兴就不顾群众的利益。你们看，这池塘的水，是群众筑坝蓄起来，准备对付天旱的。你们这样竭泽而渔，只顾自己高兴，损害了群众利益，群众高兴不高兴？”几个人听了邓小平一席话，再看看池塘下山坡上的层层梯田，一个个傻了眼。邓小平又说：“水已经放干了，后悔也没用。你们要想办法弥补





过失，挽回影响。”

几个“渔翁”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到村里给群众道了歉，赔偿了损失。邓小平也为这事亲自给部队起草了通知，要求全体指战员处处留心照顾群众的利益，决不能“竭泽而渔”。

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注下，部队严格执行纪律，真心诚意维护群众利益，得到大别山人民的支持，为坚持大别山斗争，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又以大别山为根基英勇出击，在中原闹了个天翻地覆，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迎来了战略决战的阶段。收获的季节来到了。





运筹帷幄 决战淮海

1949年1月，淮海战役大获全胜的消息传到了苏联，斯大林听说人民解放军用六十万兵力打败了国民党八十万大军，极为振奋，他在记事本上飞快地写下：“六十万战胜八十万，奇迹，真是奇迹！”新中国一成立，他就给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布置一个任务：到中国后，一定要把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搞清楚。

毛泽东也对刘伯承、陈毅和邓小平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吃下去了！

淮海战役，无疑是邓小平军事生涯中最光辉的一段经历。其中歼灭黄维兵团一战就是一个范例。

1948年11月6日，辽沈战役刚刚结束，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就开始了。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六十万部队，同中原地区八十多万国民党军展开了战略决战。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战役。总前委书记是邓小平。

战役开始，华东野战军围攻黄百韬兵团，邓小平指挥中原野战军迅速攻下宿县，截断徐（州）蚌（埠）线，切断了敌人南逃的退路。宿县是敌人的后勤基地，大批的军用物资“补给”了在大别山斗争后亟待整补的刘邓大军，增加了刘邓大军打大仗的“本钱”。





蒋介石一看徐州告急，急忙命令黄维兵团十二万人火速驰援。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原来只设想歼灭黄百韬和徐州的邱清泉等部蒋军，胃口不大。在前线的邓小平和陈毅、刘伯承一看黄维孤军深入，急急忙忙来凑死，当然觉得不能放过他。他们经过和军委的几次电报“谈话”，终于得到批准。1948年11月24日，毛泽东给了他们“尚方宝剑”，“完全同意先打黄维”，“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相机处置，不要请示”。

黄维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兵团，是跟随国民党军事集团第二号人物陈诚起家的部队。陈诚的军事系统号称“土木系”，“土”是整编十一师，“木”是整十一师扩编的十八军，这个十八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全副美械装备，各级军官都是正规军校出身。这个军构成黄维兵团主力，装备好，作战顽强。而中原野战军在跃进大别山时重武器都搞光了，人员损耗也很大，兵力不占优势，要啃黄维兵团这块硬骨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刘伯承和邓小平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邓小平说：“打黄维，敌我兵力相当，但他的装备比我们强得多。但是，四川有句土话，瘦狗拉硬屎。我们要以最大的决心，不惜最大的牺牲，歼灭黄维兵团。即使中野打光了，消灭了敌人这个王牌，保证全局胜利，付这个代价也是值得的！”

为了指挥作战，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把前委定在永城小李家。这是一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村里稀稀落落地长了几棵树，村前一弯狭长的水塘。在淮北平原一马平川的旷野上，成千上万星罗棋布的村落中，它毫不显眼，然而这里却是几十万大军的指挥中心。

黄维兵团虽说是机械化兵团，可行动起来却如老牛负重，气喘吁吁，在刘邓部队的阻击下，每前进一步都显得格外艰





难。好不容易磨蹭到浍河南岸，就被陈赓率领的中野四兵团打得一步也进不了。这时，被部下鄙称为书呆子的黄维感到了危险，怕中了刘邓围城打援的计谋，决定转道会合另一股敌人李延年兵团后再向北推进。不料下了命令后，送命令的军官却被解放军俘虏了。蒋介石又一再催他快速攻击前进，使黄维进退维谷，犹豫了一整天。

邓小平、刘伯承和陈毅得到黄维改变部署的命令，一分钟也没耽搁，马上命令各路纵队紧急调动，合击黄维。就在黄维彷徨犹豫的那一天里，解放军正从四面八方围过来，黄维的机械化部队只走了十多里地，就被全部包围压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十五华里宽的地区内。

黄维被俘后，为自己这一天的犹豫悔恨得要死。只是，悔之晚矣！

11月25日，包围圈完全合拢。

不过，敌十八军毕竟是很有战斗力的。一发现被包围，立刻紧急应对，在野地上筑起防御阵地，倚仗地形和强大火力，龟缩成一团，顽强抵抗。面对这样一个坚果，缺少钢牙的中原野战军一时有点无可奈何。这时，有人主张用“围师必阙”的战法，虚开一个口子，设口袋让敌人往里钻，在野战中予以歼灭。邓小平不同意，他说：黄维现在身陷绝境，一定十分警觉，不会轻易上当。如果我们开口子，他会顺势占领，照样筑垒，像个大铁球似的滚动前进，我们照样奈何不了他，他还可以利用我们原有工事，又可以获得民间粮食。我们切不可拘泥于战法。现在我们已经包围了敌人，一时吃不下也不要紧，只要加固包围，逐步紧缩包围圈，就可以一口一口把敌人吃掉。

他的意见得到了刘伯承和陈毅的赞成。解放军加紧合围，四面八方搞向心压缩。一到夜晚，各部队都挖交通壕。清早敌





人一看，解放军的交通壕已经挖到自己眼皮底下。解放军还发明了一种武器，能够把几十斤炸药发射到十几米外的敌人阵地上去，一个炸药包就能把敌人地堡送上天，蒋军官兵不是被炸死就是被震得昏头昏脑，等清醒过来，解放军的枪口已指着脑门了。敌人吃足了苦头，恨恨地把解放军的这种“秘密武器”称作“没良心炮”。

黄维看着地图上四面八方的红箭头正朝着自己的指挥部一天天逼过来，终于沉不住气，决定突围。

解放军围得铁桶一样紧，往哪儿突围？黄维只好碰运气，让四个精锐师打头阵，往四个方向撞，撞开一路，部队就跟进突围。

打突围的部队中，有一路是八十五军一一〇师。黄维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师的师长、他的黄埔校友廖运周居然是共产党！廖运周接到命令，马上决定，乘突围之机，带领部队火线起义。他派人把这个情报送到中野二纵，但是，他以前只和刘伯承、邓小平有单线联系，所以二纵领导死活不肯相信这个情报，还把派来的信使当特务扣起来。廖运周等了一天一夜没见动静，当机立断地派另一个地下党员通过别的防区送信，终于见到刘伯承、邓小平。刘、邓马上作了部署，邓小平一再告诫策应起义的部队，一定要稳妥安排，打掉起义部队后面的大尾巴，把黄维兵团主力堵住！

11月27日上午八点半，敌人开始突围，一一〇师的行动提前开始。突围的时候，上有飞机，下有大炮，很是威风。四周枪声不断，可是突围部队无一伤亡——枪是朝天放的。廖运周打电话告诉黄维：“一切顺利！”一一〇师一过，解放军立刻堵上口子，对着随后跟进的敌人猛冲猛打，迫使敌人狼狈逃回。黄维连忙呼叫廖运周，却再也叫不应了。此时的廖运周，早已扔下话筒，命令架线。电话兵拉着电线还往回架，原来他





们不知道起义了，还以为要和黄维联系，哪知道廖师长要和解放军进行联络哩！

电话里，中野六纵领导告诉他，邓政委让转告廖将军，他的家属已由地下党派人从武汉转移到了安全地区，请廖师长放心！廖运周听了心头发热，深深为邓小平政委和党组织细致周到的关怀所感动。

双堆集，黄维听着广播里播送的《廖运周将军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敬电》、《廖运周将军告第十二兵团官兵起义书》，目瞪口呆，面色煞白。

在南京黄浦路总统官邸，蒋介石得知廖运周率部起义，气得两眼发愣，抓起一把手枪乱打一气，把房子里的盆景打得稀巴烂。

西柏坡，毛泽东高高兴兴地给廖运周发来了祝贺电。

黄维兵团，气数已尽。

连日紧张的邓小平和刘、陈，终于轻吐了一口气。刘伯承和陈毅出去散步休息，回来却发现，一群小孩子在他们指挥部的院门口围住了邓小平，吵吵嚷嚷的，邓小平则是满脸无奈的苦笑。爱打趣的陈毅笑呵呵地问邓小平：“小平同志，你不仅是统兵打仗的将才，还是位了不起的儿童团长哦！”邓小平看见两人，就像见了救星，也笑着说：“二位司令员，没办法，请你们作点牺牲吧！”两个人一时愣住了，等邓小平细说原委，两个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前不久烟台人民千里迢迢派人给总前委送来些苹果，大家都舍不得吃，只留了几个，其余送后勤了。邓小平把自己的苹果送给房东的孩子了，不料庄里的小孩子闻风而来，要求首长“发”苹果。

两位司令员笑过，也无奈地摊开了手，原来他们的苹果也送给伤病员了。孩子们很懂事，一个个都走了，只有一个半大





孩子舍不得离开。邓小平关心地问了他的情况，又找出一支钢笔送给他，鼓励他好好学习，他才高兴地走了。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11月30日，困守徐州的杜聿明，带领三个主力兵团，撤出徐州，沿西南方向蜂拥而去。敌人这一行动有相当的突然性，我军在敌人突围方向兵力较少，万一被敌人顺利通过，使之与黄维兵团对中野两面夹击，那就危险了。

这是淮海战役中最大歼敌良机到来的时候，也是淮海战役中最紧张的时刻。

总前委指挥部空前忙碌。邓小平目光严峻、神情严肃地要通了永城军分区的电话。永城在徐州西南约九十公里的地方，要是路上没有阻拦，从徐州出来的敌人机械化部队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如果敌人占了永城，往西可以与蚌埠出来的援敌会合，往南可以从包围圈后与黄维配合夹击中原野战军，因此永城位置极为重要。

邓小平在电话里向军分区司令员询问了部队情况，告诉他敌人向永城突围的意图，然后十分严肃地命令他：“华野各纵队已投入追击堵截。在野战军大部队到达以前，如果敌人先头部队到达永城，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通过！打到一兵一卒也不准敌人通过！剩下你一个光杆司令也要顶住。共产党员过硬的时刻到了，能挡住敌人一分一秒都是好的。再重复一遍，追击部队正日夜兼程往你那里赶！你决不能让敌人通过永城！”

回答毫不含糊：“首长，明白了，坚决执行命令，决不让敌人通过永城！”

邓小平打破常规，越级亲自向军分区部队下达命令，使部队更明白了这个任务的重要。于是，永城军分区部队，以劣势装备同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扭打了一天多，打退了敌人猛烈的进





攻，把徐州逃敌阻击在永城，终于等到了大部队到达，其他各路部队一拥而上，把杜聿明的大部队包围在永城陈官庄，使敌人陷入绝境。

最危急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下令：发起总攻！邓小平吩咐总攻双堆集核心攻势的南集团部队：“要从敌人的肚皮直捅到心脏，直捣他的司令部！”

12月15日，黄维兵团全军覆没，黄维当了俘虏。

这一天晚上的双堆集热闹极了。战士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方圆十几里的原野沸腾了！一群群战士抚摸着缴获的崭新的美国大炮，激动得热泪盈眶；有的战士拿着缴获的机枪、冲锋枪，兴奋地又笑又跳；有的战士开着崭新的十轮卡车，在旷野里狂奔……





保护好人民的“家产”

三大战役后，蒋介石嫡系部队精锐已被歼灭殆尽。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堑，4月23日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二十二年的统治宣告结束。

4月27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从浦口乘“京电号”小火轮渡过长江，在中山码头上岸，登上包租的一辆江南汽车公司的公共汽车，直抵蒋介石的“总统府”，在这里度过了“进城”的第一夜。

清晨，他们被东院的嘈杂声吵醒了，两人走过去一看，地上漫着水，走廊里的红地毯也被水浸泡了。一问，原来自来水龙头被不会使用的战士扳坏了，水流遍地，好不容易才堵住了。陈毅和邓小平相互望了一眼，心有所动，脸色也阴沉下来了。

来到厢房里，他们又发现，一幅蒋介石的全身绣像被先头部队的战士用刺刀捅破了，眼睛、头部、身上都捅了一刀。这幅绣像约有三米多高，两米多宽，是蒋介石身穿统帅服的全身像，极为精美，据说是蒋介石六十岁生日时，他家乡浙江省主席请名师高手特意绣制给他祝寿的礼物。邓小平一看，终于发火了：“怎么能干出这样的蠢事！不能用感情代替纪律和政策，这是一种破坏行为！”

邓小平、陈毅马上下令，警卫部队马上将驻地打扫干净，除站岗值勤人员外，全部搬出总统府！他们还通报全军，要求





对南京的名胜古迹如“总统府”、中山陵、紫金山天文台、明孝陵、玄武湖等地和各种文物、城市设施严加保护。这些东西回到了人民手中，就是人民的家产了！

这时候，国民党空军倚仗空中优势，对我解放地区狂轰滥炸，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损失，如何减少损失也是困扰邓小平的一大难题。当时，国民党军舰“长治号”在吴淞口外的海上起义了，开进长江，逆水而上来到南京。这是一艘比较先进的军舰，舰龄短，火力强，航速高，国民党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出动大批轰炸机飞临“长治号”上空，狂轰滥炸。我军当时还没有制空权，“长治号”只能在江中做“S”型航行，拼命躲避敌人的轰炸。敌人的炸弹不断在军舰的四周炸起冲天水柱，“长治号”处境十分危急。

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长治号”告急的报告，匆匆赶赴江边。敌机的狂轰滥炸暂时被黑夜的来临中止了。刘伯承和邓小平接见了舰上官兵。邓小平赞扬了水兵们的英勇，然后沉着地说：“同志们，我们暂时还没有制空权。为了保护这点家底，只有暂时把长治号沉到江里去。”

“长治号”的战士一听要沉掉军舰，都不由心头一震。他们历尽艰险，好不容易才把军舰开到人民怀抱里来，怎么现在又要沉掉它？

邓小平仿佛看透了大家的心思。他心情沉重地给大家讲了重庆号巡洋舰的教训。重庆号巡洋舰，是英国政府1948年5月送给国民党政府，赞助蒋介石打内战的，也是当时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出乎英国人和蒋介石意料的是，1949年2月25日，这艘军舰上的官兵竟然在上海吴淞口举行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投入人民的怀抱！蒋介石恼羞成怒，派出大批重型轰炸机，在美军的帮助下，追踪重庆号，狂轰滥炸，由于我军没有制空权，虽然重庆号拼死抵抗，还是在3月19





日，被敌人炸沉在辽西葫芦岛附近海面。

说到这里，邓小平说：“同志们，打仗总是有进有退的。现在我们主动沉掉军舰，最多让江水泡一泡，等我们有制空权了，再把它捞出来，也容易修好。要是现在让敌机炸毁了，那就难办了。我们现在把它沉下去，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让它重展雄姿的！”

水兵们是通情达理的。他们恋恋不舍地最后望了一眼心爱的战舰，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对未来的希望，迅速行动起来，含泪把军舰沉到了江底。

两小时后，敌机又来了，却找不到那个要轰炸的目标，只看见浩瀚大江，点点白帆。

邓小平的预言没有多久就成了现实。第二年的春天，“长治号”被打捞上来重新修好，步入了年轻的人民海军现役战舰的行列，巡游在新中国的万里海疆。





进军大西南

1949年5月下旬，中央军委发出预先号令，要邓小平、刘伯承等和平定江南之后，立即率领本部主力或全部待机进军西南。

本来，中央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三野司令员陈毅曾提出，二野在解放战争中吃的苦头最多，作的牺牲最大，应该接收江南富庶地区，由他本人率三野向西南进军。但是，这个提议首先被刘伯承、邓小平“谢绝”了。他们硬是向中央争来了这个繁难、艰苦的任务。

这样，刚刚进驻上海湖南路原周佛海公馆的邓小平心情格外高兴。他在接见各方面人士，协助陈毅做好接收工作的同时，与任南京市市长的刘伯承频繁文电往来，密商进军西南的准备工作。

西南（川、黔、滇、康、藏）是国民党准备死守的地区。在解放大军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从广州迁往重庆后，蒋介石就把这一地区当作日后“反共复国”的基地。8月，蒋介石飞来重庆，对他的心腹爱将胡宗南、宋希濂讲道：“两广恐难保持，在大陆上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他听取了西南地区的军事报告以后，错误地认为人民解放军将会由川北和川东两个方向入川。于是，他把胡宗南集团十一个军约十六万人部署在秦岭、汉中、川北一带，张群所部二十二个军约三十万人以川东为布防重





点，宋希濂的八个军约十万人控制鄂西的巴东、恩施、咸丰三线，兵力较弱的何绍周部则防守黔东。

针对这样的战略态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别于1949年7月和9月两次调邓小平进京研究作战部署。这段时间，邓小平在公开场合露面，一是向新政协筹备会代表作关于渡江战役和占领上海的报告，一是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身份参加开国大典。之后，邓小平秘密离京南下。

为了保证对胡宗南集团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突然性，二野指挥机关故意从南京出发绕道西进，刘伯承、邓小平又数次在郑州群众大会上露面，造成解放军必将由陇海线经陕西进攻川北的假象。

实际上，早在9月下旬，邓小平就命令由陈赓率领的二野四兵团从江西南下，执行广东方面的作战任务，对付白崇禧所部蒋军。10月23日，邓小平、刘伯承秘密下达《川黔作战命令》，然后，二野指挥部从郑州突然南下，经过武汉亲临湖南前线指挥。

战鼓擂响，大军出动，二野摆开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奔向云贵山地，奔向天府之国。

大军抵达长沙时适逢金秋，刘伯承、邓小平从繁忙的军务中偷闲脱身出来，参观了位于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

这所书院创办于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为当时的四大书院之一，其创办历史远在巴黎大学、莫斯科大学之前。院外红枫处处，橘园片片；院内古木参天，清雅幽深。刘伯承和邓小平指着院内的楹联碑刻，反复吟诵，谈笑风生。刘伯承指着大门上的联语“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说道：“楚地多材，盖与周围气氛水土大有关系，我翻译那本外国军事著作，只能在战斗的间歇落笔，当时哪有一个安静的环境！”邓小平笑道：“昔时潭州太守朱洞办岳麓书院，可是大有文化眼光的。”





你呢，没有福气到这里来著书立说，只能当战场上的翻译家了。”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清风飒飒的爱晚亭。陪同人员介绍了毛泽东、蔡和森当年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后，又对隋代舍利塔作了一番讲解。邓小平伫立凝思，环顾着四周瑰丽的自然景观，目光渐渐地落在唐代杜牧的那首《山行》诗上：“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他转过头来，“伯承，我们可没得‘停车’的时间了”。

他们在树林中行进，还不到白鹤泉，沙沙作响的雨点又将岳麓山装扮成一幅水中泛绿的图画。

11月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第二野战军发起了川黔战役。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五兵团及第十军，以突然的动作挺进贵州境内。同时，三兵团主力和四野一部，由湘鄂边出动，突破宋希濂集团的防线。这样，蒋介石在西南的整个部署被打乱，他指示宋希濂准备进行有计划的撤退和有组织的抵抗。

刘伯承和邓小平对蒋军的动态作了详细的分析，并于11月11日果断下令：五兵团和第十军坚决隔断宋希濂、罗广文部敌人七个军向云南的退路。11月21日，五兵团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加速猛进，一举攻克贵阳市，第十军随即也进至遵义。

不出刘邓所料，宋希濂见后路被截断，立即在南川下达了“不管一切，不顾一切，走，快点走，走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不要被共军包围歼灭”的命令，准备第一步退到西昌，第二步退到滇缅边境的腾冲。

但是，宋希濂的步子却慢了一步。指挥入川作战的邓小平深深地懂得，战争的双方，谁赢得了时间，谁就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他和刘伯承虽然远在湖南常德，但指挥千里之外的部队却得心应手。第二野战军以迅猛的动作和多路迂回，于宋





希濂作出撤退命令的次日，一举占领南川县城，歼灭了宋希濂集团主力及罗广文兵团三万余人，切断了蒋军西撤的退路。宋希濂本人在出逃时也成了战俘，其残部在大渡河两岸全部被歼。

11月30日，二野三兵团解放重庆，西南最大的都市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针对胡宗南集团龟缩成都地区，准备伺机突围的态势，刘、邓向中央军委提出，成都战役的关键在于攻占乐山、邛崃，完全切断国民党逃往云南的道路。与此同时，第二野战军各部继续西进，相继占领乐山、大邑、邛崃一线，并从东、西、南三面完成了对成都的包围。胡宗南集团和川境残部蒋军已如瓮中之鳖。

此时，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其他的国民党西南高级将领如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纷纷通电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

成都作战的时机成熟了，邓小平及时与刘伯承商量，决定命令第三、第五兵团于12月26日对成都守敌发起全线攻击。这次攻击行动采取先打弱敌和“一口一口吃掉”的战术以及政治瓦解的策略，进展极为顺利。胡宗南突围不成，只得扔下成都守敌和一部分逃往西昌的部队，乘飞机只身逃往台湾。

1989年1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二野战史编写组的二十多位老同志，在回忆进军西南这段往事时，他以轻松的口吻说：“进军大西南，没打什么大仗，就是白崇禧、宋希濂，也一扫就过去了。”

这个讲话，气势恢弘，反映了当年刘邓大军兵锋所指，攻无不克的八面威风。二野的三、四、五兵团和四野的四十七军，从1949年11月到12月27日配合一野十八兵团解放成都，前后不到两个月，前进了二三千华里，消灭蒋军九十万，川、康、滇、黔四省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肃清土匪

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被逐出西南大陆后，留给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的是一个情况复杂、百废待兴的烂摊子。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恢复城市经济、稳定人民生活……这一切都需要迅速理出个头绪。对邓小平来说，巩固和经略西南，要比夺取西南困难、棘手得多。

大股蒋军被消灭以后，残留人员和潜伏下来的匪特武装令邓小平和西南军政大员们十分挠头。解放大军渡江以后，蒋介石自知好景不长，曾在成都开办了五期“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大批特工人员，准备开展所谓“敌后游击”。重庆，是蒋介石在抗战时建立的“陪都”，树大根深，各派系的特工、匪帮、恶霸势力更是盘根错节。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的前一天，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在这里召集匪特首脑紧急会议，重新布置整个西南地区“游击武装”的活动任务。在会上，他特别要求在重庆的匪特组织要寻找一切机会进行破坏。随后，他布置了一场大炸大杀。在其他地区，特务分子以溃散的国民党军队为基干，勾结土匪恶霸、反动地主、封建会道门头子，成股流窜，洗劫百姓及往来客旅，破坏公路、桥梁、通讯设施，袭击运输车辆，杀害地方干部，妄图使中共基层政权迟迟不能建立和巩固。这些土匪以山地和沟壑为掩护，出没无常，非常难于清剿。





正战争还在后面”。他针对有的干部认为“大江大浪都过去了，小河流里还能翻船”等轻敌麻痹思想，认真分析道：越晚解放的地区，敌人布置得越周密，西南各地区土匪的口号完全一致，就是个很好的说明。对剿匪，我们宁可看得困难一些，时间上宁可打得长一些。他宣布：“野战军要地方化，一个师要兼负一个军分区的工作，负责彻底消灭匪特和发动群众，建立农村政权。”

全面进剿开始了。当时任二野三十二师师长、大竹军分区司令员的何正文将军回忆说：“我们首先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分进合击、远距离奔袭、设伏诱敌、反复搜剿等战术，对匪情猖獗的中梁山、华蓥山、垫江等地区的大小百余股土匪给予歼灭性打击，活捉了‘六县人民救国军总司令’吕健康、国民党十二军军长韩春祥和‘川湘黔鄂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陈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歼敌三千五百余人。”

1950年2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西南局发出了“迅速建立各级公安机关”的指示，各大中城市除继续加强军事管制之外，人民解放军又抽调大批骨干，一般每个县配备五至十人，并带一个排或一个连的武装，组建公安机关，为剿灭匪特布下了天罗地网。在重庆，公安部队逮捕特务惯匪一千余人，其中包括杀害我地下党员许晓轩、江竹筠及抗日爱国将领杨虎城一家的凶手。泸县、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自贡、合川等县公安局也相继捕获重要匪首特务数百人。

根据邓小平、贺龙的布置，采取政治为主、军事为辅、发动群众的方针，贯彻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二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不顾疲劳，下大力气追剿，获得了巨大战果。邓小平后来回忆道：“1950年中央下达给二野的任务是：两个九十万，一个六千万。就是抓九十万俘虏，九十万土匪，要为六千万农民搞土改，这些任务都胜利完成了。”





剿匪工作中的政治攻势是邓小平长期以来对敌斗争战略战术的一大延伸。邓小平精辟地指出：对土匪，我们的方针是不可不杀，也不可多杀。要争取土匪投诚，瓦解其他。剿匪部队每到一地，都召开群众大会，讲解胜利形势，揭露国民党特务的谣言，宣传人民政府的政策，张贴剿匪安民告示。同时，召开旧保甲人员会议、土匪家属会议，动员他们劝告匪众向人民政府登记悔过，回家生产。这种办法十分见效。在重庆市属的铜梁县三个乡，三天时间即争取土匪二百五十余人登记悔过。驻泸县我军某部所俘之土匪经过改造教育，曾带路使我军直捣石离寨匪巢。

1952年春，西南地区清匪反霸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盘踞在西南各地江河码头上的封建把头，仍企图与政府分庭抗礼，费尽心机地从经济上、政治上进行破坏。他们控制大量船民，威胁他们，不准运菜运粮运燃料进入重庆。号称百万人口的山城，曾一度无柴、无粮、无菜上市。在此关头，邓小平指示西南局总工会主席蔡树藩，立即召开水上工作会议，全面布置反把头斗争。西南水上公安局和水上工会的代表迅速齐集重庆，邓小平用了半天时间，把与会代表叫到位于曾家岩西南局驻地的办公室，亲自听取了情况汇报，并对有关政策问题作了详尽的指示。会后西南的江河码头大张旗鼓地掀起了反封建把头的斗争，船民群众都发动起来了，血债累累的恶霸把头一个个受到严厉镇压。重庆地区的水陆运输终于得以畅通。邓小平在剿匪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魄力和智慧，使老百姓终于相信了共产党的强大。





财经战线初显身手

蒋家王朝覆灭前，一些中外反对派人士就发表评论：“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他们不相信共产党能解决历代政权无法解决的几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就以西南的情况来讲，蒋介石十几年的统治和逃离时的破坏使经济陷于崩溃，通货恶性膨胀，生产濒临停顿，市场极度凋敝。

当时，西南党政机关通过川东地下党同一大批民族资本家和爱国士绅建立了联系。刘伯承和邓小平为了表示解决人民生计问题的诚意，在重庆解放的十几天后，即召开会议与工商界人士座谈，希望他们为恢复经济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但是，这些人士更多的是强调各自的困难：银根紧，没有钱买原材料，没有钱发电抽水，没有钱发工资。他们纷纷要求党和政府马上向各厂拨给大笔资金或发放大量贷款，用于恢复生产。他们认为，如果党和政府不能很快拿出大量资金，那么，重庆、川东，乃至整个四川、西南的经济必将彻底崩溃。这类呼声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讲得更严重。顿时，会场上的气氛紧张起来，人们不再说话，都静悄悄地等待着中共大员的答复。他们也知道，要作出满意的答复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共产党刚刚建政，根本拿不出钱来。从全国范围来讲，蒋介石败退台湾时，仅从上海带走的黄金就达二百七十三点八万两，中共方面的财政捉襟见肘，不可能向西南拨款。





这时，邓小平沉着地站起来。这位四十五岁的“封疆大吏”显得十分成熟、老练。

“各位反映的问题很迫切，很重要。我们欣赏各位为恢复生产、恢复经济所作的努力。但是，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解放重庆，解放西南，并没有带多少钱来，现在拿不出大家需要的钱。”

会场上的气氛仿佛凝固了。

邓小平话峰一转：“当然，我们也不是空着手来的。我们带来了比钱更宝贵、更重要、更有力量的东西，那就是十六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内外交流，城乡互助。’这是现阶段指导一切经济工作的根本方针。只要我们认真照此去做，当前经济上、生活上的一切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

看到仍有不少人将信将疑，邓小平便逐句地详细讲解了这十六个字所包含的政策内容，并举出实例阐述个中深刻的道理。

座谈会开完了，但恶劣的经济形势依然存在，工厂难以开工，商店货架缺货，银行没有资金，工人领不到工资。这些问题像乌云一样，笼罩在解放后大西南的天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成立了西南财经委员会，邓小平兼任主任。财经委除了主管财经之外，政治、文教、人事都有所涉及，实际上成为西南局的决策机构。邓小平常常是连日召集财经委的同志开会。与会的高级干部们绞尽脑汁，要在这重重困难中寻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12月底的一天，大溪别墅的一间小会议室。邓小平召集张际春、陈锡联、阎红彦、谢富治等西南军政领导开会。他们身着普通士兵穿的褪色黄军装，坐着长条白木板凳，围在一条没有油漆的长方桌前。再看邓小平，他推着平头，体阔身宽，目光炯炯，安详地将双臂放在桌面上，讲起话来，满口四川乡





音，铿锵有力。

邓小平说：“大的战斗，今后不会再有了。对于我们来讲，应该立即把领导精力转向城市，迅速恢复被破坏的城市生活。”

他稍稍停顿，望着大家，接着说：“眼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稳定物价，解决群众的柴米油盐问题，组织好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

讲到这里，他站起身来，举着双手，扳着指头，如数家珍似的述说着上海、北京、武汉等城市米、布、煤、油折实牌价的数字。接下去他说：“那么，我们重庆，加上运费，每个折实单位应该有多少布、米、煤、油呢？我算了一下，应该是……”

又是一长串的数字。

他问大家：“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看到其他同志没有不同意见，他说：“那么，这个问题就PASS（通过）！”

接下去，他对《新华日报》的一位负责同志说：“《新华日报》每天都要公布重庆的折实单位，让广大群众都知道油、盐、煤、米的牌价。”

这时，秘书进来，递给邓小平一个纸条。看后，邓小平高声笑着说：“好了，好了，中央给我们送钱来了。从北京到重庆的第一架飞机，在白市驿机场降落了。”

多少天来，邓小平被各工厂资金告罄、各部队缺乏补给的紧急报告搅得寝食不安，他虽然告诫大家，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中央拨款上，但现款一旦来到，他是第一个喜出望外的。

邓小平当即对二野第三兵团司令、重庆市长陈锡联下达命令：

“陈锡联！”

“有！”陈锡联应声站起。





“你马上派一个营的部队，押送钱款，向贵阳、昆明前进。今天下午6点出发，全部卡车都要架起机枪！”

身材高大的陈锡联立刻走出会议室，五六分钟后，他回来立正向邓小平报告：

“你的命令已部署完毕。今天下午6点，×师×营，从海棠溪出发，车上全部架着机关枪，向贵阳、昆明方向前进。”

“好！”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坐下继续开会！”

迫在眉睫的资金问题暂时得到缓解，邓小平长出一口气，得以考虑其他方面的大小事情。

一天，他把重庆市委书记张霖之找去，询问起市委机关占用枇杷山公园的情况。枇杷山公园原是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公馆，景致很好。解放前夕，王陵基携全家逃走。刚组成的中共重庆市委准备选择此地办公。

张霖之见邓小平问及此事，额头上有些微微冒汗。他回忆起邓小平进川后一再强调的克服享乐思想的问题。有一次在军区大礼堂，邓小平声色俱厉地批评道：有些同志进城后产生了不求上进，贪图享受的思想。邓小平还专门举了例子，少数干部不尊重群众，不遵守纪律，住房要住好房子，没有电灯的房子不愿住，个别单位还为住房问题而争吵，争着进公馆，进花园，影响极坏。当时邓小平词锋尖利，令闻者汗颜。张霖之想到此，觉得这次免不了挨邓政委一顿狠“剋”。

邓小平见张霖之有羞赧之色，便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简单地谈两点：既然作为办公地点，目前市委可以暂住枇杷山，要注意影响；枇杷山以后要开辟成公园，供游人参观。

张霖之回市委后，立即向全体干部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精神。1954年底，重庆市委迁往西南局机关原址办公，枇杷山随即对游人开放。





成渝铁路 圆四川父老一个梦

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控制了西南的局势以后，地方行政千头万绪的事情刚刚得到梳理，中共西南局领导就决定：修建成渝铁路，沟通川中两大城市。其中，邓小平对这件事更是极力促成。在1949年底和次年初他就多次表示，要恢复四川已濒临崩溃的经济，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修通成渝线，把手头有限的资金立即投入这条铁路的修建，这既是为长远打算，利国利民，更可以将四川地区的生产和贸易尽快带动起来。

这个筑路计划向中央报告后，很快得到批准。

早在进军西南之前，邓小平就萌生了修筑成渝铁路的想法。

1949年7月，邓小平在上海湖南路陈毅的住所结识了陈修和。陈修和是陈毅的堂兄，黄埔军校炮兵科毕业，国民党沈阳兵工总厂厂长、著名的兵工专家。邓小平因很快就要带兵入川，所以想请陈修和介绍一下沿海沿江一些兵工厂内迁四川的大概情况，以便为接管、安置、恢复生产作准备。

言谈间，陈修和提到了成渝铁路。他说，重庆钢铁厂有汉阳炼钢厂内迁的完好设备和技术力量，完全可以年产四万多吨铁路钢轨，可国民党政府还是把成渝铁路的修建权让给法国。法国的打算是从马歇尔计划援助法国的物资中拨出一部分来修建成渝铁路。后来因蒋介石发动内战，这项计划只好搁浅。

邓小平听得入神而动情。是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天





府之国四川，四面高山环绕，迄今还没有一条铁路。清朝末年，四川人民为了修建自己的铁路，出过钱，打过仗，也同国民党政府斗争过，经历了一次次的失望。共产党掌权了，人民当家作主了，一定要把这个夙愿变成现实。

“成渝铁路的准备工作原来搞了多少啦？”邓小平问。

“搞了不少。铁路线已基本勘定，不少路段的路基已经筑成。内江铁桥的大桥墩已经修出水面。这些都可以利用，工期可以缩短。”

邓小平点点头。一个蓝图已经在他的心底里绘成。



后来，陈修和在邓小平的请求下，为西南的工业建设，包括成渝铁路的修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书、档案材料，延揽了几十位留法、留德的技术人员，为邓小平下定最后决心修筑成渝铁路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和资料支持。

这样，邓小平、刘伯承在领兵南下之前，就向部队干部庄严宣布：“我们到了四川，一定要把成渝铁路修好。”

重庆解放后的一个星期，邓小平、刘伯承就派西南铁路工





会副主席刘备耕接管了修筑成渝铁路的旧摊子。不久，又组建了赵健民为局长的西南铁路工程局，全面负责铁路施工。

1950年6月15日，开工典礼在彩旗翻飞和锣鼓的喧响之中举行。邓小平前往致词，他说：“我们进军西南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开始做起。”“我们调出一部分部队参加建筑，也是为着替人民少花一些钱，把铁路建设起来。”7月，由西南军区先后组织的五个军工筑路总队，计三万余人，扛着“开路先锋”的大旗，浩浩荡荡开赴施工地段，投入了紧张而又极其艰苦的劳动。

年底，军工筑路队奉调参加抗美援朝，仅留下少数干部带领十万民工坚持筑路。他们在工程难度大、时间紧、没有机械设备、全靠人挑肩扛土石方的情况下，保持了极高的劳动热情。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铁路施工进展迅速，次年即通车到内江。邓小平特地邀请了四川许多名流如熊克武、刘文辉、但懋辛等人参加了通车典礼，让他们实地体验一下共产党人的办事效率。

经过施工大军的日夜苦战，两年之后，全长五百零五公里的成渝铁路全线通车，从此蜀道无铁路成为历史。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也是由中国人自己组织设计和施工，全部用自己的材料建造的第一条铁路。

1952年7月1日，是个少有的晴天，重庆车站上披红挂绿，人头攒动。汽笛一声长鸣，发往成都的专列缓缓启动。几百里外的川西平原也沸腾了，燃炮击鼓，数日不绝，成都市郊，人山人海，争看铁路。他们争相称道共产党人说话算数，共产党、邓小平为家乡施了一项德政。

确切地讲，邓小平急于修建铁路，并不仅仅从家乡父老的福祉着眼，他想得更多的是大西南的发展前景，是中国人的自尊。





红旗插上“世界屋脊”

大西南战役结束后，西藏便成了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块黑云笼罩的地区，百万农奴在残酷的盘剥和压榨下痛苦地呻吟。皮鞭和牧鞭，维持着这块高原的统治秩序，仿佛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铁的法则。

英、印敌对势力觊觎着这块大陆，中国共产党人也深知它具有的政治上的价值，迅速腾出手来，把解放这块土地纳入自己的议事日程。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出访莫斯科的途中经过反复斟酌，发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在此之前，他曾致电彭德怀，提出以西北局为主经营西藏。但是，彭德怀等认为，第一野战军从北路进兵困难巨大，交通、给养问题短时间内难以解决。于是，1950年1月2日，毛泽东经过再三权衡，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和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确定向西藏进军的任务改为由西南局担负。这样，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身上。

接到中央的电报，邓小平、刘伯承经过研究，确定由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全军执行进藏任务。张国华当时三十六岁，年富力强，经验丰富，是红军时期入伍的“红小鬼”，有勤奋好学、指挥作战有方、善于掌握原则和政策、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等长处，更重要的是具有开辟新区斗争的丰富





经验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因此，邓小平十分器重张国华。当时十八军的官兵已移驻川南，他们盼望着在美丽富饶的巴山蜀水驻防。向高山缺氧、人烟稀少、环境恶劣的西藏高原进军，对干部、战士来说又是一场严峻的人生考验。但当邓小平和刘伯承把这项任务下达给十八军之后，张国华代表全体官兵欣然受命。

1950年初的一天，在重庆曾家岩西南局驻地，邓小平和刘伯承召见十八军张国华、谭冠三和师以上主要领导。

德高望重的刘伯承首先讲话。对这批手下爱将，他的话幽默而严肃：“你们都很年轻，是进军西藏的各路诸侯。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特殊、敏感，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处处体现出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

邓小平的讲话则是开宗明义，一语中的：“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但军事与政治相比，政治是主要的。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他引史证今，“历史上，对藏多次用兵不解决问题，解决的办法大多靠政治。唐朝和番，效果十分明显，以后多次用兵，劳民伤财，最终还是没能站住脚”。最后，邓小平宣布：“这次入藏，兵力确定为三万人，力求精干；补给线上一万，加强兵站的建设。为什么要你们十八军去完成这个任务呢？主要是你们军的干部队伍过硬。”

刘、邓的讲话引起了十八军官兵的热烈反响。他们对进军西藏的使命感到无上光荣，纷纷写请战书、决心书，要求早日出征。但是，也有少数干部战士考虑到个人问题，尤其是一些年岁大的更顾及婚姻、家庭、身体条件，他们想在天府之国成家立业，而进军西藏会使这些希望成为泡影。邓小平明察秋毫，及时发现了这种情绪。1950年2月，他专门为十八军题词：“接





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的无上的光荣。”在有十八军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上，他又公开表扬十八军的忘我精神，为部队官兵鼓劲。

2月15日，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联合发出了解放西藏的政治动员会，十八军官兵整装待发。

面对西藏地区民族矛盾复杂、僧侣统治牢固、中国共产党缺乏开展工作的群众基础等具体情况，邓小平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台，盘马弯弓，首先把解放西藏的筹码拨到和平的天平上。“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他把这条对藏工作的重要原则反复向部队灌输。

1950年2月25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电示西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

据此，经过反复斟酌，邓小平代表西南局起草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十项政策，主要有：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军事制度不变；达赖活佛的地位和职权不变，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西藏的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采取协商方式解决，等等。

对这个十大政策，后来邓小平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作了认真的解释。他说，我们对西藏的十条，“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少数民族“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部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他还提出，“搞不清楚的事暂时不办，比乱整好”。显得十分宽容、稳健。

“十大政策”在藏区广泛、深入地宣传后，受到了广大僧俗群众的普遍欢迎，包括一些上层人士都认为，十项条款照顾





到了各阶层的利益，非常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甚至有的藏族代表还觉得这些政策太宽了些。总的说来，他们对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气魄无不交口称赞。

中共中央力主和平，西南局和以彭德怀为首协助进藏工作的西北局也为和平入藏煞费苦心。

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一开始态度顽固，缺乏诚意，企图以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入藏。根据中央的指示，西北局先后物色了两批人去拉萨劝和，结果是，一批被限令离境，一批遭到拘押。这时，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朱德在长征时结识的好友，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主动向西南局提出要去拉萨劝和。邓小平感到格达活佛的爱国精神可嘉，但鉴于拉萨形势复杂、险恶，因而数次急电劝告格达活佛暂不要前去拉萨。朱德也从北京来电劝阻。无奈格达活佛求成心切，决心已定，他表示要在劝和成功之后再进京拜见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这样，西南局只能尊重他的意见。临行前，邓小平专门修书一封，请格达活佛转送达赖喇嘛，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统一祖国大陆的一片诚意。

遗憾的是，格达活佛壮志未酬，和平使命未竟，便在昌都惨遭暗害。这样，以达扎为首的噶厦当局以对和平使者的屠戮，关闭了谈判的大门，妄图以战刀来与人民解放军一决高低。他们调集一半以上的藏军，约九个代本（相当于团）和民兵三千余人，布防于昌都以东的金沙江一带和昌都附近地区，企图扼守天险，阻挡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一场以战促和的仗不可避免了。在邓小平、贺龙等的全面部署和筹划下，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打响了。张国华指挥十八军主力，在青海骑兵支队、新疆骑兵师和云南两个团兵力的战略配合下，对昌都实施了迂回包围和正面攻击相结合的作战，一举解放昌都，歼灭五千七百余名藏军。





在失败面前，达赖喇嘛终于面对现实了，他抛弃了幻想，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和谈代表团。

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到达重庆后，邓小平和贺龙等对他们优礼有加，高规格地设宴款待了他们。席间，邓小平再次讲解了我们的十大政策，并请阿沛劝告达赖从中印边界地区重返拉萨，希望他们消除猜忌和隔阂，使谈判得到成功。

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订立后，邓小平把心血投入到增强民族团结，严格约束进藏部队的纪律等事务上。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邓小平十分重视部队的供应，组织了强有力的“支援司令部”。部队进至拉萨和其他国防要地以后，在供应补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从内地运输和就地开荒生产，就是断粮断顿，也坚持不向地方上索取，在邓小平和西南军区的严格要求下，进藏部队全体官兵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即使在冰天雪地的进军途中，也始终坚持住帐篷而不进寺庙，不经同意不住民房。许多干部战士断了粮，也不吃群众田里的一把青稞。有一次在行军途中，一位战士对横在路上的老鹰踢了一脚，即因其不尊重藏胞风俗而被罚以警告处分。邓小平对这种认真执行纪律的行为给以高度评价。西藏的高级官员、僧侣、贵族以至一般群众，都热情地称赞我进藏部队是“菩萨兵”。

对于宗教问题，邓小平更是高度重视。他多次教导进藏部队要切实保护喇嘛寺庙，尊重当地人的宗教信仰。1951年9月，当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率领的先头部队进入拉萨城之前，邓小平专门交代：到拉萨之后，会见达赖喇嘛时，如果他提出来摸顶，可以不受我们军队纪律的约束，让他摸顶，并代表官兵向他赠送礼品。这一举动使西藏僧侣贵族十分意外。

和平赢得了，沟通实现了。中共中央决定西藏的制度六年不改。五星红旗，终于插到了古老的风雪高原。





重振财政部

1952年，邓小平进京，担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

中央的工作是紧张而辛劳的。当时，几位副总理中，董必武主管政法，陈云主管财经，郭沫若主管文化教育，黄炎培主管轻工业。周恩来总理兼任外交部长，工作非常繁重，急需一位年富力强的助手协助抓全面工作。邓小平以他的细致、干练、精力充沛而成为合适的人选。

1953年夏，全国财经会议在北京召开，薄一波主持的财政部由于推行新税制，引起物价波动、收支失衡而受到批评。会上，国家计委主席高岗借批薄一波而影射攻击刘少奇。批薄的调子越唱越高，会议迟迟不能收场。

这时，毛泽东出面讲话了：结论作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

邓小平从北戴河返京，为薄一波网开一面：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我不赞成把薄一波这几年来在工作中这样那样的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

陈云也讲了话：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杀了。我反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在工作中不会没有个别不同的意见。

会议气氛立即发生变化。8月19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西楼召开政治局会议。高岗还想继续坚持，毛泽东则给他以当





头棒喝：你让别人作检查，东北的工作为什么就不能检查了？东北各省出了错误，你东北局还不是要进行批评、检查！

财经会议结束后，薄一波请求辞去中财委副主任和财政部长职务。8月1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邓小平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兼财政部长。

邓小平到财政部后，非常注意团结同志一道搞好工作。当时，财政部大多数干部比较谨慎小心，怕工作出差错再挨批。邓小平察觉到了这一点。一次，在部办公会上，他向与会者袒露了肺腑之言：“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今天，我同大家约法三章。”

他停了停，环顾一下与会者，和蔼地接着说道：“我到财政部工作，决策方面主要靠你们反映情况，如果大家反映对了，我决策错了，这个责任我来负。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错了，我根据你们的错误反映搞出了个错误的决策，这个错误可要你们负责。”他轻松的口气中透出一种威严：“你们可听好了，到那个时候，这板子可要打到你们屁股上喽！”

这个训诫，隔了几十年，对于财政部的老同志们，言犹在耳。他们感到在邓小平身上体现出了一种崭新的领导作风：权责明确，使部里的同志工作更认真，也更大胆了。副部长们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既谨慎负责，同时心里又是舒畅的。

1953年底的一天，邓小平找到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问道：毛主席对财政工作有过什么重要指示？戎子和回答说：毛主席的指示，财政部编印了一个小本本，其中有三句话，“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

邓小平听了，沉思了一下说：这三句话说得好！明年的预算安排，就按这个方针办。

果然，1954年的预算计划，就是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领导制定的。1954年6月，邓小平向中央政府作报告





时，还一再强调了毛泽东的“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的论断，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折不扣地执行。1954年预算执行结果，收支相抵，节余了十六点零五亿元，改变了1953年资金紧张、突破口大的状况。

邓小平到财政部，带来了一种崭新的工作作风。他主持会议，讨论重大问题，总是当断则断，决不拖拉，开一个会常常是半个小时解决问题。他听汇报总是要求反映的情况真实、可靠，数字清楚、确切，反对含糊不清，模棱两可。这一点，给下属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猫 论”

“猫论”，这是个戏谑的称谓，向来被认为是邓小平的一大发明，“文革”以前即已在不少高级领导人中流传开来。邓小平在“文革”中两次被打倒，对“猫论”的批判无一例外地成为射向他的重磅炮弹，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黑货”和搞“复辟”的具体例证。但是，这个称谓几十年来以其特殊的魅力不胫而走，蜚声中外。

若从其源流方面考证，“猫论”的准确说法应该是“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并非“白猫黑猫”之说。这本是一句很通俗的民谚，刘伯承曾多次引用，说明军队打仗不能墨守成规，要灵活机动，以消灭敌人作为最终目的。作为十余年出生入死的老搭档，邓小平对刘伯承的用兵方略大为赞赏，并一再发挥，说：“我们打仗不要讲什么套路，一切看情况，打赢才算数。”这是说打仗。邓小平更多地是在其他方面，如抓整顿，抓经济，把刘帅的话发挥得淋漓尽致。

大跃进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对于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恐怕是刻骨铭心的。1960年和1961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急剧增加。“瓜菜代”，草根树皮，浮肿病，路有饿殍……这一切发生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悲剧，虽然在当时不至于动摇人们对共产党的信念，但却给中共中央领导人敲响了警钟，亮起了黄牌。毛泽东在1960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一平二调”和“共产风”是“人祸”。他颇有认真反省之意，





决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让几位中央的主要领导到外地考察。他本人也随着时令的变换南下广州，召集会议，解决迫在眉睫的农业问题。

邓小平是总书记，他和彭真坐镇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忙里偷闲，到北京顺义等地搞调查研究，从中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不久，他也应召到广州，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农业六十条”允许农民保留百分之五的自留地，并可以饲养家禽和家畜。这是纠正人民公社“左”倾错误的重要一步，使得濒于绝境的中国农业起死回生。在实际工作中，“农业六十条”又经过不断修改。如1961年6月，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被取消；9月，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这样，农民们浮肿的脸上漾出了笑容。他们看到了走出绝境的一丝曙光。

但是，毛泽东却越来越感到不满了——他对农业调整的幅度不满，对邓小平的工作方式也不满。他认为，第一步的紧缩措施实行之后，其他步骤都可以停止，否则就是“单干”和“右倾”。他因起草“农业六十条”的部分工作内容没向他请示而大发雷霆之怒：“是哪个皇帝决定的？”

历史都有它自己的惯性。农业的紧缩政策在两种意见的冲突中继续施行。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都支持这种与民休息的政策，其中以邓子恢、邓小平表露得尤为大胆。邓子恢当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在1962年5月的中央常委会上，邓子恢说：“有些地区，就让他们单干，或者叫包产到户。这是社会主义的单干。他只要完成上调任务，有什么不好？”

一语既出，不少人心里暗暗称是。但毛泽东没有表态。

7月，邓小平亲自对这位在瑞金时代结识的老同志表示支





持。他两度提出“猫论”。一次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现在生产关系很紧张，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现在最重要的是粮食问题。只要能增产，就是单干也好。不管黄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时隔五天，他又对一批共青团干部说道：“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那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并再度重复“猫论”，把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众。

在邓小平讲话后的一个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指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为“黑暗风”，认为彭德怀要求重新审查其历史的上书为“翻案风”，又声色俱厉地批评农村“包产到户”和邓子恢、邓小平对这种做法的支持为“单干风”，并把问题提到了吓人的高度。他说：这股风越到上层就越大，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走哪条路？他还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

会议从主要讨论农业和财贸问题转向讨论毛泽东的讲话，邓小平等改变农业生产关系的呼吁被重新强调阶级斗争的喧闹声淹没了。他关于“黄猫黑猫”的讲话在印成记录稿下发之后，也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收回。

十几年后，邓小平的“猫论”还使得毛泽东耿耿于怀。1975年岁末，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其中有一段用挖苦的语气批判了“猫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列主义。”

“文革”期间，某地张贴出一幅漫画：邓小平面对红卫兵的匕首和投枪，似乎有些沮丧。脚下匍匐着一群猫——白猫黑





猫花猫，神气活现，形态各异。年过花甲的老人俨然成为一位养猫专业户。这类题材的漫画在“文革”期间还有若干种。

邓小平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谩骂和丑化。他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上所受的打击、经历的磨难太多了。至于猫，本来只有作为宠物和用来捕鼠两种功能，但能和农业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足以表现出邓小平的机智和幽默。“红卫兵”们直指邓小平的“猫论”，恰是以颠倒的方式展示了邓小平的高明之处。

无独有偶，另一张以猫为题材的工笔画现在却收藏在邓小平的家中。这是一张《双猫图》。图中，一只猫毛色雪白，茸毛轻柔，另一只猫毛色乌黑，黑中透亮。两只猫一前一后，缓缓前进，那毛茸茸的身体和炯炯有神的眼睛十分惹人喜爱。

图的上方，是几行遒劲的题词：“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这是“江南猫王”陈莲涛老人在他八十三岁时送给邓小平的礼物。邓小平视这幅画为珍宝，爱不释手，作为画家的大女儿邓林向他索要，被他一口回绝。

薄一波同志在后来曾问过邓小平：对黄猫黑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小平回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

对“猫论”的评价最终还得靠实践来检验，以是否造福人民来衡量。邓小平在1962年的讲话，在20世纪70年代末会成为农村改革的先声，这恐怕也是其他人所始料不及的。





“邓小平小道”

1969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由于各地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夺权”和武斗所造成的社会动乱相对趋于缓和，“九大”以后，运动已进入“斗、批、改”阶段。

10月17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在苏州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8日，总参谋长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下达了这个指示。于是，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在经过运动初期的冲击、摧残之后，再次以“战略疏散”为名，被遣送外地看押、监管、劳动。

周总理十分关心这批老战友，先打了电话到各地，叫各地要关照他们的生活。邓小平被遣送到江西。周总理打电话到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程惠远接的电话。周总理严肃地说：“有件事，你们先告诉一下黄先同志，同时向程世清同志报告。”总理说的黄先是程惠远所在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

总理接着说道：“中央决定：中央首长要到下面去蹲蹲点，接触一下实际，适当参加些劳动，向群众学习。到江西的有：陈云同志，有一个秘书和警卫员跟随他；王震同志是夫妇两人，他是全家去……”

总理强调：“因为从北方一下到南方不习惯，望你们适当注意他们的生活。”总理还特别问起了江西是否有暖气，并





说：“他们住到你们那儿，要很好地帮助他们，向群众解释一下。他们除了到农村看看，还可以适当参加劳动。不过他们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王震同志更差一些……”

程惠远边听边应边记，心里深深地被总理对老干部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所感动。

略停了一下，周总理又说：“邓小平夫妇二人也到你们那里去，”总理顿了顿，声音郑重而沉稳，“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力了，也是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下去一段再上来。收房费也适当照顾一下……具体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去，请黄先同志给汪东兴打个电话再定下来。最后一点：这些同志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

放下电话，程惠远简单地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就匆匆乘车向程世清所在的婺源县奔去。

中途，在景德镇停留时，程惠远接到了南昌来的长途电话：“一号通令”终于下达了。

电话通知程惠远，从北京疏散下来的“走资派”，在江西接受监督劳动，近日内将到达。

程惠远见到程世清，一五一十地将这两个精神截然相反的电话内容作了汇报。

程世清再三揣度，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欢迎陈云、王震同志以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来后，邓小平夫妇住在赣州，陈云和王震同志的住所与他们本人商量后再定。

当天晚上，程惠远将程世清的意见通过电话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听后指出：赣州的条件过于艰苦，应该让邓小平夫妇住在南昌市郊，房子要独门独院，上下两层，他们夫妇住楼上，楼下安排给工作人员，这样既安全又可以有散步的地方。





就这样，在邓小平被“一号通令”的狂飙推向江西之前，周总理的关怀已为老战友建起了一个坚实的避风港。

10月26日，一辆汽车从中南海开出，故意绕了几个大弯子后，向北京沙河机场急驶，将邓小平、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和继母夏伯根，疏散到江西去。

早在几天前，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程惠远等几个省委干部就作出了决定：邓小平夫妇在南昌市郊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住在位于望城岗解放军步兵学校的“将军楼”里。

在黄文华带领下，邓小平夫妇乘车来到新居。这是一幢被绿色冬青环抱的两层小楼，周围环境优雅，有整洁的水泥路面，有红壤与石子相杂的幽静小径，月桂飘香，鸟语蝉鸣，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好去处。邓小平一家住在楼上，楼下由管理秘书兼警卫的黄文华和解放军战士居住。

经过四五天的安排调整，一家人的新生活基本上就绪了。邓小平主动叫来黄文华说：“我离开北京到江西时，汪东兴找我谈过，让我来这里长期住下去，通过劳动搞点调查研究，改造思想。现在来了几天了，你看什么时候开始劳动？”

黄文华让邓小平一家再休息几天，先不要着急劳动，将家务完全安排好再说。邓小平却回答：“家务不需要再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反正东西不多。”黄文华见状，只好提出明天就去劳动。

第二天早晨，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里，果然多了两位身着普通蓝纱卡工人装、脚穿军用力士鞋的“工人师傅”，这就是邓小平和卓琳。

在这之前，厂里作了周密的安排。邓小平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老部下、厂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罗朋，特地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要求作好对邓小平的安全保卫工作，并组成了七人保卫小组，提出不准干扰邓小平夫妇的正常劳动，不准喊





“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并把厂房内外所有打倒邓小平的标语撕掉，刷洗干净，以保证邓小平有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经黄文华的介绍，罗朋见到了自己的老首长，心中不免有许多感慨。他自己也是作为“走资派”受到了冲击，刚刚解放出来降职使用的，与邓小平有同病相怜之感。他向邓小平简要介绍了厂里的情况，为他们安排了车间休息室，邓小平问：“这里有没有红卫兵？”“我们这里没有红卫兵，老工人占多数，都是很本分的工人。”罗朋会意地答道。

邓小平夫妇随罗朋、黄文华走进车间。立刻，“邓小平来了”的消息在工人们中悄悄传递开来。工人们眼前这位当年的国家领导人，精神矍铄，面带笑容，稳健的步伐中透着一种坚毅。工人师傅们不由得纷纷围拢过来，用目光向邓小平夫妇问候。

邓小平被安排在修理车间劳动，负责锉零件。邓小平熟练地拿起锉刀，放置好一个零件，很内行地干了起来。车间负责人陶端璠十分惊讶，他没想到指挥过千军万马，操持过国家大政的邓小平居然还会扳动锉刀。这一招一式起码有四五级工的水平啊！他不禁说：“老邓，你的锉刀活蛮熟练，真有功夫。”他哪里知道，邓小平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就曾做过钳工，这种活对他来讲，可谓得心应手。

与邓小平的工作相比，卓琳的活儿相对轻松些。他和程红杏、卢凤英等几个女工负责拆线圈。她们很快就熟悉起来，有说有笑，边干边聊，心里没有隔阂。女工们早已把要对“走资派”提高警惕的话抛到脑后去了。

站在邓小平所住的将军楼上，可以遥望到拖拉机修配厂，但要进厂，必须沿围墙绕个大弯，多走一里多路。罗朋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老首长表示一下特殊的关照。他和陶端璠、黄文华等商定，从围墙上侧开一道小





门，再沿山坡修一条小道直通步校大门，这样，邓小平夫妇上下班就可以少走很多路。在工人們的齐心努力下，一条专为邓小平修建的“邓小平小道”终于建成了。从此，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小路上总能留下邓小平夫妇的足迹。工人们用自己朴实的情感，关心和帮助着这两位身遭不幸，又十分刚强的老人。一次因为路滑，邓小平不慎摔了一跤，工人们知道后，立刻自发地把路重新修整了一遍。

日子一天天过去，邓小平夫妇和工人们的情谊也在一点点加深。在厂里，工人们称邓小平“老邓”，有的干脆叫他“老头”，这使邓小平感到亲切、平和。在工人们心目中，邓小平与什么“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是不沾边的，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

日子过得飞快。算起来邓小平夫妇来江西已有一个月之久了。这一天，黄文华通知邓小平，上级让他把这一个月来的劳动、学习情况写成心得体会。邓小平说道：“可以，我准备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邓小平在危难的时候，依然坚信毛泽东和党中央，正像他对黄文华所说：我对毛主席是有深厚感情的。

邓小平身在江西，过着艰苦的谪居生活，心里想的却是党和国家的前途，惦念着曾在一起主持中央工作，又一同被赶出北京，发落外省的战友。当时刘少奇被押解到河南开封，朱德被下放到广东从化，陶铸则在身患癌症、生命垂危的情况下被遣送到安徽合肥……

他们都曾为新中国的诞生浴血奋战过，都曾为共和国的兴旺发达日夜操劳过，如今又都因为制止“文革”对国家的破坏而蒙冤受辱。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每天晚上，是邓小平最难熬的时光。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痛苦，家庭的不幸，都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噬咬着他的心，





侵扰着他的头脑，使他无法入睡，只能借助安眠药。

1970年1月，邓小平一家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困难：邓小平、卓琳的工资停发了，每月只发给他们生活费，其余工资由中央办公厅代管。邓小平夫妇的收入，一下子从五百七十五元减到二百零五元。这些钱不仅要打发日常生活的花销，还要帮助远方插队的子女，特别是瘫痪卧床的邓朴方。

经济的拮据，使三位老人本已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一家人每天吃素，一周才能吃上一次肉。邓小平爱抽的熊猫烟换成了大前门，酒也只能喝卓琳亲手酿的米酒。

为了补充生活所需，三位老人自己动手，借着春雨润湿的土地，在院内拓出了一片菜地。种上了小白菜、辣椒、丝瓜、西红柿、苦瓜、南瓜等各色蔬菜，每天上午，邓小平夫妇去工厂劳动，继母夏伯根在家里洗菜做饭，下午三个人一起在园中耕作。松土、施肥、浇水、锄草，淋漓的汗水换来的是满园葱绿，果实累累。

邓小平要在江西劳动多久？工人们猜测，黄文华也猜测。这个问题谁也回答不了。邓小平自己是作了长期劳动的准备的。他坚持锻炼身体，每天在小院内绕着将军楼走四十圈，额头上沁出了汗珠。日复一日，从不间断。久而久之，草地上被踩出了一条小路，第二条“邓小平小道”就这样诞生了。邓小平作出了在江西劳动十年的计划。“估计我这个身体坚持十年还是可以的”，邓小平爽朗地笑着说。黄文华想：有他这样乐观的态度，生活中就会永远充满希望。

邓小平除了每天上班劳动外，可以有一部分时间看书读报。一天，他从报上得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出版一批古典名著，非常高兴，连忙请省革委会核心小组的秘书赵子昌代买一套。很快，赵子昌就把全套《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交到了邓小平手里。邓小平接过书，一本一





本抚摸着，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亲切。赵子昌要拿发票回去报销，邓小平坚决不肯，说道：“自己看的书不能花国家的钱。”

四大古典名著，为邓小平单调而枯燥的生活增添了难得的乐趣。

邓小平夫妇日夜思念着儿女，几经周折，他们终于得到了中央办公厅的批准，同意把子女调到身边来，这无疑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欢乐。

邓小平有五个孩子。大女儿邓林，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因为邓小平夫妇的牵连，一直没有分配工作，在学校里挨批斗，写交代，受了很多折磨，她是最晚一个来到父母身边的。

孩子中最苦的要数邓朴方，他在家中排行第二，小名胖胖。他曾是北大技术物理系的高才生，“文革”时，受父母影响，被开除党籍后关押。为了逃离那间放射线外泄的实验室，他翻窗顺四楼的落水管而下，不幸从楼上摔下，脊椎骨摔成重伤，胸以下肢体完全瘫痪。医院却把他轰了出去，他只能住进北京清河社会救济院，靠躺在床上编纸篓为生。1971年元月1日，他终于被接到了江西。

其他三个孩子：邓楠、邓榕、邓质方也在1970年先后从安徽、陕西、山西等地农村来到江西，与父母团聚了。生活虽苦，但一家人能守在一起，相互照应，对邓小平夫妇来说，也是一种安慰了。

在江西的三年多，是邓小平一生中十分特殊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上了一次劳动大学”。





毛泽东决定起用邓小平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在全党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毛泽东大病了一场，一下子显得憔悴多了。林彪的背叛，深深刺痛了毛泽东；社会的动荡和混乱，也引起了他的深深忧虑。1972年5月查出周恩来患了癌症，毛泽东的心情更是沉重。谁忠谁奸，通过林彪事件，已经判然明矣！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重新起用一批老干部，依靠他们掌握国家航程。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共和国元帅陈毅的追悼会。他安慰陈毅夫人张茜时，也说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机敏的周恩来迅速捕捉到了毛泽东发出的这一信号。他暗示陈毅的子女把这句话有意识地传出去，制造舆论。当时，邓小平同全国人民一样，还不知道中国已发生了这么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只是对1971年10月1日林彪竟然没有出席国庆活动感到十分诧异。11月5日，根据中央关于将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材料传达到群众的精神，邓小平接到通知，去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

这天上午，邓小平来到职工食堂，跟工人们坐在一起。他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双目凝视前方。厂党支部书记罗朋招呼邓小平说：“老邓呀，你耳朵听不清楚，请您和卓琳同志坐到前面来。”邓小平见罗朋起身让座，就站起来和卓琳一起走到前头，紧靠着罗朋和新建县工业局长萧焕杰身旁坐下。

罗朋读林彪和陈伯达罪证材料时，整整两个半钟头，邓小





平没有离开座位，也没有同人讲话，端端坐着，脸上非常平静，没有任何表情。

随后，以车间为单位讨论，邓小平仍然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听着工人們的讨论。下班后，卓琳向黄文华提出把文件带回去给邓小平看，黄文华表示同意。

中午，全家人聚到一起，卓琳向大家讲述了文件内容。邓小平显得十分兴奋和激动，但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坐在一起打上了扑克，一直玩到深夜。

很快，邓小平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他还表示，愿意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再做一些工作。

自此以后，邓小平一家的政治环境开始出现了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有所好转。程世清倒台后，新的江西省委负责人白栋材、黄知真探望了邓小平。不久，中央同意了邓小平的请求，安排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回京治病。

林彪事件后，也在江西参加劳动的王震，先期返回了北京。尽管被批为“走资派”，王震仍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王震与毛泽东有着很深的友谊，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并力荐毛泽东早日起用邓小平。

1972年“五一”节前夕，邓榕送哥哥邓朴方回京治病。王震得知后，托人把邓榕叫来。王震让邓榕转告邓小平，主席对邓小平是有区别的，一直说邓小平还是有功劳的，他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主席还不同意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王震还表示自己要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上书，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邓榕回到江西后，向邓小平介绍了北京之行的情况。邓小平对王震正直勇敢、行侠仗义的品格，十分感动和钦佩。





这年8月，邓小平通过江西省委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致信毛泽东，再次揭发批判林彪集团，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

毛泽东想到了邓小平——想到了邓小平自中央苏区以来的历史，想到了其人超群的才干，当然也不会忘记自己曾经对他的评价。于是，他出人意料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邓小平的复出准备条件。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写了如下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再说一遍”的意思，除了表示强调之外，有资格看到这份指示的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此时，江青集团的势力已很强大，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深感势单力薄，难于支撑局面，急需一个得力的帮手。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非常高兴，马上派人将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刷若干份，分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周恩来还立即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





织生活。

接到中央指示，黄知真立即来到“将军楼”，向邓小平传达了中央的通知。邓小平明显地意识到，为党和人民重新工作的机会就要来了。

1972年底，在周恩来安排下，秘书王瑞林和公务员被调到邓小平身边。紧接着，根据中央的决定，邓小平在江西省委负责人陪同下，到井冈山等地参观，凭吊了革命遗迹，还重访了当年担任过县委书记的故地瑞金。参观景德镇时，瓷厂的工人热情地送给邓小平夫妇四个特制的花瓶。邓小平十分珍爱这份凝结着江西人民深厚情谊的礼物，一直把它们摆在自己的办公室内。

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一家祖孙四代近十口人踏上了返回北京的路程。行前，邓小平让卓琳带着孩子买了一些糖果、饼干和香烟，送给那些曾真心照顾过他们一家的工人师傅，以表示谢意。

当时鹰潭还是一个镇。镇党委接到通知，说邓小平一行要路过鹰潭，并让他们迎接。镇党委和革委会成员们尚不知道中央的安排，一时不知该怎样接待，该怎样称呼邓小平。打电话问省里，省里也不知道。于是，他们请示中央办公厅。办公厅的同志也不知该怎样回答，便请示了周恩来。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工作安排问题显然已成竹在胸，他直接打电话到鹰潭，告诉当地负责人：“邓小平的副总理职务还没有解除嘛，你们可以称他为小平同志，也可以称他邓副总理，也可以叫他老邓。”镇党委一班人接到周恩来总理的电话，心里一下明亮起来。

邓小平乘坐的列车到达鹰潭时，当地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上前称呼“邓副总理”时，邓小平的眉毛一下子舒展起来，但他马上平静地说：“还是叫我老邓吧。”

很快，邓小平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夸“人才难得”

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指示，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随后，中央正式作出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1973年4月13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一时间，舆论界受到极大震动。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则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了，他的职务仍是国务院副总理。起初，他和全家住在花园村，工作主要是分管外事，接待外宾。值得回味的是，在决定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同时，王洪文和华国锋也分别从上海、湖南调到北京，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这也是毛泽东的决定。这个时期，在毛泽东心目中，王洪文已取代林彪，成为新的接班人。华国锋也是候选的接班人。不久，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开始参加政治局工作。此时，邓小平还未享受到这一“殊荣”。随后，王洪文担任了党章修改小组的组长，周恩来只担任了小组成员。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开幕。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王洪文身着军装，作了关





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接着，王洪文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向全党全国全世界表明了接班人地位。而邓小平只当选为中央委员。

但毛泽东心里很清楚，这个党，这个国家，是非常需要邓小平的。他尽管选定了王洪文，但王洪文能否挑起这个重担，他还是要看一看的。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则是非常了解的。在这个危难时期，他不得不重用邓小平。

毛泽东下这个决心还与一些老师的态度有关。一天，七十七岁高龄的叶剑英元帅来到毛泽东的书房：“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



1973年12月12日、13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领导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他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他见人们听得全神贯注，就自顾自地说下去：“我们现在请了一





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都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接着，毛泽东又转向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主席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任；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邓小平出来工作，自然刺痛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一开始，他们曾拼命设置障碍，极力阻挠邓小平复出。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一出口，江青一伙的阴谋自然无法得逞，他们便在日常的工作中予以干扰。于是，以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代表的一方，同江青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74年3月，中央政治局讨论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人选时，江青等人坚决反对派邓小平去。3月27日，毛泽东致信江青，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随后，邓小平亲自主持，准备了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报毛泽东审阅。4月4日，毛泽东批示：“好，赞同。”

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会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他以新一代政治家的形象首次在世界舞台上亮相。

敏感的外国评论家、记者们纷纷预测：“精力充沛的邓小平，毫无疑义将成为周恩来的接替者，中国未来的总理。”

那个为当总理而寝食不安的张春桥看到这些报道，气得七





窃生烟。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接着，中央决定近期召开四届人大，并开始筹备工作。为了趁周恩来病重夺取国务院的领导权，江青一伙采取种种手段，恶意中伤周恩来和邓小平。他们诬蔑和影射周、邓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自诩为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法家领导集团”。制造所谓“风庆轮事件”，就是江青等人向邓小平无端寻衅的典型事例。

这一年9月底，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万吨远洋货轮“风庆”号远航归来。“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得知风庆轮上交通部派去的部分同志抵制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和“卖国主义”时，就写了一封长信，诬蔑坚持正确意见、维护周恩来、反对江青极“左”言行的干部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江青等人借机发难，把矛头指向邓小平，企图搁置毛泽东关于第一副总理人选的提议。10月13日，江青在《国内动态清样》上作批示，并给政治局写信，质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她声称：“少数有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作了批示，表示同意江青的意见，叫嚷要揪“总后台”。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抛出关于风庆轮的材料，借机发难，提出所谓“风庆轮事件”中“崇洋媚外”问题，对邓小平进行突然袭击。江青质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邓小平当即顶住：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

江青大吵大闹，进一步逼问：你对批判“洋奴哲学”是





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再也压不住火气了，这样的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待人。

江青等四人一起站起来，指责邓小平：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

忍无可忍，邓小平拂袖而去，离开了会场。

当晚，江青纠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开会，分析、议论邓小平敢于同江青吵架的原因。江青称：邓小平所以吵，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反对文化大革命。

张春桥阴险地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上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他还说：我估计最近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果然发生了。

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

姚文元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庐山会议气息！形势如何发展，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

江青等人密谋后，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休养的毛泽东汇报。

10月18日，王洪文乘飞机来到了长沙。下午两点左右，毛泽东接见了王洪文。王洪文询问了一下毛泽东最近的身体情况后，便急忙说明来意：“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这件事，江





青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

毛泽东沉默不语。王洪文接下去臆测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因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他还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见毛泽东还是不讲话，王洪文只得自己收场说：“今天还要赶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着我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很明白王洪文此番话的真实用意。他当即对王洪文说：“那好，你回去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王洪文只好表示：“一定要按主席指示办。”

同日，江青把王海容和唐闻生叫到钓鱼台，嘱他们报告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讨论风庆轮问题时，邓小平和江青发生争吵，事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议开不下去了；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在医院里很忙，并不全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等等。

当晚，王洪文回到北京，江青等四人又在一起预谋，并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找去。张春桥把“批林批孔”和国内财政开支及对外贸易中的逆差，说成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崇洋媚外”造成的，还把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的抵制比作所谓“二月逆流”。江青要王、唐二人陪外宾见毛泽东时，把这些问题反映给毛泽东。

10月19日，在医院的周恩来得知“风庆轮事件”后，找邓小平了解事件经过。邓小平非常平静地把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报告了周恩来。当天，周恩来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医院，向她们明确指出：我已知道政治局会议的问题，经过了解，





“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周恩来表示，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外宾飞到长沙。毛泽东听取“风庆轮事件”的汇报后，要王、唐回北京后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管。他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还愤然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他还称赞邓小平针锋相对地顶江青。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及王洪文、江青等人谈话，并约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解决“风庆轮事件”问题。11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在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还与邓小平和李先念等人多次研究、交换意见。随后，在12月间，周恩来和王洪文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国家人事安排工作。毛泽东察觉到江青有野心，因而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称赞了邓小平，说他“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政治上比他（指王洪文）强，他没有小平强”。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邓小平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不久，四届人大召开，组成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江青等人的组





阁阴谋破产了。

1975年2月2日，身患重病的周恩来，给毛泽东呈上《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提议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理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





初纠‘文革’错误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全国政治经济形势非常混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即开始对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力图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 70 年代末以后所进行的改革的先声。

1975 年 1 月 25 日，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开会，邓小平提出“军队要整顿”，要求提高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这是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烧出的“第一把火”。

邓小平抓经济整顿，首先从铁路开刀。“批林批孔”以来，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局运输堵塞，严重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大干线的交通。邓小平下决心整顿铁路。在连续召开一系列会议之后，根据邓小平的部署，铁道部部长万里亲自率领工作组下到徐州、太原、郑州等地，发动群众批判派性，采取铁的手腕，逮捕一小撮坏人，调离一批坏头头，整顿懒散班子。到 4 月，严重堵塞的路局全部疏通。

为了抓好生产，邓小平还抓紧整顿钢铁工业，要求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要找不怕被打倒的人参加领导班子。在 5 月 29 日的讲话中，他还提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为纲”。经过几个月的整顿，经济形势迅速好转。

邓小平还狠抓了干部政策的落实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





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者予以释放。随后，大批长期被关押的干部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人分配了工作。邓小平接到贺诚女儿要求为贺诚分配工作的信后，当即转给毛泽东，并对贺诚任职作了安排。

邓小平对文艺政策也进行了调整。1975年7月，邓小平就文艺问题向毛泽东作了工作汇报。毛泽东表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解放了一批被江青一伙作为“毒草”而遭到禁锢的电影。1975年7月18日，长影厂编导张天民致信毛泽东和邓小平，对江青和文化部批判电影《创业》提出不同意见。邓小平把信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对“四人帮”组织拍摄的反映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影片《春苗》，邓小平不屑一顾。7月31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查被“四人帮”查封的电影《海霞》，肯定了这部影片，并决定在全国上映。对于话剧《万水千山》，邓小平和政治局也抵制了江青一伙的诬陷，予以放行。

在教育方面，早在1974年酝酿新一届政府组成人选时，周恩来就对邓小平说，教育事关重大，不能让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周荣鑫取代迟群，当选为教育部长，他表示：“要打倒，我也不怕。要做小平同志讲的那种不怕被打倒的人。”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周荣鑫领导教育部狠抓了教育整顿，提出要提高教育质量，要改变青少年不读书不学习文化课的现状，并制定了若干项后来被诬为“右倾翻案”的措施。

邓小平还继续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5年4月，邓小平就江青一伙鼓噪的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向毛泽东请教，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随后，毛泽东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的荒谬，并点名批评了江青。1975年五六月





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开会，对“四人帮”进行批评。王洪文、江青等人被迫作了检讨。会后，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会议“有成绩”，给江青等人当头一棒。

然而，事情的发展充满了曲折。到1975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对邓小平厉行整顿，系统纠正“文革”错误的做法却越来越不能容忍了。

毛泽东的侄子、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的联络员毛远新，在1975年9月底到11月初，多次向毛泽东汇报，诬告邓小平。毛远新阴险地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72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认为他提出的“三项指示”，即学习理论和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受到了邓小平的曲解，他是绝不能听之任之的，何况还有对“文革”的态度问题呢？前些天康生带病受江青之托前来“告状”，说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看来是“无风不起浪”啊！今年七、八、九三个月，“政治谣言”四起，恐怕也和邓小平这个“钢铁公司”有关……

于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10月20日前后，毛泽东对邓小平转来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人写给自己的两封信作了批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根据这一指示，11月初，由清华大学发起，教育界开始“反击右倾





翻案风”。

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在中央政治局内对邓小平展开批评。他认为，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让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把他的意见全讲出来。毛远新当即照办。

毛泽东作了一次试探，提出让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在这个问题上统一认识。

不料，邓小平的四川辣子脾气再一次在决定自己命运的关头表露无遗。他拒绝了这个建议，提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中央政治局认为他态度顽固，提出停止他的工作。毛泽东也直接发话，让邓小平“专管外事”。

1975年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正式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走完了他充满艰辛的人生旅途，悄然逝世于北京医院。邓小平满含悲痛，在1月15日的追悼会上，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为周恩来致了悼词。

1976年2月15日，华国锋主持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关于“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讲话。对于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当时毛泽东还认为，“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依照这个调子，华国锋代表中央作动员报告，要求“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但是“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





要广播、登报”，“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这样，“批邓”问题在党内正式公开。

丙辰 1976 清明节，天安门广场花圈如海，人流如潮。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特别是针对江青集团压制悼念周恩来活动的倒行逆施，人民群众自发掀起了全国性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悼念与声讨活动达到高潮。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局势，对这次活动作了错误的定性。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说：“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说：“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所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江青等人声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决定“反击”，抓“反革命”。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

在形势最紧张的时间里，邓小平闭门不出。一天，他把几个子女叫到身边，叮嘱他们一个也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以免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4月5日下午，邓小平被人从家里叫走。当晚，“天安门事件”发生：上万民兵、公安干警、卫戍部队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对群众大打出手，血腥镇压。

4月6日，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认定，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是“反革命事件”。4月7日，毛泽东两次听取毛远新的汇报，指示公开发表姚文元组织炮制的、以《人民日报》记者和工农兵通讯员名义出笼的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和吴德的广播讲话。他掰着手指头作了归纳：“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提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并提议华国锋任国务





院总理，党的第一副主席。根据这个指示，中央政治局在当日通过了以上两个任免决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一小时之后向全国作了广播。邓小平被当作“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第三次被打倒了。

邓林后来谈到，“说我父亲操纵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都是无稽之谈”。邓小平也坦然地说，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其实我已经失去人身自由了。

批邓的会议也开到邓小平家里，参加者有邓家的子女和工作人员，大家明知道是一场闹剧，又不得不敷衍着演下去。

邓小平被软禁后，曾有人来邓家取他的生活用品，几个子女都争相往包里塞东西。这对做父亲的是一种无声的支援。4月5日邓小平离家的那一天，孩子们就塞给他一副扑克牌。在独处的日子里，年逾古稀的老人经常用它玩一种叫做“开牌”的游戏，打发孤独的时光。





坚决抵制“两个凡是”

1976年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充分准备，顺乎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行动，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次日，叶剑英即派人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透露给邓小平和其他被迫害的人。

邓家院子沸腾了，邓小平拿出自己最喜欢的酒，喝得十分畅快。他长出了一口气，“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0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写信，表示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决策，并要求参加中央安排的工作。

但当时，邓小平仍是入“另册”的人，什么文件也看不到。过一段时间，他唤来派到自己身边工作的中南海服务处处长李维信，悠悠地问道：“粉碎‘四人帮’的材料下来了么？”

“下来了材料之一，后面还要下。”李维信恭敬地回答。

“传达到哪一级？”

“全体党员都传达到了。”

“你帮我反映一下，我要求看到文件，打招呼会上华国锋同志的讲话，我要看一看。”

很快，李维信将粉碎“四人帮”的材料之一交到邓小平手中。

邓小平戴上老花镜，看得十分认真，有时嘴唇还轻轻翕动。

“我看呀，不需要材料之二、之三了”，他痛快地吐出一





口烟气，“材料之一就说明问题了”。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不同角度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严重危害，意识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抵制“左”倾错误的正确性，强烈要求华国锋和以他为首的党中央下决心纠正错误，尽快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带领国家走上复苏的道路。但是，人们在欢欣与希望之后，却一再地感到失望。

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说：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免不说。这是华国锋本人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的观点。

经华国锋批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两报一刊”社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创造，意在表明这是党中央和最高统帅部的意见，因而极具威力。社论公然提出：“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报告起草时，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这位德高望重、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老前辈，几次恳切提出，要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得好一点，以利于他快一点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平反。对这个意见，华国锋表面上接受，实际上是压制。他在会上的长篇讲话中说：我们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





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又说：“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还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他声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

陈云、王震等老同志，顶住强大的压力，奋起抗争。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和党的事业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王震发言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王震尖锐地说：“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邓小平同志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与主流（是革命的），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他们的发言义正辞严，掷地有声，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但是，华国锋、汪东兴等却予以压制，不让登会议简报，不让讨论。

但是，邓小平的复出已经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了。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大力压力下，华国锋不得不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种“让步”当然是有条件的。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文字材料，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是革命行





动。邓小平坚决拒绝，表示：“我出不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邓小平知道，他的复出与否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辱，对广场事件评价的意义也远远超出对其性质的判定。其结局规定着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预示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写信，率先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个意见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的肯定和支持。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为邓小平重新工作做了准备。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汪东兴和李鑫）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被一致通过恢复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他的“第三次复出”，也是正义力量和错误领导之间经过九个月的激烈较量得出的最终结果。他在全会上，针对“两个凡是”思潮，再次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他在当时“个人崇拜”仍十分盛行的情况下大胆地提出，对毛泽东在不同时间和场合，针对具体问题讲的话要作具体分析。这是一次公开亮相，也开创了思想解放的先河。





平反冤假错案

恢复工作后不久，邓小平就把解放老同志、平反冤假错案放在重要的位置。他支持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领导甄别平反工作。胡耀邦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这个做法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胡耀邦领导下的组织部，成为当时执行邓小平的意图、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冲击“两个凡是”十分得力的部门。

一天，邓小平在西山的住所来了两位女客，邓小平虽不十分熟悉，但还是很快认出了她们——陶铸的夫人曾志和女儿陶斯亮。

陶铸在“文革”前任中南局第一书记，“文革”初毛泽东将他调到中央，委以中宣部长和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要职。由于在具体工作中得罪了毛泽东和江青，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不力，陶铸没多久就被打成“全国第三号走资派”。林彪的“一号通令”下达后，被赶到合肥监管，不久后因患胆囊癌不治而死。曾志和陶斯亮为了争取给陶铸平反昭雪，到处奔走呼吁，但四处碰壁，几十万字的申诉材料如石沉大海。这次母女俩满怀希望来找邓小平，希望他出面讲话。

邓小平接过曾志递上去的材料，“哦，陶铸的”，随手放到桌子上。





这一态度使陶斯亮的心凉了半截：他怎么能这样呢？躲闪？难道不肯为一起被打倒、比他更不幸的战友说一句公道话吗？她向母亲讲出了自己的忧虑。

曾志心里有底：“耐心等等。主席说他是绵里藏针……”

果然，邓小平出山后首先办的几件大事中，有一件就是将陶铸的案件从专案组调出来，交胡耀邦负责审查，并且亲自交代了许多话，表示出少有的重视。陶铸的案子原来就是卡在专案组，邓小平把它调出来交给中组部，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对陶铸的问题亲笔作出批示：“陶铸同志，他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和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陶铸问题终于水落石出。不久，陶铸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规格很高，邓小平亲自主持追悼会，陈云致了悼词。

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在当时的环境下也受到了“凡是派”的严重干扰。有一次，胡耀邦在工作汇报中谈到在复审、平反过程中难度相当大时，邓小平发火了：“怕什么！‘文革’中把你七斗八斗你都不怕，现在还怕什么！有困难找我，先搞影响大、涉及面广、难度大的冤案。”说着就给汪东兴打电话说：“我提议，明天下午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是要不要推倒‘两个凡是’，每个委员都要表态，这关系到究竟要不要拨乱反正，国家向何处去的大问题。”电话挂了，邓小平又对胡耀邦说：“一定要从组织上解决‘两个凡是’的问题，不能再等了。十几年下来伤了多少人？还能等？谁坚持‘两个凡是’，谁就必须离开领导班子。”

在邓小平、胡耀邦的干预和领导下，除陶铸外，薄一波、彭德怀、杨尚昆、彭真、李立三、陆定一、习仲勋、王鹤寿、曹荻秋等一大批同志的冤假错案得到纠正，有些同志还恢复了





职务。张志新、遇罗克、史云峰等，因反对“四人帮”、为老一辈革命家鸣不平的革命烈士得以昭雪，他们的事迹被广泛宣传。特别是1980年2月为刘少奇公开平反昭雪，除掉“文革”中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更是党心大顺，民心大快。





真理标准的讨论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是十分反感的。他的复出本身就是对“两个凡是”的冲击和否定。他清楚地知道，推翻个别领导人讲过的、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结论，不仅能理顺民心，告慰那些屈死的冤魂，也是砸碎思想枷锁，带领整个民族开拓前进的基础。

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后，明确提出研究党史要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一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形势的发展，逐渐提出判断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究竟以什么为标准的问题了。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张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取得的。”文章发表后，编辑部陆续收到二十几封来信，围绕这一观点展开了激烈辩论。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由胡耀邦审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根据报界同仁的事先约定，新华社当天播发了这篇文章。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了此文。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篇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在全党和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也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华国锋和汪东



兴等非常不满。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不表态”，“不卷入”。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许多场合点名指责这篇文章，说文章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并批评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社负责人“没有党性”。他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邓小平明确支持这场大讨论。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尖锐地批评了那种把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说成是“犯了弥天大罪”的奇谈怪论，指出：“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讲话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6月24日，在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支持下，《解放军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一文，系统地回击了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提出的责难。



7月21日，邓小平同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谈话，要求中宣部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公开批评中央内部的思想僵化。9月16日，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时，他批评说：“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作‘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他还指出：“两个凡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毛泽东同志在世也肯定不能同意。1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又说：“不能要求毛泽东同志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如果这样，林彪的‘天才论’不就对了吗？”

这是一场激烈复杂的政治较量。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中，第一个站出来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观点的是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不久，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在省委常委会上也提出要肯定“文革”前的黑龙江省委，弄清“文革”以来全省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打破了“文革”中由中央领导人给黑龙江省委定的性。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地方纷纷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的浩大声势。

在这场讨论中，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根据华国锋和汪东兴“不卷入”的指示，长期保持沉默。11月，谭震林应约写了一篇纪念毛泽东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文章，文章中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但《红旗》杂志负责人却要删去这些内容，谭震林坚决反对。官司打到中央，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表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





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看来不卷入本身就是卷入！”

一针见血，痛快淋漓，只有邓小平这种性格，这种见地，这种身份的人才能说这样的话。

邓小平对这场真理标准讨论一直评价很高。他说，这场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作为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首先看重的是其政治意义。1978年12月13日，华国锋被迫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他表示：“两个凡是”的提法“绝对了”、“不妥的”，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汪东兴在会上也作了初步的检查。

政治上的优势迅速向组织上的优势转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汪东兴先是在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长，不久又与纪登奎、吴德、陈锡联一起被批准辞职。1980年11月，华国锋被同意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两项职务分别由胡耀邦、邓小平接任。





自告奋勇抓科教

在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的日子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从诸多的繁忙事务中抽出身来，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是十年浩劫以后我国科学和教育工作拨正航向的重要会议。

1977年8月4日上午，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子，来到人民大会堂，向聚集在这里的三十三位著名科学家、教授及科教部门的负责人含笑致意。他身着白衬衫、绿军裤、黑布鞋，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坐下来后，他对大家朗声说道：同志们好！我自告奋勇地管科学和教育，中央也同意了。赶超世界，从何着手呢？就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现在请大家发言，我听听大家的意见。

“自告奋勇管科学和教育”，是邓小平的远见卓识，也是时代的需要。

1971年8月13日，经姚文元修改和张春桥定稿、毛泽东批示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纪要》抛出了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即：“文革”以前的十七年里，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使本该受到国家高度重视的教育、科技事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长期在科技园地里辛勤耕耘的专家、教授，被迫放弃了自己所钟爱的事业，被赶到工厂、农村接受“再教育”，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不堪折磨和凌辱，含冤弃世。全国大多数科学研究机构和各类学校陷入了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大学招生考试停止了，代之以由工农兵保送。中小學生交白卷、反“潮流”更是风行一时。

年轻的共和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相当乐观的估计，到1977年为止，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要比发达国家整整落后二十年，中国的科技人员只有二十多万，约相当于美国的六分之一，不到苏联的四分之一，这支队伍又是那样的残破不全。更为严酷的是，这二十年的差距及由此造成的各种损失，是无法在二十年内弥补起来的。照此下去，“四个现代化”无望！民族振兴无望！

邓小平忧心如焚。他在1977年5月复出工作尚未定局的时候，就在与王震和邓力群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要科学技术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知识界的气氛已经日益热烈。今天，邓小平又亲临座谈会表示要向大家学习，倾听大家的意见，这给多年抬不起头来的“臭老九”们带来了福音。

发言极为踊跃。有人以自己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控诉了江青一伙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要求中央对“黑线专政”问题给以澄清；有人建议立即恢复高考制度，把人才培养的





第一关；有人提出给保送和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补上基础课；有人呼吁恢复每周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有人要求改善中年科技人员的生活待遇……

从8月4日到8月7日，专家、教授们一气畅谈了四天。邓小平总是每天上午8点半准时到会倾听，中午只稍稍休息一下，直到傍晚时分才离开。

8月8日，邓小平积多日之思考，在座谈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八·八讲话”。

他抓住关键，重新估计了教育战线的十七年，为知识分子摘掉了帽子。他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他再次申明“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戏言：“老九不能走”，提出要为知识分子恢复名誉。当他表示要从各方面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时，会场上多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邓小平和由他主持制定的科教政策激动着知识分子，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心。会议圆满结束。

在邓小平的大力督促下，1977年秋季，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考试制度得以恢复。次年春天，“文革”后第一批经过高考录取的二十七万多名青年跨入了大学校门。随之而来的是举国上下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普热”、“文凭热”、“外语热”。一个民族在多年禁锢之后终于重新树立起了对知识和科学的尊崇。

1978年3月，中国科学界多年来的第一次盛会——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反映之强烈现在已经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来描述了。著名作家马识途以特约记者的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





上一封信的片断，真实地反映了与会者心中雨后天晴般的新鲜感和兴奋感：

邓副主席讲话了。字字句句那么明确，亲切，大家屏息听着，深怕漏掉一个字。每讲到精彩之处，随之而起的是雷动的掌声，响彻会堂，掌声中还夹杂着赞叹声。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热烈的掌声。

“科学工作者是劳动者”。——更热烈的掌声。

“我愿意做你们的后勤部长”。——极其热烈的掌声。

我本想记住鼓掌的次数，但是因为次数太多，我自己也忘乎所以了，陪伴掌声的又有多少无声的笑和擦不尽的眼泪呀。

科学大会结束后不久，邓小平提议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也于4月22日在北京召开。这两次会议的相继举行，使全国科技、教育战线的形势为之一变。1978年的春天也因此成了“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

从此以后，我国的科技和教育战线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科技部门恢复了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摆脱了无休止而又无甚意义的“政治学习”，技术职称评定得以恢复，对中青年科技骨干实行科研津贴，被解散的国家科委重新组建，新的发明奖励条例向全国颁布。继恢复高考制度后，1981年中国正式实行学位制，招收了首批博士生。投入到科技和教育上的经费也逐年增多。

但是，邓小平仍没有满足。

1978年6月，他同清华大学的一些负责人谈话，一针见血地提出：“重点学校规模应该逐步扩大，将来要扩大一倍。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有三五百万大学生，决不算多。不搞好大





学，就提不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以后他又多次提出要多办大学，要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否则现代化就化不了”。

1983年3月初，邓小平在风尘仆仆地视察了江苏、浙江、上海等地之后，同胡耀邦总书记等谈话，仍然没有离发展高等教育这个话题。他说：“大专院校要发展，近期不说发展一倍，也可以发展半倍。现在我们是这个能力的。重点院校增加一倍学生没有多少问题，师资不缺，主要是房子不够。再拿出一块钱建校舍和宿舍，我看也可以拿得出来。”

这个讲话形成了一种压力。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急忙在3月5日和3月10日召集会议，组织落实。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并向全国转发了教育部和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

同时，邓小平的视野在延伸，他在考虑多出人才的同时，也要出好人才。这就需要变革旧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机制。

1983年的国庆节，他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寄托了他对跨世纪教育的希望。

科学与教育是一条互相影响，互相带动的因果链。作为七八十岁的老人，邓小平始终对科学技术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这恐怕也是他思想上不保守、不停滞的一个主要原因。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等四位在不同学科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老科学家，鉴于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的趋势，上书邓小平，建议国家抽出力量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他立即作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发展我国高科技“宜速决断，不可拖延”。在他的亲自过问和紧急催办下，国家科委立即组织二百多名专家全面论证和反复修改，制定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八六三计划）纲要》，决定在几项重要的高科技领域追踪世界水





平，经过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后实施。第一个五年过去了，“863计划”初战告捷，在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新材料等七大领域结出了累累硕果。

对于中国发展高科技的实力和决心，起初曾有不少国内外人士存有疑虑。邓小平决心回答这些问题。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率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位于北京西郊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参观，他发表讲话说：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必须在高科技领域有一席之地，我们不仅要搞高能加速器，还要参与其他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他还表示，尽管我们现在穷，但如果不参与，就很难再赶上世界的发展。

1989年邓小平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以后，仍然时刻关注着我国和世界高科技领域的动向和发展，不断提出有关发展科技的新思路。1991年春天，他再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饶有兴致地为“863计划”工作会议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1992年1月，邓小平在参观珠海亚洲仿真公司时，兴奋地说：“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

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邓小平的这些真知灼见已逐渐成为全体国民的共识，推动着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去参加智力——技术——经济实力的角逐。





支持包产到户

过去，实行“政社合一”的公社制度，土地归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农民辛苦一年，得到的工分换来的钱少得可怜，搞不好还不够还生产队的借款。种田的人自己的粮食却不够吃。干得多，干得少，大家都一起受穷，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生产也上不去。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早就有干部和群众提出过“包产到户”办法，但被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单干风”。很多人人为此受到批判，撤职，甚至坐牢。

1979年春天，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十八个饥肠辘辘的农家汉子，在一张旧纸上联名签字画押，决定将生产队土地分开，包干到户。他们冒着坐牢的风险，向温饱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这一壮举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6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来到凤阳，他听了有关大包干的汇报后，当即表示支持。

7月，邓小平视察安徽，同万里长谈。之后，安徽的包产、包干到户的进程冲破层层禁令，势不可当。几年之后，邓小平还赞叹道，责任制是农民的创造。

四川也不甘落后。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在全省农村实行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扩大农民自留地，支持农民包产到组……





但是，人们的笑脸刚刚绽开，增收的谷米尚待入库，怀疑、指责就接踵而来，什么包产到户、定产到组“不符合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精神”，“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此伏彼起，农民们刚有些血色的面孔又充满了惊恐。

邓小平出来讲话了，他把一些中央决策同志找来，明确表态：“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大。”他批评那些“左”的议论，“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他为中国农村初见的温饱而由衷地高兴。就在这一年，凤阳的粮食产量猛增至五点零二亿斤，比1978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七，1981年达六点七亿斤，1982年七点一五亿斤，三年迈出三大步。古老、广袤的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邓小平讲话以后，尽管还有一些地方的高级领导干部思想不解放，在犹疑、在观望、在抵制，但改革潮流毕竟势不可当，几年之内，“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推广，“政社合一”的公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农民对土地的那份挚爱被重新唤起了。1984年以后，邓小平逢人便夸，中国的农村改革三年大见成效，为城市改革提供了经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情系特区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在会议上，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的习仲勋、杨尚昆在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提出了一个建议：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地理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

这个想法与邓小平不谋而合。

在中南海的一条幽静的绿阴小路上，邓小平和两位广东省的领导人边走边谈。



“小平同志，还记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吗？”

“记得的”，邓小平稍稍停下脚步，“在延安嘛，在毛主席的窑洞里”。





“那地方我好些年没有去过了”，省委书记讲起来有些激动，“当初那么小小一块边区，没想到就打出这么大一块江山——”

“不过”，邓小平有些沉重，“那儿至今还很穷，老边区应该富起来”。忽然，他的脚步停住了，“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

“特区？”两位广东的同志一时没有领悟邓小平的这个跳跃性思维。

“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根据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精神，广东、福建两省委分别于6月6日、6月9日写出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呈送中央。

7月1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这两个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城市试办特区。

当年，从全国各地抽调的一百零八位工程师打点好行装，齐聚深圳。第一批勇于“吃蟹”的创业者开始为新中国的第一个特区绘制蓝图。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更名为“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6日，在南中国海滨深圳小城，中国的第一号特区诞生了，爆竹声响成一片。珠海、汕头、厦门特区也相继上马。春天的希望终于带来了夏天的火爆。

四年过去了。特区的建设一日千里，新的举措相继出台。同时，各种各样的疑惑、议论像南海大潮一般涌来。特区毕竟是太年轻了，它默默拉车，磕磕绊绊，一时间竟无暇顾及匆忙的步履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摩擦，更没想到腾出精力改善自己的外部形象。





深圳在国人眼里似乎成了一个谜。

邓小平在为特区的前途而焦虑。他说：“办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究竟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1984年1月24日，虽然离农历春节还有七天，但深圳这座新建的城市已经洋溢着春的气息，沉浸在喜庆的躁动里。马路两旁的紫荆树已绽开紫红色的花朵，象征吉祥的盆盆金橘也摆上了特区人居室的阳台。

这天中午，邓小平由杨尚昆、王震、刘田夫、梁灵光等同志陪同，首次抵达深圳视察。

汽车驶向深圳迎宾馆桂园别墅。路上，邓小平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几次轻轻撩开车窗的纱帘，张望一掠而过的楼群、工地、人流……

下午，邓小平不顾旅途的劳顿，在迎宾馆六号楼会议室，听取了深圳市负责人的汇报。

市长梁湘说，1983年一年的工业总产值，比办特区前的1979年增长十倍，比1982年增长了一倍，达到七亿三千万，职工和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比以前提高了一倍至几倍。

“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喽？”一直在全神贯注听取汇报的邓小平敏锐地插话。

“是翻了一番，财政收入也比四年前增长了十倍，去年达到三亿多。”

邓小平点了点头。

从市委迎宾馆出来，邓小平一行驱车来到刚刚竣工开业的国际商业大厦。从商场采购年货出来的人们在门前发现了身穿深灰色便服的邓小平，喜出望外，纷纷向他鼓掌致意。

邓小平登上二十层高的楼顶，俯看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区。新区面积约两平方公里，计划兴建一万多幢高楼，建成后将成为特区的商业贸易中心。邓小平听着介绍，满意地说：





“看见了，我都看清楚了。”

邓小平看清了什么是深圳速度，看清了建立经济特区决策的正确性，也看到了深圳的决心……

25日上午，邓小平来到富甲全省农村的一个渔民村参观。村党支部书记吴伯森把尊贵的客人迎进自己的别墅式楼房里。这幢楼房上下两层，一百八十平方米，有六间居室，两个客厅，还有饭厅、厨房、卫生间，楼上楼下的客厅里各摆着一台彩电和收录机，好生阔绰！

主人殷勤好客，邓小平也兴致勃勃。他询问了主人家里的情况，然后，当他听说去年全村人均收入二千八百元，每个劳动力月均收入四百三十九元时，高兴地说：“比我的工资还高呢。”他又说：“全国农村要过上这样的生活，恐怕还要一百年。”邓林插话道：“深圳也要那么久吗？”旁边的市委领导忙对邓小平说：“有您的领导，一定会很快。”邓小平脱口而出：“那也要五十年。”

26日上午，邓小平参观了由香港招商局创办的蛇口工业区。在工业区办公大楼，他看了工业区的全景模型后，指着窗外的蛇口港码头询问工业区领导人袁庚：码头是什么时候建成的？能停多少吨位的船？袁庚一一做了回答。袁庚还特别提到：办特区以前，蛇口是人口外流的口子，而现在则是人才回流，资金回流，几年来由客商独资或合资兴办了四十七家企业，其中三十家已经投产，十家开始盈利，企业职工工资的水平已超过澳门。听到这里，邓小平连连点头表示赞赏。

次日，邓小平离开蛇口，前往珠海。在珠海，他视察了毛纺厂、狮山电子厂和珠海宾馆，乘车参观了九州港，直升机场和拱北海关，然后欣然题词：“珠海特区好。”

2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找中央和国务院几位领导座谈。邓小平对深圳赞不绝口，眸子熠熠发光。





“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其中蛇口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

到最后，邓小平把一个月来的深思熟虑全部吐露出来了：“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

这些话，字字千钧，是邓小平对特区建设第二次擂鼓助威。国务院领导人马上组织人讨论实施。

一个月后，国务院领导人宣布，把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从二点五平方公里扩大到整个厦门岛一百三十一平方公里。3月26日至4月6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会议确定，进一步开放北起大连，南到北海的十四个沿海城市。

这样，以特区为龙头，以开放城市为扇面的开放型经济地带迅速形成，并向内陆地区呈梯度辐射。

时隔八年，南粤大地，春风再度，蓝天如洗，花木葳蕤。1992年1月19日，深圳人民在望眼欲穿的盼望中迎来了一辆披着千里风尘的专列。

上午9时整，邓小平走下火车，他身着深灰色夹克衫，红光满面，神采依旧，再次踏上了他八年前曾经视察过的这块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下榻之处依然是桂园，邓小平不顾陪同人员的劝说，执意要即刻出去参观市容。他说：“不用休息，先出去看看。到了深圳，坐不住呀。”

几辆旅游车开出迎宾馆，顺笋岗路向西驶去。八年前，这





条路还刚刚开辟，有些地段还是一汪汪水田、鱼塘，还是羊肠小路、低矮的房舍。而今，宽阔的马路贯穿东西，路两旁绿树成荫，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邓小平脸上露出了笑意。

车子在缓缓开行，邓小平同省市领导人亲切交谈着。

在谈到办经济特区问题时，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1月20日上午，当邓小平一行出现在国贸大厦一楼大厅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从一楼到三楼站满了群众，人人喜笑颜开，个个心花怒放，人们为能一睹邓小平的风采而欣喜，更为他所倡导的政策而欢欣鼓舞。

深圳国贸大厦屹立于罗湖区闹市中心，高耸入云。它是深圳人民的骄傲。深圳的建设者曾在这里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记录，成了“深圳速度”的象征。楼顶的旋转餐厅，是登高远望，浏览市容的好去处，到深圳来的中外人士总要到此一饱眼福。

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的陪同下，乘电梯登临五十三层的旋转餐厅，俯瞰市容，纵论天下事。坐下来后，市委书记李灏打开一张深圳市总体规划图，简要地汇报了深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情况。

小平同志面窗而坐，进入视野的，高楼大厦一座连着一座，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看到这些，邓小平神采飞扬，他高兴地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接着说，改





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地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当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时，邓小平鼓励广东要力争用二十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并强调指出，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望过窗外，邓小平意味深长道：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21日参观后，在驱车回宾馆途中，邓小平同陪同的负责同志继续谈话。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不发达地区大都拥有丰厚的资源，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他十分振奋地鼓励广东的同志：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1月23日，邓小平告别深圳，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陪同下前往珠海特区。在到蛇口港的路上，他对深圳市的领导千叮咛万嘱咐，他指出：每年领导层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他还强调：第一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正。不断总结经验，至少不会犯大错误。

车到码头，邓小平同深圳市负责人李灏、郑良玉、厉有为——握别。





向等候在岸边的快艇走了几步，邓小平突然又转回来，向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李灏重复一遍这句话，深圳人也永远铭记着这句话，铭记着邓小平的期望。

在珠海的日子里，邓小平不仅视察工业企业，详细了解全市情况，还三次驱车专门考察特区的城市建设。从吉大旅游区到拱北商业区，从九州港到前山新市区，从香洲老城到唐家湾，每次沿着不同路线，把珠海几十公里长的带状城市看了个遍。他还来到拱北大厦，登高望远，俯瞰拱北新貌，观赏澳门风光。他对珠海八年来的巨变赞不绝口。

同时，他边走边谈，对陪同的省市领导人阐述了许多重要思想。

邓小平说：这十年真干了不少事。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反对的人，让他去睡觉好了。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很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政策变了。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

谈到广东，邓小平说，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

他特别提到：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他不停地观看，不停地倾听，不停地思考，考察特区的变化，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思考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





“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和逐渐完善，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邓小平的谈判对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到：“我认为，从历史的观点看，‘一国两制’是最富天才的创造。这种构想看起来是简单的想法，但却是充满想像力的构想。”一位外国客人听完邓小平介绍“一国两制”后，风趣地说：您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但我认为您是中国最年轻、思想最活跃、最富于创新精神的人。

“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简单地说就是在大陆十一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的同时，在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这个想法最初起因于解决台湾问题。在轰鸣于海峡两岸的炮声停止以后，又不失时机地应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即中国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的主权。

但是，初期的谈判是异常艰难的。

1982年的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飒飒的金风中乘英国皇家空军专机抵达北京，她挟“大英帝国”在福克兰群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战胜阿根廷的军威，来到遥远的东方，与中国领导人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会谈。

24日上午，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晤。大批新闻记者闻风而至，各显神通，采访、报道会谈的每一细节，卫星也对这次历史性会晤进行现场转播。只见邓小平半靠在沙发上，十分轻松、自信，而撒切尔夫人却正襟危坐，





双手平置膝上。由于有记者在场拍照，两人只好先行寒暄，大谈饮食之道。

一阵镁光灯闪过，记者被请离现场，会谈闭门进行，转入正题。撒切尔夫人拿出“铁娘子”的派头，向邓小平强调中英有关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

问题既然摊开，回避是不可能的。邓小平的态度更为强硬。他说：“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这十七个字震古烁今，大义磅礴，毫无妥协和退让，将中华民族的鲜明立场昭之于世。

随即，邓小平侃侃而谈，向撒切尔夫人讲了中国政府的三点原则性意见：第一，主权不容讨论。香港本来就是我们的地方，但从现实出发，“香港问题”可以谈，而主权不能讨论。第二，希望在一二年内解决香港问题，否则到时候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第三，与其今后解决，不如现在解决，假如香港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我们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主权的日期。

这三点意见石破天惊，使撒切尔夫人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邓小平身后有着十亿站起来的中国人，他和他的战友们决不会做第二个李鸿章。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福克兰群岛，她本人找错了对象。

外电评述：撒切尔夫人是锋芒毕露，邓小平是绵里藏针。尽管撒切尔坚持传统的保守主义哲学和强硬的经济政策，但在邓小平面前，她毕竟还年轻，“铁娘子”碰上了“钢男子”。

会谈之后，撒切尔夫人步出会谈大厅，她方寸大乱，紧张与沉重交织在一起，竭力掩饰如翻江倒海般的内心世界，不小心脚下高跟鞋与石阶相绊，身体顿时失去平衡，栽倒在大会堂北门的石阶下。虽然摔得不重，有惊无险，但此事经过新闻媒介的渲染，转瞬间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





由于英国政府开始面对现实，中英双方进入了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这个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局势时而在风平浪静下暗流汹涌，时而一声晴天霹雳风云骤变，双方剑拔弩张。一会儿“峰回路转”，转瞬却“柳暗花明”。在中英联合声明草签之前，香港人始终为自身的前途动荡不定而焦灼不安。

1984年5月的一天，香港报纸登载了大陆一位官员就香港驻军问题的谈话，在当地引起广泛议论。邓小平听说此事，立即约见港澳记者。他开门见山地申明，中央对香港问题的发言，除了他本人和负责具体问题的姬鹏飞等人之外，所有其他发言都不算正式的，不代表中国政府。

邓小平当时显得十分激动，他不顾中华全国记协副主席、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阻拦，义正辞严地说：“香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呢……难道连这一点权利都没有吗？那还叫中国领土？”

这番讲话在港澳舆论界引起了很大震动。他们终于懂得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就是不能妨碍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这一根本前提的。港英立法局议员钟士元等，于同年6月来北京，希望再对中国领导人施加影响。邓小平没有与他们闲谈，也没说什么客套话，开门见山地对他们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的方针、立场和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管这些方针、立场有多少人了解。”他还极有针对性地讲：“我们听到不同观点的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我们不承认这些意见是代表全部香港人利益。中英会谈……不会受到任何干预，过去所谓‘三脚凳’我们一直不承认，我们只承认两脚，没有三脚……”碰了这个硬钉子，钟士元等人士怏怏而归。

1984年12月19日，在中外关系史上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下午5时半，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中英关于香港





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隆重举行，中国领导人和撒切尔夫人在长桌的本国国旗一侧入座，用中国的台式英雄金笔，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邓小平、李先念在两国领导人讲话结束后，笑容满面地走到撒切尔夫人面前，举起香槟酒，祝贺中英双方完成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当邓小平再次和撒切尔谈话时，气氛则友好、热烈得多了。邓小平称，解决香港问题只能用“一国两制”，允许香港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他满怀信心地说，现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一片光明。

1997年7月1日，中英双方顺利完成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摘下了英国女王皇冠上的“东方明珠”，使其完璧而归，更使其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之后，中方又不失时机地与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进行友好磋商，决定于1986年就澳门的回归问题举行正式的外交谈判。这次谈判不像中英香港问题谈判那样波澜迭起、枝节横生。依照澳门现行政治、经济体制不变的原则，谈判总体上是比较顺利的。1987年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署。西方一些分析家认为，在北京宣布的1999年12月澳门归还给中国的中葡协议是邓小平的一次胜利，“邓小平的强硬态度迫使葡萄牙接受了一些让步”。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邓小平在耄耋之年犹盼望着台湾回归祖国，也多次谈到自己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这一天。他深情地把这一天的到来寄希望于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两岸统一。1986年9月的一天，他对美国电视记者迈克·华莱士保证：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资本主义，不改变台湾的生活方式，对台湾人民没有损失。他极力主张劝说台湾与大陆搞“三通”，并自己出面，一次次地会见来自台湾，或与台湾有密切联系的知名人士，希望他们多做工作，为台湾





的早日回归尽力。

“一国两制”包容广泛，邓小平不仅设想以此来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还用来思考国际战略问题，解决国际争端。邓小平觉得，当今世界上存在的一些争端，一是因制度不同一分为二的国家，如中国的大陆和台湾；二是殖民地问题，如中英之间的香港问题，英阿之间的福克兰群岛问题；三是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如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英、西之间的直布罗陀问题。这些争端，用旧的办法很难解决，搞不好会引发武装冲突，成为新的战争热点。只有用“一国两制”或者搁开主权不谈，先进行共同开发的办法，才能为冲突各方所接受，稳定国际局势，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共同繁荣。

“一国两制”这个大胆新奇的构想，以其极高的国际战略价值而载誉全球，海内外炎黄子孙为此衷心欢呼，他们把邓小平称为“启动中国重新统一进程的关键人物”，邓小平也在世界舞台上树立了国际政治家的巨大形象。





“三步走”战略

进入 80 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居民饮食花样的增多，衣着的鲜亮，用具的高档次，一个明显的事实迅速推到人们面前：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了，老百姓富裕了，绝大多数人从“贫穷的社会主义”的阴影里摆脱出来。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把贫困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的日子指日可待了。

当人们对此产生无限的感慨时，他们也许会注意到一个提法，一个目标——并非如“文革”时那些大而空、满天飞的标语、口号式的大话，而是中国人心底里的呼唤。这就是被称做“三部曲”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这个战略目标，中共十二大、十三大都曾用正式语言，不同程度地表述过。但是最初的量化都是由邓小平提出来，经过不断宣传为全党所认可的。

1979 年 12 月初，大平正芳来华访问。这位中等身材、身着藏青色西装的日本国总理大臣在与邓小平会晤时，委婉而明确地问道：“中国的现代化规划确实是十分宏伟动人的。但是邓小平先生，我想知道的是，你们的现代化蓝图究竟是如何构思的？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具体地谈谈好吗？”

大平讲这些话时，心里不免泛起激动的波澜。想当初，池田内阁组成时，大平官拜官房长官，他提出了未来十年的日本人均收入倍增计划。到 1970 年，这个计划果然实现了，大平





功勋卓著，如今提起此事来，自豪之情仍溢于言表。

邓小平吸着烟，陷入了沉思。他佩服大平提问题切中要害，同时也觉得一时难以回答。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开始“新长征”，建设“四化”的呐喊声越来越高亢。但“四化”以什么为标志，步子怎么走，中央心里也没有数，为此还一度陷入了“洋跃进”的泥潭，不得不在三中全会后花很大气力来调整和整顿。看来，仅有口号和热情、干劲是远远不够的……

过了大约一分钟的时间，邓小平蹭掉烟灰，注视着大平，缓缓地说：“我们要实现的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即使到本世纪末，我们的‘四化’达到了某种目标，我国的国民收入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富国的水平，”他伸出指头向大平示意，“比如说国民平均收入达到一千美金，我们也得付出很大的努力。达到了那样的水平，我只能说，中国也还是个‘小康’状态……”

译员低声翻译着，温文尔雅的大平正芳专注地倾听。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邓小平起身，告诉大平：我准备了一席川菜，为阁下摆家宴。

川菜的麻辣使大平热汗淋漓，但更使他激动不已的是：中国领导人向他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国未来二十年发展的蓝图，中国人不掺水分的“真正的雄心壮志”。

日本国总理大臣走了。但是，“一千美元”、“小康水平”这些概念及其所包涵的内容却紧紧地与邓小平连在了一起，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步骤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仅仅是中国经济腾飞大合奏中的一个乐章。到了80年代的中期，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又提出，在80年代里，中国经济要翻一番，本世纪末要翻两番，到了下个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要实现四千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这就把“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分解、具体化了。

国际舆论界普遍认为，邓小平的这个提法是“低调门”的。它与“大跃进”以来曾多次发生过的看似鼓舞人心，实际上是天方夜谭式的目标相比，确实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却是非常务实的。1979年即邓小平与大平正芳谈话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二百五十三美元，排在世界的一百位之后。我们要发展，先进国家也在发展。按照中国现有的经济和技术水平，要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多次谈及中国国情，总是说“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这并非谦逊之词。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人口以每年出生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的速度增长，到1995年，总人口已突破了十二亿大关。这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和负担，新增的国民收入将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况且人口素质偏低，文盲半文盲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并有增长的趋势，这对以知识和智能为基础的经济起飞是一个很大的拖累。中国现有耕地约十四亿亩，人均不到一点三亩，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中低产田，因此，粮食供应情况不容乐观。邓小平多次强调，90年代经济上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业上。这一切都决定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宜快则快，宜慢则慢，在起步阶段不能急于求成。

所以，在邓小平这个思想的支配下，1982年9月，胡耀邦所作的十二大政治报告确定本世纪末“翻两番”，而不提“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1987年10月，十三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基本上实现现代化”。

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蓝图越来越明晰了。





为了实现这个“真正的雄心壮志”，八旬老人走南闯北，大声呼吁。他对中国人讲，对外国人也讲。1984年以后，他每次接见外宾，几乎都离不开这个话题。一年要讲上几十次。“三部曲”的发展战略成了邓小平魂萦梦绕的事情，也成了他考虑一切问题的核心。

1983年初，邓小平召集国家计委、经委和农业部门的若干负责同志，对经济发展速度进行研究。谈到农业问题时，邓小平立即指示他们：“2000年农业翻番，要生产多少粮食，人均粮食多少斤才算基本过关，你们要好好算笔账。”他掰着手指为他们细说起来：从增加肥料上增产多少斤，从改良种子上增产多少斤，从改进管理上增产多少斤，从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上增产多少斤……考虑之周到，列举之详尽，令闻者惊讶不已。

也正是同年春天，邓小平到江南视察，亲眼看到了统计数字所不能反映的、比江南春色更加赏心悦目的景象。在回京的列车上，有人问他此行的感想，向来言语不多的邓小平只说了一句话：“到处是喜气洋洋。”他看到了粮食的大丰收，看到了工农业总产值的高速增长。这一切，坚定了他对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信心。因此他不仅向国内外人士热心地介绍这个翻番计划实现的可能性，还多次向他们表示，中国的政策不会变，发展计划不会因国内局势的变动而受到干扰。1987年初他一再讲，学潮影响不了我们，胡耀邦同志的辞职也不表明我们方针政策上有任何改变，希望外国投资者不要观望，要对中国的经济充满信心，要大胆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他还一再以长者的身份告诫人们，中国不能乱，一乱什么都干不成了，翻两番、实现小康更没有指望了。

到1987年，三步发展战略目标首战告捷。头一个翻番的任务在召开十三大时已宣布基本完成。整个80年代，我国的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一点三六倍，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三，大大高于世界经济的平均发展速度。其中 1984 年至 1988 年五年间更是超高速发展。邓小平昼思夜想的愿望正一步步地实现。这给邓小平带来了莫大的安慰。

于是邓小平有了新的设想。

1992 年早春在南巡广东时，邓小平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国国内条件具备，国际条件有利，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这个大胆的构思使中国的现代化蓝图大增亮色。





百万大裁军

1985年夏初，当身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一百万”的时候，寻常百姓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而仅仅把它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战略家们则为之震惊。尽管早有迹象，尽管当年4月胡耀邦访问新西兰时已经透露过风声，尽管中国军队从80年代以来进行了三次精简整编，但这次裁员的力度和幅度则是外界根本无法预料的。这次的军委会议还决定，裁军计划将在两年之内完成。

当人们从电视画面上目睹了邓小平那坚毅的神情，娓娓的谈吐，心里明白了：这又是邓小平的一个大动作。

大动作来自大思路。

早在半年多以前，即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检阅了参加国庆盛典的军队阵容。当整齐的受阅方队依次通过检阅台时，当各类自行研制的现代化兵器隆隆地驶过长安街时，当矫健的飞行编队掠过广场上空时，邓小平为人民的这支武装力量骄傲不已。

当然，他想到的更多。

过了一个月，他把当时的，甚至更长时间以来的感受讲出来了。

那是一次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议，参加者有军委委员，包括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十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大家打过招呼，轻松地在讲台前坐下来，发表了





将近一个半小时的讲话。

“就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他随和、亲切地望着高级将领们，“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

“我说有个缺陷，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邓小平的神情渐渐变得严肃起来，他触及到了对在座的人来说最为敏感的问题，即部队高层领导老化问题。

他提出了军队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实行精简的必要性，这也是高级将领们早已预料到的。

“虚胖子能打仗？”邓小平提出设问，答案不言自明，“大力士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但是不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军队也是一样，人太多，战斗力肿而不精，仗打起来跑反都跑不赢”。邓小平风趣之中透着严峻。

和平，既是裁军的目的，又是其前提条件。就在这次会上，邓小平作出了世界大战几十年内打不起来的论断。这个论断是惊人的，因为若干年前，我国军队的指导思想一直是“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邓小平审时度势，及时地改变了这个“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建军方针。

据此，邓小平提出要裁减员额一百万。

他开导在座的每一位将军：这样做，一是有必要，二是没有风险。军队装备改善了，素质提高了，留下来的人足以应付意外事件。

至于裁军带来的矛盾，邓小平有足够的考虑，只是他主意已下：“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人们不能不佩服邓小平的清醒果断，坚忍不拔和富有远见。

邓小平抓部队精简，始于他出任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





1975年。鉴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大搞“需要就是编制”，致使部队机构膨胀，形成冗员增多的复杂局面，他在抓各方面整顿的同时，也提出部队要整顿，其任务之一就是抓编制，为部队“消肿”。他大会讲，小会讲，费尽唇舌。但历史留给他的时间和机会太少了，大幕刚刚拉开便急遽落下，随着邓小平被再次罢官，此次精简无果而终。

“四人帮”被粉碎后，干扰消除了，军队却陷入了一种无可奈何的误区：不少单位精简一次膨胀一次，今年裁减，明年又扩编；干部走了再提一批，提了再走；这边下令撤消，合并或收缩，那边又要重建、分编和扩大，无休无止，恶性循环。这种减而复增的情形被称为“光拔毛不杀鸡”，拔得哇哇乱叫，精简仍落实不了。位于北京三座门的总参谋部真的为此大伤脑筋，始终讨论不出一个有效方案来。

1982年的军队整编，迈出的步子应该说是比较大的：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撤销，代之以总参的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铁道兵与铁道部合并，国家基建工程兵取消。总参谋部还拟就了一个三总部机关人员精简百分之十八点二的方案报送中央军委。

但是，邓小平阅过这个方案后，毫不客气地批评道，这个方案不能令人满意，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

邓小平准备要对军队进行一次伤筋动骨的“大手术”。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现代化的主体战争要求一支军队数量适度，装备精良，反应迅速。兵员众多的“人海战术”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中国古代军事家的至理名言在新的条件下被人们咀嚼出更多的滋味。从1949年以来，中国军队的人数一直是世界上最多的。据外国军事专家估计，中国军队在





1982 年大约有四百二十万，而 1984 年则是三百四十万。中国军队的员额相当于美军的二倍，略高于苏军的人数。不仅如此，中国军队的官兵比例极不合理。据联合国专家组的调查，世界上几个军事大国中，官兵的比例分别是：苏联为一比四点五六；美国为一比六点一五；联邦德国一比十；法国一比十七；而中国则是一比二点四五，平均每名军官仅领导两个半士兵。军官数额的庞大是惊人的。就军区而言，每个军区的领导班子居然有十几名甚至二十几名。用邓小平的话讲，“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

庞大的军队要求有巨额军费的支持。邓小平鉴于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和短时间内世界不会打大仗的估计，一再要求“军队要忍耐”，要缩减军费，要服从国家的建设大局。这样，军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公开材料表明，1985 年，我军军费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点二，只相当于同年美军军费的百分之二，不及苏联的一个零头。

尽管如此，这笔军费却未能最有效地用于装备更新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它的大部分被“人头费”占去了。据统计，我国从 1953 年至 1983 年三十年间的武器装备发展费，比美国 1982 年一年的同类经费还少二百亿人民币。有限的一点军费撒下去如杯水车薪，勉强维持，谁也吃不饱，想改进装备更是难上加难。装备落后，冗员充斥，一旦爆发战争，只能被动挨打。

这一步非迈不可。

所以，邓小平痛下决心：“即使战争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1985 年，被国际舆论称为中国的“裁军年”。

百万大裁军的雷声隆隆响过，我军三总部机关的人员裁减了一半，陆军部队的建制单位撤销了四分之一，原先的十一个大军区合并成七个，撤并军级以上单位三十一个、师团级单位





四千余个，市县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了现役

……

这是一次痛楚的改革。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和被选择，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实际利益都受到触动。当被撤销了部队番号的干部战士举行最后一次分列式的时候，当他们含着热泪向军旗告别的时候，他们未必完全明了邓小平和军委领导人这个举措的真正含义，但他们经受住了考验——和平时体制编制改革中名利地位得失的考验。

在精简整编方案正式下达之前，已有消息传出，昆明军区将与成都军区合并，新的军区将以昆明方面为主。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这不仅因为当时中越边境战火未熄，而且昆明军区是原来第二野战军的老班底。邓小平作为二野的老政委，大概不会拿昆明军区开刀吧。人们纷纷这样猜度。

但是，1985年5月下旬，当昆明军区司令员张毅秀被召到京西宾馆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时，他出乎意外地得知，昆明军区被撤销，机关人员及部队与成都军区合并，自己也没有被列入新的军区领导班子。

人们从这里看到了邓小平巨大的决心，也不能不佩服他深邃的军事和国际战略眼光。毕竟，中越边境上的战争不可能长久地打下去，而成都的战略地位却远比昆明重要。消息传开，全军上下，心悦诚服，竭力配合。他们顺着军委主席的思路，看到了中国军队走向现代化、正规化的希望。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当1986年——“国际和平年”来临时，中国已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军一百万的战略行动。到1987年，这一浩大的工程宣告完成。

邓小平呼唤和平。中国人向往和平。愿这个东方大国的百万大裁军能推动人类早日结束自相残杀，携起手来一同装扮地球这一共有的家园！





“小平您好”

1984年，是中国当代史上大放异彩、喜事连台的一年。这一年，农村改革的成功已经不容置疑，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在城市全面推开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同时，对外开放又有新的举措，国务院确定进一步开放从大连到北海的十四个沿海城市；年底，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指日可待……

金秋时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建国三十五周年盛大庆典上，北京大学的赵宝晨、郭庆斌等同学打出了“小平您好”的大字横幅。游行队伍如同欢乐的海洋簇拥着这幅反映党心民心的标语流动在十里长街上。

过后，赵宝晨同学是这样追忆的：我们选用“小平您好”来表达自己的心声，是经过一番推敲的。用这样的字眼，我们觉得更加亲近、更显民主，表明我们新一代的共产党人与小平同志是志同道合的，更能表现出青年学生的独特感情。

在过后将近十年时间里，当人们咀嚼着生活改善的甘美果实，在改革的浪潮里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们更会从心底里领悟到这四个字的深刻含义。

大概受此启发，在一个全国闻名的先富起来的村镇里，家家户户挂起了“小平同志您好”的楹联。在中国西北一个用三年时间甩掉贫困帽子的乡，起名“拥平”、“颂平”、“连平”的新生儿骤然增多。在广安县邓小平的旧居，一个风和日丽的





日子，一位身穿毛料制服的中年人把接待员拉到邓小平睡过的床边，硬塞给她一百张五十元的人民币，拜托她代栽几棵皂角树和白果树，“为举世瞩目的伟人家乡添一笔新绿”。他高声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嘛，我靠政策好挣来的钱有权这样支配。”



今天，中国已经跨越了个人专断和偶像崇拜的阶段，老百姓吃足了苦头，再也不会盲目地参与造神运动了。一旦他们表示出对某一领袖人物的拥戴，那必定是真情实感的流露。

人们永远感谢邓小平倡导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实惠。

